

目 次

经济管理

- 二级挣值法结合 PDCA 循环在地铁施工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胡天明 段晓晨 王永刚(1)
- 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赵清军 王雅妮 周毕芬(9)
- 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
——基于厦门和漳州的调查数据 王丽云 周毕芬 赵清军(15)
- 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分析
——基于厦门 307 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车 鑫 周毕芬 赵清军(21)
- 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张曼玉(29)
- “985 工程”院校科研效率的时空差异与成因分析
——基于面板数据与 EBM 模型 刘 悦 汪克亮 孟祥瑞(36)

政治社会

- 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坚实底气 王有炜 豆艳荣(45)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内容及其重大意义 徐长山(50)
- 资源禀赋、政策调适与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
——基于“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个案研究 王 勇 刘佳佳(56)
-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 2013 年、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孙小宇 郑逸芳 许佳贤(63)
- 全面二孩政策下高校女教师“产假式缺编”治理
——以精准治理分析的视角 刘佳佳(73)

文化产业

- 古代孝文化传播途径研究 苏喜娥 刘荣贵(79)
- 在新形势下河北会展产业“短板”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安晓波 张贺成(84)

高等教育

- 教育期望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2013—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 吴 洁 吴智雄 郑逸芳 许佳贤(91)
- 媒介融合时代大学生舆论引导研究 孙 远(98)
- 创新团队胜任力模型构建及对培育大学生创新团队的启发 康学梅 张廷君(103)
-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总目次 (I)
(全卷终)

CONTENTS

Application of the Second-level Earned Value Method Combined with PDCA Cycle in Metro Construction Projects Management	Hu Tianming, Duan Xiaochen, Wang Yonggang(1)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Fujian Province	Zhao Qingjun, Wang Yani, Zhou Bifen(9)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Employment Quality on the Peas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Xiamen and Zhangzhou	Wang Liyun, Zhou Bifen, Zhao Qingjun(15)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Migrant Workers;Based on a survey of 307 migrant workers in Xiamen	Che Xin, Zhou Bifen, Zhao Qingjun(21)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Income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Zhang Manyu(29)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par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fficiency of "985 Project" Universities and its Cause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and EBM Model	Liu Yue, Wang Keliang, Meng Xiangrui(36)
Four Confidences: The Emboldened Basi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Wang Youwei, Dou Yanrong(45)
The Formation,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Xu Changshan(50)
Resource Endowment, Policy Adjustment and Governance Logic of Rural Rejuvenation;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Chixivillage, the First Villag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Wang Yong, Liu Jiajia(56)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omen's Social Statu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 2013,2015	Sun Xiaoyu, Zheng Yifang, Xu Jiaxian(63)
To Control the "Maternity-Style Shortage" of Female University Teachers under the Two-Child Policy: Perspective of a Precise Management	Liu Jiajia(73)
Research on the Transmission Way of Ancient Filial Piety Culture	Su Xi'e, Liu Ronggui(79)
Factor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 Study on the Short Board of Hebei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 Xiaobo, Zhang Hecheng(84)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and Analysis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Based on the Follow-up Survey Data of China Education for the 2013—2014 Academic Year	Wu Jie, Wu Zhixiong, Zheng Yifang, Xu Jiaxian(91)
Research on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Media Integration Era	Sun Yuan(98)
The Model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Team Competence and the Inspiration of Innovation Team of College Students	Kang Xuemei, Zhang Tingjun(103)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01-08

二级挣值法结合 PDCA 循环在地铁施工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胡天明¹, 段晓晨¹, 王永刚²

(1. 石家庄铁道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2. 中铁一局集团北京分公司, 北京 100062)

摘 要:挣值法作为项目管理中一种集成控制的重要工具,可将成本进度联合监控,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但是在挣值法应用中发现,传统挣值法存在未区分关键路径、难以给出项目内部具体执行计划等问题。针对传统挣值法存在的问题,结合 PERT 技术提出二级挣值法,对关键路径和非关键路径的活动区别对待;结合 PDCA 循环,定时检查计划成本进度目标与实际目标相比较,检查是否存在偏差,如果存在偏差,找出原因并在下一个循环里做纠偏调整,确保实际成本进度与计划成本进度一致或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关键词:二级挣值法;项目管理;成本控制;进度控制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01

近年来,随着建筑行业的飞速发展,施工项目的特点发生了巨大变化,施工管理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效。施工项目管理在运作方式上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可用资源,极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建筑施工企业的成本控制工作在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在成本控制管理中,有的项目成本结余,有的项目成本超支,总体也许符合成本控制总目标,但实际上仍然属于成本管理失控,进度控制亦是如此。

因此,项目进度—进度动态控制对建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本文以北京地铁十六号线为例,建立进度—成本联合二级挣值法的静态模型,再结合 PDCA 循环对静态模型进行动态控制。通过进度—成本二级挣值法定时检查计划目标与实际目标,如果存在偏差,找出原因并在下一个 PDCA 循环里做纠偏调整,确保进度—成本实际完成情况与计划完成情况一致或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因此,研究二级挣值法结合 PDCA 循环动态控制,对提升我国施工项目管理方法和水平有重要意义。

一、施工项目管理三重目标

(一)项目管理三重目标

项目成本控制的主要目的是将项目成本控制在预期成本以内,项目成本控制的范围包括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成本控制贯穿于整个项目,是动态的、全过程的控制。它既要根据项目计划目标进行预算,又要在施工过程中实时跟踪监督。对已发生成本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成本偏差,找出原因后及时调整,在后续工作中加以改进,把最终成本限定在目标成本允许的范围内。

项目进度控制主要包括项目进度的计划与监控。进度监控需要对并列工作同时监控,不同工作处于关键路线或非关键路线时,对总工期影响不相同,应对措施也不相同,处在关键路线上的工作要特别注意。项目管理进度绩效评价主要通过研究工程项目的目标进度与实际进度,分析对比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与计划进度。建立挣值法模型对项目工期进行管理控制^[1]。当实际进度明显

收稿日期:2018-03-25

作者简介:胡天明(1992-),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程经济与造价管理。

本文信息:胡天明,段晓晨,王永刚.二级挣值法结合 PDCA 循环在地铁施工项目管理中的应用[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1-8.

落后于计划进度时,核实原因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以保证项目顺利完成。

项目质量管理是指为确保项目产品满足质量要求而开展的项目管理活动,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不断监测,对质量偏差及时纠偏,确保项目质量满足指标要求。质量管理是项目管理重要组成部分,质量目标达不到要求,就意味着项目是失败的。

(二)成本、质量、进度三者关系

1. 对立关系

加快工程进度,需要投入资源设备,这将导致直接成本的增加;此外,快进度会打乱原有计划,使项目各环节之间产生脱节现象,增加控制难度,给质量管理增加难度和隐患。如果降低投资,就需要考虑降低质量标准,按费用最低原则安排进度计划,整个项目进度降低。

2. 统一关系

提高产品质量标准,虽然增加了一次性投资,从长远角度看,降低了工程投入使用后的运行费用和维修费用,从全寿命费用分析的角度则是节约投资的举措^[2]。从质量管理的角度,如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控质量,保证实现项目期望的质量要求,则可减少实施过程中的返工费用。另一方面,高标准的质量要求能起到保证进度的作用,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对出现的质量问题及时纠偏,从长远看来,要比不及时返工而造成更严重后果的影响要小^[3]。

二、施工项目成本—进度优化控制理论分析

项目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在满足质量要求前提下,寻求成本和进度的最优方案。进度和成本控制贯穿于工程项目的各个阶段,对于每一个项目而言,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控制手段和管理方案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传统项目管理领域涉及成本、进度的管理工具有横道图、网络图、项目概预算、挣值分析等方法,只有挣值分析既用于成本管理又用于进度管理。单方面进行成本绩效评价,无法准确判断超支还是结余,因为成本消耗多,原因可能是成本超支,也可能是进度超前。同样,成本消耗低原因也可能是成本结余或者进度滞后,或者二者皆有。因此,有必要对成本—进度的综合评价监控进行研究。

(一)成本—进度绩效评价的挣值分析方法

1. 传统挣值法的不足

挣值法作为评估项目成本—进度绩效的方法,包含对项目计划与实际差异的分析,以及项目最终完成时间、成本的预测。但挣值管理中的缺陷导致挣值法仍属于最没能充分使用的管理工具之一。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①难以给出有效的项目分解。国外有学者认为,挣值管理的第一个困难是工作分解系统,若工作被分解为最简单的工作单元,收集、处理这些数据将支付高昂的成本。不仅如此,项目分解在技术上也有一定难度,项目如果按估价体系进行分解,考虑的是工程量计算和财会原则,如果按计划体系分解,主要考虑工序时间顺序和工艺逻辑原则。②进度—成本联合管理的实现还取决于数据采集系统的效率。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虽然提高了监控的精度和效率。但监管精度的实现取决于大数据的采集分析,这对管理人员而言是沉重的负担,会严重影响管理系统的效率。在项目监控中,处理好数据系统的精度和效率之间关系,确定合适的监控精度十分必要。前期数据的采集,可以通过设计专门的数据统计科室,运用信息技术来获得,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4]。③对已完成工作量的有效度量。挣值分析的可信度完全依赖于挣值度量的准确性以及对工作完成程度的有效度量。有效度量的基础是合理的度量时间点,基于功能点或里程碑事件的度量更合理。赋予权重应根据单元工作的难度做出调整。比如,开发一个程序一般需要100天,当进行到90天时,并不能说明程序已经开发了99%。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针对项目特点寻找具体解决方案。传统挣值法的计划工作量是在项目分解结构的基础上获得的,实际工作量是从工程实际实施过程中获得的^[5]。④没在规划范围内的活动挣值法不能提供进度方面的信息。没有规划的活动挣值是零。项目灵活多变,事先难以预料项目在进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未规划工作活动,项目进展过程中出现的未规划任务会扰乱整个管理工作,如因质量为题需要返工的工作。如果对此类活动不予考虑,很可能会影响到总进度。⑤没有区分关键路径和非关键路径。Brown最早从关键路径观点提出了对挣值管理的质疑,关键路径是项目进度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关键路径

控制不当会影响其紧后工作的正常开工,严重的甚至会影响总工期,应予以重点监控,而非关键路径在不影响关键路径工作的前提下,其控制可适当宽松^[6]。

2. 二级挣值法的建立

挣值法可以运用在WBS的任何层次上。鉴于传统挣值法存在的不足,过于强调整体而忽略了项目内部关系、偏重整体预测而忽略了工作执行情况,为了尽可能规避由此造成的偏差建立了二级挣值法。二级挣值法是通过WBS次级子项目的挣值累加确定本级项目的挣值,解决项目WBS中的二级子项目中存在的工作进度成本极不平衡、偏差极大,但出现正负偏差相抵消,而在本级项目上表面上偏差很小的项目挣值绩效评价,揭示项目实际执行情况。

3. 二级挣值法与传统挣值法主要区别

传统挣值法是对项目进行整体分析,二级挣值法是将项目划分为若干二级子项目,确定子项目的变量和指标,结合网络计划中二级子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二级子项目进行挣值分析,最后汇总得出项目整体二级挣值。

传统挣值法只能得出整体绩效评价报告;而二级挣值法既可以得出整体绩效评价报告,还能得出原因分析。

传统挣值法的成本和工期预测是以项目三指标体系数据为基础获得;而二级挣值法是以项目完工时成本和工期预测的计算方法结合网络计划图进行优化,成本、进度绩效评价报告更客观、准确^[7]。

(二)PDCA循环结合二级挣值法对成本进度控制原理

PDCA对成本进度的控制原理,就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成本进度全过程监控,定时检查计划成本进度目标与实际目标相比较,检查是否存在偏差,如果存在偏差,找出原因并在下一个循环里做纠偏调整,确保实际成本进度与计划成本进度一致或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当对项目成本实行PDCA循环全过程控制时,成本曲线在目标成本的两侧波动,这是因为管理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获取资料,对存在偏差的实际成本进行纠偏调整,以达到目标成本的目的。不做成本全过程控制的项目,由于不清楚项目成本的实时变化,无法及时发现出现的偏

差,导致成本偏差一直存在,继而不断累积,最终产生较严重的成本误差。

在施工项目管理中,进度—成本控制贯穿整个施工过程,应该以动态的方式对成本—进度进行全过程控制,以特定时间节点为一个周期进行循环。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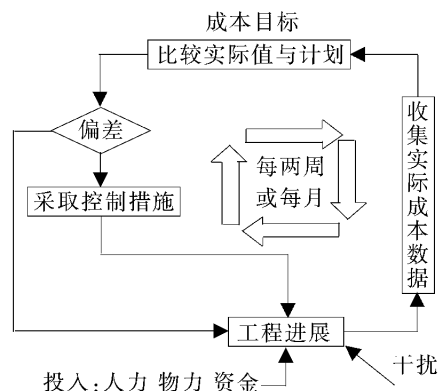


图1 PDCA循环全过程成本控制

(1)对可能影响项目成本的因素进行分析。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项目成本会受到很多干扰,如宏观政策、恶劣天气、原材料供应以及设计变更等因素的影响。

(2)实时记录数据。通过相关数据比较实际和计划之间的差异,以便对工程的实际进展做出分析,及时、准确的数据是确定成本—进度偏差的基础。同时,如果选取指标过于频繁,则无法进行定性分析^[8]。

(3)确定偏差。如果实际与计划之间的偏差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则按原施工计划进行;如果实际与计划偏差不能忽略,则需要分析产生偏差的原因,并采取有效手段进行纠偏,待问题解决后继续施工^[9]。

三、案例分析

(一)工程概况

中铁一局负责北京地铁16号线工程换乘方厅及3号疏散口项目。以换乘方厅混凝土浇筑及其前期工作为例进行案例分析。该项目计划工期为2015.7.1—2016.1.13,总工期197d,预算成本为492万元。该项目可分为5个子项目:围护桩施工、冠梁及挡墙施工、基坑土方开挖、结构混凝土底板、结构混凝土侧墙及顶板,分别用A、B、

C、D、E 表示。换乘方厅主要工程数量如表 1,现利用二级挣值分析法对该项目的成本—工期进行评估。项目网络计划图如图 2 所示,网络计划如表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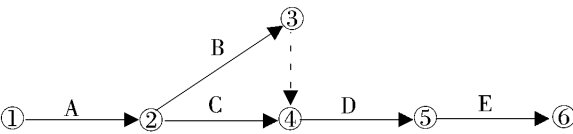


图 2 换乘方厅网络计划图

表 1 换乘方厅网络计划

子项目	紧前工作	工期/d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预算成本/万元
A	—	27	16.2	48.6	16.2	81
B	A	35	17.1	53.1	19.8	90
C	A	15	8.1	27.45	9.45	45
D	B,C	50	16.32	60.48	19.2	96
E	D	85	45	106.2	28.8	180
总计		212	102.72	295.83	93.45	492
所占比例		20.878%	60.128%	18.994%	100%	

该项目成本—进度控制以月为统计周期,统计月末实际成本—进度与月初计划成本—进度的偏差,通过比较计划与实际成本—进度来判断控制目标是否实现。这就容易导致项目中出现的成本超支、进度滞后问题不能及时发现,无法对成本—进度出现偏差的原因准确分析,进而造成偏差累计。

二级挣值法可以从更深层面分析成本—进度出现偏差的原因,找到偏差问题根源,进而结合 PDCA 循环,将出现偏差原因解决后进行下一个循环,从而避免偏差累计。将预控对策施行在下一循环中,进而有效规避问题的重复出现,使工程的进度和成本按照工程计划进行^[10]。前 4 个月完成情况如表 2 至表 4 所示。

表 2 前四个月计划预算 BCWS

月	分项工程名称	计划预算 BCWS/万元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合计
1	ABC	19.286	58.641	19.787	97.714
2	BC	21.137	67.474	24.531	113.142
3	BD	10.116	36.903	11.883	58.902
4	DE	11.416	36.606	11.159	59.181
	合计	61.955	199.624	67.36	328.939

表 3 前四个月已完成工作量预算成本 BCWP

月	分项工程名称	已完成工作量预算成本 BCWP/万元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合计
1	ABC	22.257	67.846	22.948	113.051
2	BCD	24.797	79.216	28.78	132.793
3	D	12.482	46.255	14.684	73.421
4	DE	21.524	53.598	14.891	90.013
	合计	81.06	246.915	81.303	409.278

表 4 前四个月实际成本 ACWP

月	分项工程名称	实际成本 ACWP/万元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合计
1	ABC	21.848	66.577	22.472	110.897
2	BCD	21.12	67.799	24.523	113.442
3	D	12.482	46.255	14.684	73.421
4	DE	24.580	60.809	16.847	102.236
	合计	80.03	241.44	78.526	399.996

本文将以前两个月为例,以 PDCA 循环结合二级挣值法加强直接工程费动态的、全过程的管理控制。

(1)第一个月偏差计算。利用二级挣值法,可以得到在项目第一个月结束时,直接工程费用偏差 $CV=2.15$,成本偏差率 $CPI=1.0194$,其中人工费用、材料费用、机械费用均有结余,项目实际直接工程费用支出结余。进度方面,进度偏差 $SV=15.337$,进度偏差率 $SPI=1.1570$,实际进度超前。见表 5。项目成本和进度达到了预期期望,因此,项目可按原计划继续施工,PDCA 循环可继续进行下一步。

表 5 第一个月挣值分析 万元			
类型	BCWS	BCWP	ACWP
人工费	19.286	22.257	21.848
材料费	58.641	67.846	66.577
机械费	19.787	22.948	22.472
合计	97.714	113.051	110.897

(2)第二个月偏差计算。利用二级挣值法,可以得到在项目第二个月结束时,直接工程费用偏差 $CV=19.351$, $CPI=1.1706$,项目实际直接工程费用支出有结余。进度方面, $SV=19.651$, $SPI=$

1.1737,实际进度超前。见表 6。项目成本和进度达到了预期期望,成本和进度优势得以累加,成本结余更多,进度超前更多。因此,项目可按原计划继续施工,PDCA 循环可继续进行下一步。

表 6 第二个月挣值分析 万元			
类型	BCWS	BCWP	ACWP
人工费	21.137	24.797	21.12
材料费	67.474	79.216	67.799
机械费	24.531	28.78	24.523
合计	113.142	132.793	113.442

(二)二级挣值法对竣工成本—工期的预估

项目成本—工期的预测,是根据挣值法理论对未完工成本和进度的预测修正,再累加已完工实际成本和工期,得到项目总的预测成本和工期。在本项目中,可以进行成本—工期修正预测的子项目只有 E 子项目。见表 7 至表 9。

项目信息				计划预算 BCWS/万元									
编号	计划时长	紧前工序	松弛	监控时间点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A	27	—	0	60	81								
B	30	A	0		34	85	90						
C	15	A	20			39	45						
D	50	B,C	0				35	73	96				
E	85	D	0						16	50	83	116	140
项目		累计 BCWS		60	115	205	251	289	328	362	395	428	452

项目信息				已完成工作量预算成本 BCWP/万元									
编号	计划时长	紧前工序	松弛	监控时间点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A	27	—	0	67	90								
B	35	A	0		47	107.5							
C	15	A	20			41							
D	50	B,C	0			8	65	93					
E	85	D	0					28	84	140			
项目		累计 BCWP		67	137	246.5	303.5	359.5	415.5	471.5			

表9 项目结束时实际成本统计报表

项目信息				实际成本 ACWP/万元									
编号	计划时长	紧前工序	松弛	监控时间点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A	27	—	0	67	90								
B	35	A	0		37	86							
C	15	A	20			41							
D	50	B,C	0			9	65	93					
E	85	D	0					32	97	162			
项目	累计 ACWP			67	127	226	282	342	407	472			

通过对该项目在监测点的累加获得项目成本、进度绩效评价所需要的三个指标数据。以120 d为监测点,根据上述各表所统计数据考核情况如下:

成本绩效评价中, $CV = 8.5$, $CPI = 1.0209$,假如该项目未完工部分按照目前的成本效率进行,则完工总成本为:

$$FCAC = ACWP + (TBC - BCWP)/CPI = 407 + (452 - 415.5)/1.0209 = 442.75 \text{ 万元}.$$

其中, $FCAC$ 为完工总成本, TBC 为计划完工总预算成本。

进度绩效评价中, $SV = 87.5$, $SPI = 1.2668$,假如该项目未完工部分按照目前的进度效率进行,则完工总工期为:

$$ECD = OPD + (TBC - BCWP) \times PTD \times SPI/TBC = 120 + (452 - 415.5) \times 197 \times 1.2668/452 = 140.15 \text{ d}.$$

其中, ECD 为预测完工总工期, OPD 为已进行工期, PTD 为计划总工期。

利用传统挣值法可以得到,在项目结束时,实际成本442.75万元要低于计划成本452万元,实际工期140.15 d要超前于计划工期197 d。按照传统挣值法来说,项目成本和进度达到了预期期望。但对于该项目的各子项目进展如何,是否出现不同子项目的成本—进度正负偏差相互抵消。并不能通过传统挣值法得到答案。

1. 二级挣值法成本分析

根据项目的工程进展情况对各工作的完工成本做了处理,见表10。其中A、B、C、D作业已经完工, $FCAC$ 直接取其实际完工成本。E作业尚未完工,按照挣值法对其预计完工成本进行了纠偏估计。将处理过的二级项目完工成本进行累加得到其预测完工成本^[11]。

表10 二级项目竣工成本估算表 万元

指标	A	B	C	D	E	累计
TBC	81	90	45	96	140	452
BCWP	90	107.5	41	93	84	415.5
ACWP	90	86	41	93	97	407
CV	0	21.5	0	0	-13	—
CPI	—	—	—	—	0.8660	—
FCAC	90	86	41	93	161	471

2. 二级挣值法进度分析

根据该地铁项目的网络计划图可知,在6个子项目中,关键路径为A→B→D→E,在非关键路径上的子项目,施工时间有不同程度的松弛。根据表11显示,A项作业的实际完工时间与计划完工所需时间一致,实际成本与计划预算成本一致。B项目实际完工时间较计划完工时间提前5 d完工,成本较计划结余。C项目处于非关键线路,工期上有松弛,但C项目提前5 d完工。D项目是B、C项目的紧后工作,B、C项目的提前直接导致D较计划开工日期提前5 d开工,D的实际工期比计划工期缩短17 d。由此看来,A、B、C、D均比实际工期缩短,单纯考虑该项目工期,项目很可能提前完工。但由于该项目计划于2015年7月1日开工,实际2015年10月1日开工,从整个工程考虑,总体进度还是滞后。

3. 项目成本偏差问题分析

(1)成本偏差。在该地铁项目中,A、B、C、D、E 5个子项目已完工,对已完工5个子项目的成本偏差分析如下:A子项目成本偏差为0,成本偏差率为1;B子项目成本偏差为-21.5,成本偏差率为0.8000;C子项目成本偏差为0,成本偏差率为1;D子项目成本偏差为0,成本偏差率为1;E子项目成本偏差为-13,成本偏差率为0.8660。由于该项

目是已发生项目,结合项目实际发生的成本进行对比分析,该项目实际成本为 472 万元,传统挣值法预测成本为 442.75 万元,二级挣值法预测成本为 471 万元。从传统挣值法角度来分析,该地铁项目成本偏差率为 2.046%,在允许误差范围内。但从划分更为细致的二级挣值法考虑,成本偏差率仅为 0.212%。可以得出,二级挣值法在成本预测控制上,比传统挣值法有很大的提高。

(2)原因及对策。通过二级挣值法对 E 子项目存在的成本超支问题进行深层次分析,发现 E 子项目存在严重的窝工问题,E 子项目施工工序复杂,动用多个工种,各工种作业期间组织作业能力差,因此出现了大量窝工,导致成本严重超支。因此,E 子项目在接下来的作业中应提前协调沟通各工种工作时间,科学合理组织工作,避免窝工现象的出现。

表 11 项目完工成本修正预测表

指标	已发生费用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BCWP_A$	67	90								
$ACWP_A$	67	90								
A 完工成本										
$BCWP_B$		47	107.5							
$ACWP_B$		37	86							
B 完工成本										
$BCWP_C$			41							
$ACWP_C$			41							
C 完工成本										
$BCWP_D$			8	65	93					
$ACWP_D$			8	65	93					
D 完工成本										
$BCWP_E$					28	84				
$ACWP_E$					32	97				
E 修正预测成本										
项目完工成本	67	127	225	282	342	407				

4. 项目进度偏差问题分析

(1)进度偏差。在对该地铁项目成本偏差分析中,对 A、B、C、D 四个已完工子项目的进度偏差分析如下:A 子项目按计划进度进行;B 子项目按计划开工,提前完工 5 d,工期缩短 5 d;C 子项目处于非关键线路,按计划正常完工;D 子项目比计划提前开工 5 d,提前 17 d 完工;E 子项目已开工,比计划提前开工 18 d。由传统挣值法角度来分析,虽然该地铁项目整体上进度超前于计划工期完工。但从二级挣值法角度分析,项目进度管理存在问题,D、E 子项目严重缩短计划工期,缩短工期达 37.59%。虽然 D、E 子项目均提前完工,但 D、E 子项目的工期预测存在严重问题。从长远角度看来,如果不解决此类问题,终将给整个项目的进度管理工作带来严重的后果。在对该工程其他相似项目工期预测中,应严格控制 D、E 子项目的工期制定管理工作,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2)原因及对策。通过二级挣值法对 D、E 子项目工期过分超前问题进行深层次分析,发现 D、E 子项目因为施工工序复杂,动用大量劳动力,施工过程中大大缩短了预期工期。同时,因为劳动力远超计划,导致出现窝工现象,造成成本严重超支。因此,D、E 子项目在接下来的作业中,应在保证如期完工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组织工序,安排施工人员,避免因窝工造成的成本超支。

5. 项目完工成本—进度评价

后续工作以月为一个循环执行 PDCA 循环动态管理,直至该地铁项目完工。通过执行二级挣值法结合 PDCA 循环对策进行成本—进度控制,在项目结束时,成本方面,直接工程费用为 391.76 万元,成本节余 80.24 万元;进度方面,实际工期为 178 d,实际进度超前 14 d,项目成本和进度均达到了预期期望。因此可以得出,二级挣值法结合 PDCA 循环动态控制对施工项目成

本—进度控制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结论

(1)二级挣值分析细化了解析绩效评价内容,为如实反映各工作间的逻辑关系,二级挣值分析中结合了网络计划技术;在项目整体监测上,以项

目实际执行数据为依据,结合子项目成本进度发展趋势,对整个项目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2)偏差未必都需要纠正。在偏差分析中,给出偏差的不同范围内的不同控制手段,区别处理不同网络路径上出现的偏差。

参考文献:

- [1] Bagherpour M, Zareei A, Noori S. Designing a control mechanism using earned value analysis: an application to production environm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10, 49(5): 419-429.
- [2] 景晨光,段晓晨. 基于遗传神经网络的工程造价估算方法研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4(4): 11-17.
- [3] 从荣刚,熊诚,乌云娜,等. 基于目标逻辑关系的项目调整评定法及其应用研究[J]. 项目管理技术, 2010, 8(8): 33-38.
- [4] 王丹,李雪飞. 基于挣值法的工程项目质量管理评价体系研究[J]. 工程管理学报, 2017, 31(4): 126-130.
- [5] 郑生钦,牟强. 改进挣值法在工程项目综合绩效评价中的应用[J]. 工程管理学报, 2013, 27(2): 54-59.
- [6] Brown, John W. Evaluation of Project Using Critical Path Analysis and Earned Value in Combination [J].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1985, 16 (August): 59-63.
- [7] 长青. 工程建设项目成本—进度挣值方法的改进与应用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 2007.
- [8] 任蓉.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研究[J]. 铁道运输与经济, 2014, 36(11): 7-13 + 25.
- [9] 贺农农.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安全监督管理模式研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8(1): 23-26.
- [10] 段晓晨,孟晓静,张小平,等. 交通工程项目“五控”目标管理技术的研究及应用[J]. 铁道运输与经济, 2016, 38(4): 78-82.
- [11] 潘燕华,贾仁亮. 基于二级挣值法的造船项目成本—进度研究[J]. 项目管理技术, 2011, 9(11): 123-127.

Application of the Second-level Earned Value Method Combined with PDCA Cycle in Metro Construction Projects Management

Hu Tianming¹, Duan Xiaochen¹, Wang Yongga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2. China Railway 1st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062, China)

Abstract: Earned Value Method (EVM) is an important tool of integrated control in project management. It can monitor the cost progress jointly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ffective control. However, in the application of earned value method,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earned value method has the problems such as not distinguishing the critical path, and failing to give a project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lans.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ditional earned value method, the Second-level EVM is put forward combining with PERT technology to treat the activities of the key path and non-critical path differently. In combination with PDCA cycle, the planned cost and progress target is regularly checked to see if there is any deviation compared with the actual target. If there is devi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the cause and correct it in the next cycle to ensure that the actual cost schedule is in line with the planned cost schedule or in the acceptable range.

Key words: the second-level earned value method; project management; cost control; schedule control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09-06

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赵清军¹, 王雅妮², 周毕芬¹

(1.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2. 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基于福建省1984—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福建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短期内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作用,而进口贸易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不明显,同时进口贸易在短期内也会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因此,福建省应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商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提升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

关键词:福建省;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ADF检验;协整检验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02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中国(福建)自贸试验区和福州新区“三区”叠加政策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福建省的经济发展活力被不断的激发。2016年,福建省GDP从1978年的66.37亿元增长到28 519.15亿元,增长了近430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7.3%。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1年的6.08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 568.19亿美元,35年间增长了258倍。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对福建省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相较于国内其他发达省份对外贸易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研究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对调整优化福建省进出口贸易结构、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就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英国学者罗伯特·逊最早开始专门论述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

关系,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命题,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增长可以拉动本国经济的增长。国内学者主要从出口或者是进口单方面分析了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赵晴和雷原利用陕西省1990—2011年的出口贸易额与GDP数据,运用相关性分析、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出口贸易额每增长一个百分点,GDP约增加1.3个百分点^[1]。乌画和王涛生构建面板模型,通过对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总量、增量和结构三方面的分析,证明了我国各地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2]。李颖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视角测算了中韩两国出口贸易对GDP的贡献率,认为出口贸易的增长对中韩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3]。陆丹亮运用扩展后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并结合玛尔瓦和塔瓦克里模型,证实了上海市进口与经济增长两者互为因果关系,进口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收稿日期:2018-05-24

作者简介:赵清军(1992-),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发展、劳动就业。

本文信息:赵清军,王雅妮,周毕芬.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9-14.

用^[4]。魏浩基于宏观和行业两个视角,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和行业面板数据,也实证分析了进口贸易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行业层面,进口贸易对北京市经济的增长均具有正效应^[5]。李扬子和李孟哲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湖北省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和长期内进口均会促进GDP的增长,且时期越长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就越强^[6]。当然,也有部分学者从进出口两方面探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边菲斐^[7]、杨晓钦、周士元^[8]、文华^[9])。

目前,福建省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长期以来与东南亚等国家有着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但现有文献对于福建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且数据较为老旧,无法针对现有情况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鉴于此,本文采用福建省1984—2016年GDP和进出口贸易数据,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深入剖析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以期为促进福建省海丝核心区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二、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的现状分析

(一)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贸易额以及进口贸易额在1984至2016年期间快速增长,除了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以外,32年来均呈现出连续不断的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福建省国民生产总值由1984年的157.06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6年的28 519.15亿元人民币,增长幅度高达182倍。进出口贸易总额也从1984年的18.55亿元人民币扩增至2016年的10 344.96亿元人民币,增幅高达558倍。出口贸易额的增速最高,从1984年的10.93亿元人民币扩大到2016年的6 833.66亿元人民币,增长了625倍。同时,进口贸易额由1984年的7.62亿元人民币增至2016年的3 511.3亿元人民币,增长了近461倍。由此可见,福建省国民生产总值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变化基本上是同步增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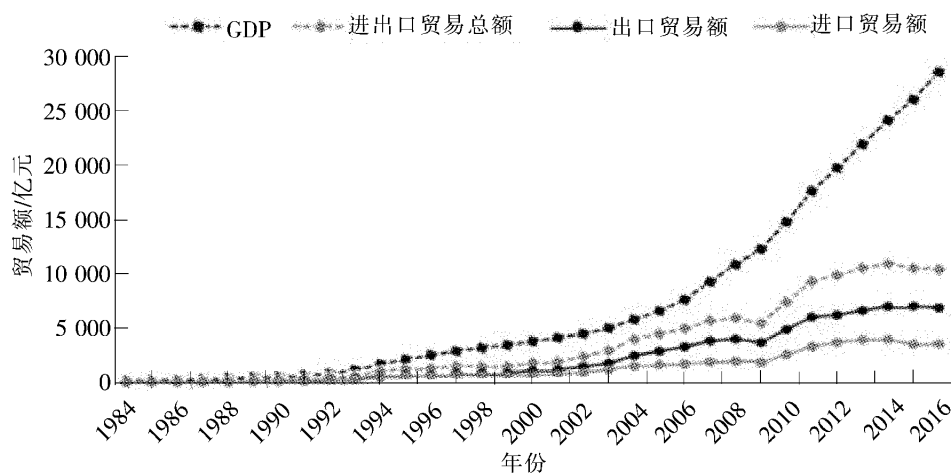


图1 福建省国民生产总值和进出口贸易变化趋势图

(二)福建省对外贸易依存度分析

由图2可知,从1984年到2016年福建省进出口贸易依存度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大多数年份都超过40%,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依存度也均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且出口贸易依存度绝大多数年份要比进口贸易依存度要高。福建省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在1983年仅为11.81%,到1991年突破50%,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出口贸

易依存度有所回落。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后,福建省对外贸易的规模又迅速恢复,在2004年达到最高峰,高达68.26%,之后外贸依存度总体上在不断的下降,在2008年又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外贸依存度明显下降较快。

总体而言,福建省对外贸易的依存度相对较高,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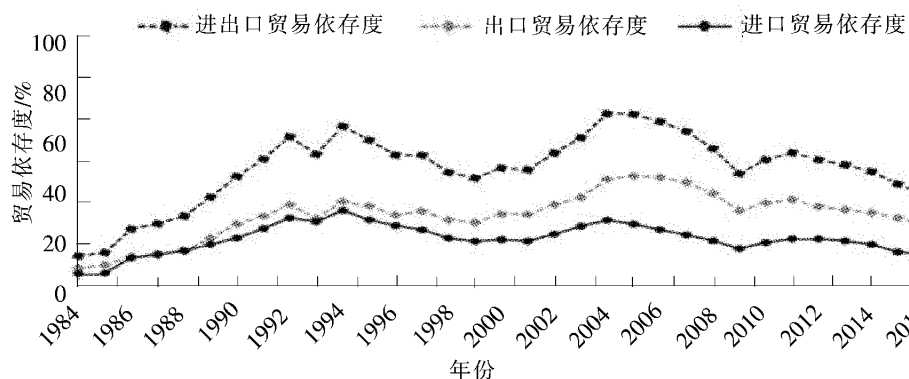


图2 福建省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趋势图

(三)福建省经济增长对进出口贸易的弹性分析

从图3中可以看出,1985—2016年福建省GDP对净出口贸易的弹性系数一直为正数,但是数值相对较小,在0.07至0.32之间,说明净出口贸易增长率变化1%时,对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变化影响相对较小。由GDP对出口贸易的弹性系数变化可以看出,在1998年、2009年以及2016年弹性系数为负值,其他年份均为正值,且

有12年的弹性系数大于1,说明两次的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福建省经济增长;GDP对出口贸易的弹性系数在2015年达到了最大值,为22.67。同时,可以看出在这31年中,GDP对进口贸易的弹性系数也有3年的为负数,且有14年数值大于1,并在2016年达到最大。总体而言,净出口贸易增长率的变化,对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稳定;而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增长率的变化对于福建省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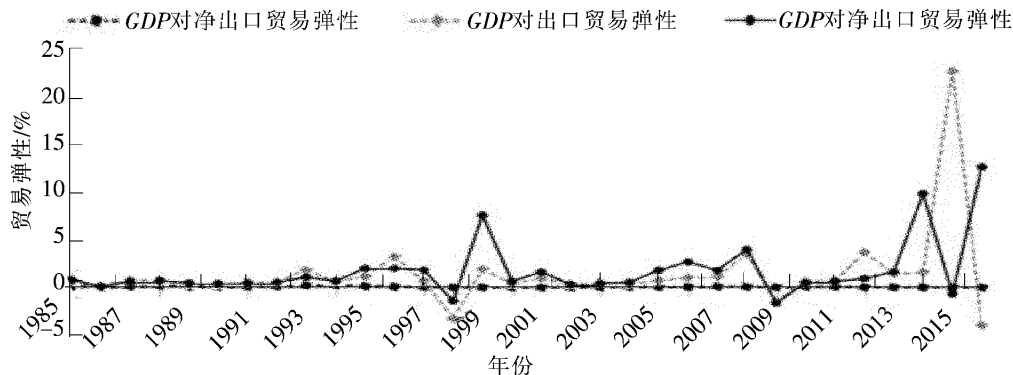


图3 福建省GDP对进出口贸易的弹性系数变化趋势图

(四)福建省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分析

由图4可知,1995—2016年福建省的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GDP的增长率最高时达

到22.6%,即使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中,也能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同时,发现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有12年为负值,且从进入2000年以后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外需对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逐渐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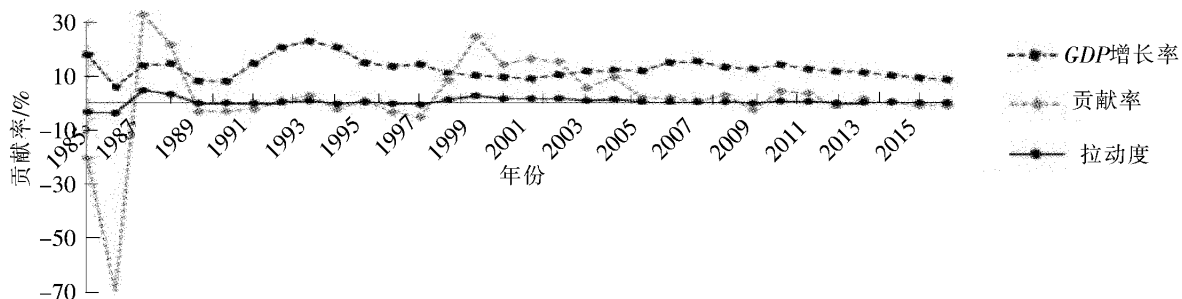


图4 福建省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变化趋势图

三、福建省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分析

(一)数据与变量

通过对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的现状分析,可以初步确定福建省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影响,接下来从计量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论证。本文选用的数据为福建省 1984—

2016 年的 GDP 、进口贸易总额(IM)和出口贸易总额(EX)。其中,用 GDP 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数据均来源于 2017 年《福建统计年鉴》。为确保所研究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线性增长趋势,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对样本进行异方差消除处理,将 GDP 、 EX 、 IM 三个变量分别取对数,得到 $\ln GDP$ 、 $\ln EX$ 、 $\ln IM$,如表 1 所示。

表 1 1984—2016 年福建省 GDP 、进出口贸易额取对数后数据表

年份	$\ln GDP$	$\ln EX$	$\ln IM$	年份	$\ln GDP$	$\ln EX$	$\ln IM$
1984	5.055	2.031	2.392	2001	8.312	6.580	7.050
1985	5.301	2.310	2.793	2002	8.405	6.817	7.271
1986	5.405	3.203	3.240	2003	8.514	7.069	7.467
1987	5.632	3.556	3.515	2004	8.659	7.314	7.797
1988	5.949	3.972	3.964	2005	8.788	7.380	7.957
1989	6.128	4.319	4.456	2006	8.934	7.430	8.087
1990	6.258	4.592	4.851	2007	9.132	7.530	8.242
1991	6.430	4.946	5.141	2008	9.289	7.567	8.284
1992	6.665	5.353	5.530	2009	9.412	7.495	8.200
1993	7.016	5.645	5.699	2010	9.598	7.834	8.485
1994	7.405	6.197	6.307	2011	9.773	8.094	8.699
1995	7.647	6.306	6.496	2012	9.889	8.207	8.728
1996	7.818	6.384	6.545	2013	9.993	8.267	8.794
1997	7.962	6.457	6.744	2014	10.088	8.276	8.849
1998	8.058	6.390	6.715	2015	10.165	8.157	8.853
1999	8.136	6.400	6.753	2016	10.258	8.164	8.830
2000	8.233	6.534	6.974	—	—	—	—

(二)ADF 单位根检验

本文选取的三个变量 GDP 、 EX 和 IM 均为 1984—2016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如果直接使用原始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易产生伪回归现象,所以需要对其 $\ln GDP$ 、 $\ln EX$ 、 $\ln IM$ 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法,具体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可以看出, $\ln GDP$ 、 $\ln EX$ 、 $\ln IM$ 的统计量分别是 -3.074、-5.544、-5.742,均在 5% 的显著水平下通过 ADF 检验,且阶数相同,说明该序列为平稳序列,不存在单位根。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可以直接进行协整检验。

表 2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P 值	是否平稳
$\ln GDP$	-3.074	-3.724	-2.986	0.042	是**
$\ln EX$	-5.544	-3.724	-2.986	0.000	是***
$\ln IM$	-5.742	-3.724	-2.986	0.000	是***

注: *、**、*** 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三)Johansen 协整检验

目前协整检验的方法有 EG 两步法和 Johansen 协整检验两种,本文采取后者对福建省 GDP 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长期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经过多次实验,选择滞后二阶对 LnGDP、LnEX、LnIM 3 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 95%的置信水平下,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根据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可以直接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其长期协整关系模型,得到如下协整方程:

$$\text{LnGDP} = -0.776\text{LnEX} + 1.513\text{LnIM} + 2.799$$

$$(-3.001^{**}) \quad (6.400^{***}) \quad (18.199^{***}) \quad (1)$$

其中调整后 R 方的值为 0.98,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即进出口贸易能够解释 98%的 GDP 水平;同时 D.W 值为 0.33,表明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性;并且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由协整方程(1)可知,长期内福建省出口贸易对 GDP 的增长产生负效应。当其他变量不变时,出口贸易额每增加一个单位,会引致 GDP 反方向变动 0.766 个单位;而进口贸易对 GDP 的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当其他变量不变时,进口贸易额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促进 GDP 增长 1.513 个单位。因此,长期内进口贸易的增加会正向拉动经济增长,而出口贸易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负向抑制效应。同时,协整方程表明,进口贸易对福建省经济增长水平的正向效应要大于出口贸易的负效应。

(四)Granger 因果检验

通过上文的 Johansen 协整检验可知,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水平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尚不能确定三者之间具体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文运用 Granger 因果检验法对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三者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进行验证。

由表 3 的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可知:第一,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福建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原因,即经济增长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表明福建省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互相拉动作用明显。第二,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福建省进口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福建省

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之间相关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第三,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福建省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进口贸易是引起出口贸易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出口贸易不是引起进口贸易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福建省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出口贸易对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表 3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LnEX 不是 LnGDP 的格兰杰原因	2.606	0.093	拒绝
LnGDP 不是 LnEX 的格兰杰原因	2.754	0.082	拒绝
LnIM 不是 LnGDP 的格兰杰原因	2.478	0.104	接受
LnGDP 不是 LnIM 的格兰杰原因	1.347	0.278	接受
LnIM 不是 LnEX 的格兰杰原因	3.166	0.059	拒绝
LnEX 不是 LnIM 的格兰杰原因	0.276	0.761	接受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1984—2016 年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和计量两个方面对福建省经济增长和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第一,福建省的 GDP 与进出口贸易基本上同步增长,对外贸易的依存度相对较高,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明显,并且外需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第二,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长期内进口贸易将会正向拉动经济增长,而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向抑制效应。第三,福建省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短期内相互促进作用明显;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而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上述结论可得出以下政策启示:要充分发挥“三区”叠加政策的显著优势,不断的激发经济发展活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商品结构,提升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首先,突出海洋特色,加快港口设施建设与合作,将国家搭建的合作机制与自身建构相结合,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保驾护航^[10]。其次,积极推进自贸区内的税制改革,提升经济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合理定位

自贸区的功能,扩大贸易的开放程度^[11]。最后,加快两岸产业对接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闽台产业互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合作^[12];构建多层次

常态化交流平台与合作机制,推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参考文献:

- [1]赵晴,雷原.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陕西省1990—2011年数据的计量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80-85.
- [2]乌画,王涛生.中国各地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学术界,2013(10):208-217.
- [3]李颖.出口贸易对中韩经济增长的影响[J].商业研究,2016(9):93-98.
- [4]陆丹亮.进口、FDI对上海市经济增长影响实证分析[J].价格月刊,2011(10):42-45.
- [5]魏浩.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7):3-10.
- [6]李扬子,李孟哲.湖北省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20):147-149.
- [7]边菲斐.我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调研世界,2014(9):13-17.
- [8]杨晓钦,周士元.我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5(22):30-32.
- [9]文华.吉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东疆学刊,2017(1):106-110.
- [10]全毅,张庭祥,林裳,等.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路径与对策[J].东南学术,2017(4):129-137.
- [11]陈少晖,张锡书.产业结构高级化、贸易开放度与福建经济增长[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29-36.
- [12]杨楷,胡滨.福建自贸区与两岸经济合作的路径探索[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5):41-47.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Fujian Province

Zhao Qingjun¹, Wang Yani², Zhou Bifen¹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Fujian province from 1984 to 2016, the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Fujian Province by using ADF test, 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 Granger test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long-term stable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Fujian Province. Import trade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hort term, there is a clear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export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while import trade has no obvious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Simultaneously, import trade will also promote the growth of export trade in the short run. Therefor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Fujian province should transform the growth mode of foreign trade, optimize the commodity structure, accelera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to contribute to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Fujian province; economic growth;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DF test; co-integration test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15-07

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

——基于厦门和漳州的调查数据

王丽云, 周毕芬, 赵清军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本文基于厦门、漳州两地614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并不强烈,只有28.3%的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合理的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对男性农民工而言,就业质量(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及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较低的就业质量不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因此,注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质量;市民化意愿;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03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工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群体。由于受到户籍等多重障碍,农民工长期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他们虽然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户籍仍在农村,社会身份仍然是农民^[1]。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35%,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虽常住在城镇中,却并没有获得城镇户口。近几年来,国家开始不断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并未有所增强。由此可见,农民工是否愿意在城镇落户,不单是受到政策制度的影响,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入挖掘农民工进城不落户的原因对提升户籍城镇化率和实现新型

城镇化战略尤为重要。

农民工进入城镇获取就业机会以及城乡收入差,以满足其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因此,就业质量的好坏将关系到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境遇和生存质量,以及对城市的适应和归属感^[2]。当基本需求层次得到满足后,农民工群体才会转而考虑市民化问题。目前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主要是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制度保障等视角,对于就业质量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性别差异可能导致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的不同影响,基于这一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如何推动农民工向市民转变?就业质量的好坏是否会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本文将基于厦门、漳州614份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和探讨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对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实现新型城镇

收稿日期:2018-07-08

基金项目:福建省软科学项目“农民工城镇就业可持续性与其市民化耦合及政策研究”(2017R0013);福建农林大学科技创新专项基金项目“农民工就业质量与市民化进程研究”(闽农林大社科[2017]8号)。

作者简介:王丽云(1994-),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乡村治理。

本文信息:王丽云,周毕芬,赵清军.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15-20.

化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农民工市民化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人口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意愿—行为”模式,即农民工的市民化行为是由意愿转化而来的^[3]。因此,通过分析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有效地预测市民化结果。

学界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主要是从制度保障、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视角。王桂新认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造成的城乡差距影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市民化进程^[4]。王竹林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只是市民化的动力,能否市民化还取决于市民化的能力^[5]。刘传江、周玲通过对农民工就业的考察认为社会资本的使用有助于农民工的工作搜寻,从而有利于其城市融入^[6]。但是基于性别差异视角系统地探讨农民工就业质量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相对较少,就业质量的好坏是否能提升或增强市民化的意愿,尚未得到系统的实证研究和理论解释。

(二)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就业质量综合反映了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国外对于就业质量的研究起步较早。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第一次提出了“体面劳动”的概念,即让劳动者可以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有尊严地进行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工作。从“体面劳动”的狭义概念来说,它主要是指就业质量^[7]。学者Beaston将就业质量的相关指标进行分类,一类是外显就业特征,包括经济收入、工作时间、就业安全、提升机会等;另一类是内隐就业特征,包括工作满意度、工作紧张感、疾病/伤残风险等^[8]。Lucie&Christine根据就业质量概念的演进发展,提出就业质量还应包括合理且具有公平性的工资、技能与培训、工作条件、工作和家庭兼顾与性别平等内容^[9]。2000年欧盟委员会将“工作质量”的概念进行推广,制定了一系列测量工作质量的指标^[10]。欧洲基金会将就业质量的测量划分为职业和就业安全、健康和福利、技术发展、工作和非工作生活的和谐^[11]。就业质量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

国内对于就业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关注就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近几年,不少学者开始探讨就业质量及其指标问题。马庆发提出应“提升就业质量”而不仅仅是关注就业率,将就业质量划分为职业社会地位、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发展空间等方面^[12]。刘素华建立了我国就业质量量化评价体系,将就业质量的衡量指标量化分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工作稳定性、职工培训、劳动合同、工会组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要素,并赋以不同分值^[13]。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发布的劳动力市场报告,将就业质量指数划分为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状况、劳动报酬、社会保护和劳动关系等六个方面的内容^[14]。部分学者还增加了劳资关系、个人幸福感、工作满意度、职业发展等衡量指标。这些因素都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着密切的关系。

劳动报酬和工作时间是衡量就业质量的核心指标。王桂新、胡健认为获得良好的收入保障是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原因^[15]。当农民工的收入较高时,才能够支付在城市所需的各种生存成本,进而考虑落户或定居的问题。工作时间是指农民工从事工作或者生产的时间。农民工提供劳动的时间越长,其“闲暇”即用于各种娱乐消费的时间就越少。过长的工作时间,使得农民工无暇关注城市发展以及构建本地朋友圈,进而对城市缺乏归属感,从而影响其城市融入。

职业地位通过职业类型来测量,职业类型的不同,意味着其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较高的职业地位不仅意味着良好的收入来源,还使得农民工能够从中得到尊重,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促使农民工产生市民化的意愿。

劳动合同作为劳动者工作稳定性的重要表现。农民工通过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稳定了工作和收入来源,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抵御其在城市环境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黄乾认为农民工进入城镇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有助增强与城市居民的互动往来,进而影响其定居意愿^[16]。因此,就业的稳定性有利于促使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增强。

劳资关系表现为就业过程中农民工和雇主的关系是否和谐。在我国,工会的主要职责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参与工会后,当农民工面对强迫劳动、工资拖欠等情况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对

农民维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参与工会举办的各类文体活动以及就业指导等服务,可以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拓宽本地朋友圈,提升对城镇生活的幸福感及工作的满意度,进而增强市民化的意愿。

农民工的工作保护由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构成。社会保障为农民工抵御风险解决其后顾之忧。由于农民工个体障碍因素的影响,一旦面临疾病、工伤、失业等问题时极易受到重挫。社会保障把农民工纳入到城市福利体制内,增强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维持生计的安全感,进而提升市民化意愿^[17]。住房公积金的缴交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民工在城市购房的压力,实现安居,从而有利于其融入城市,增强市民化的意愿。

作为个体就业质量主观维度的重要评价指标,工作满意度对工作绩效和生活幸福感都具有重要影响。李丹等认为实现生活满意度是驱动农民工入户城镇的主要原因之一^[18]。农民工对于在城市的工作生活越满意,其定居或落户于城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可能选择回到农村并保留农村户籍。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数据来源于就业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项目课题,对厦门、漳州两地以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展开的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本市城镇地区从事非农工作的农业户口人员,年龄16~65岁的农民工。发放问卷共650份,其中有效样本616份,有效回收率94.8%。由于部分变量存在缺失值,最终进入模型的样本为614份。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市民化意愿

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以往的研究中学者选取测量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指标都有所不同。姚植夫、薛建宏将“获得城市户口的意愿”、“定居城市的意愿”和“按照城市生活方式生活的意愿”作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衡量指标^[19]。蔡禾将“永久迁移意愿”操作化为“是否愿意放弃土地”和“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20]。因而,本文将市民化意愿操作化为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其中,城市定居意愿

通过被访者的回答“您是否愿意在本地定居”测量。被访者从很不愿意、不太愿意、说不清、比较愿意、非常愿意等中进行选择。城市落户意愿通过“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城市”进行测量,被调查者从“很不愿意、不太愿意、说不清、比较愿意、非常愿意”等选项中进行选择。为了更加简单明了展现市民化意愿,在建立模型时,将在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中同时选择“比较愿意或者非常愿意”,合并为“有市民化意愿”,即用1表示,将选择“很不愿意、不太愿意、说不清”归为“暂无市民化意愿”,用0表示,最终市民化意愿为二分类变量。

2. 自变量

就业质量是指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的优劣程度。通过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指标对就业质量进行测量。参照已有的文献研究,本文将就业质量操作化为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就业稳定性、劳资关系、社会保障、工作满意度等6个方面。

劳动收入通过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进行测量,以收入取对数纳入到最终模型分析。工作时间通过每周加班天数进行测量,询问被调查者平均每个月工作几天,将工作天数除以四得出每周的平均天数,超过5天即为加班赋值为1,没有加班赋值为0。工作类型主要是询问被调查者所从事的职业类型(普工、管理人员、技工)考察,以普工作为参照组。就业稳定性通过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作为指标。签订劳动合同赋值1,未签订劳动合同赋值0。劳资关系主要通过是否加入工会来衡量。参加工会为1,未参与工会为0。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若被访者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则赋值1,若没有则赋值0。将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降为同一维度,并赋予权重来衡量其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工作满意度主要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对当前的工作满意程度,分为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满意=4和非常满意=5。

3.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文献,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还可能受到个体特征、本地就业年限、住房等因素影响,因此控制性别(男=1,女=0)、教育(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及中专=3,大专=4,本科及以上=5)、本地就业年限(连续变量)、是否购房(已购房=1,

否 = 0)等变量。

四、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现状分析

总体上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不强,其中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工 174 人,占比 28.3%,而无意市民化的比例达到了 71.7%。女性农民工中有市民化意愿 95 人,占比 35.2%。男性农民工中有市民化意愿 79 人,占比 23%。相比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更渴望待在城镇。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所附着的各种权利,使得男性农民工不愿意落户于城镇。同时男性农民工较常是一人外出务工,受家人牵挂等影响,因而市民化意愿不高。

(二)就业质量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1. 控制变量与市民化意愿

从表 1 中模型 1 可知,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现性别、教育差异。女性的市民化意愿是男性的 0.555 倍。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在城镇就业的竞争优势就越大,有利于更好地融入城市,因而其市民化意愿更高。农民工在本地就业的年限越长,其市民化意愿越强。长期在城市生活,对于城市的适应性,相对稳定的城市生活,使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在城市定居的意愿更加强烈。在城市是否购房的市民化意愿是未购房者的 2.341 倍,这说明能否在城市安居是农民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城镇,完成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1 就业质量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 系数(标准误)	模型 2(男性样本) 系数(标准误)	模型 3(女性样本) 系数(标准误)	模型 4(总样本) 系数(标准误)
性别	- 0.588 *** (0.191)	— —	— —	- 0.391 * (0.206)
受教育程度	0.422 *** (0.0864)	0.473 *** (0.145)	0.315 ** (0.143)	0.357 *** (0.0978)
本地就业年限	0.0730 *** (0.0167)	0.0818 *** (0.0248)	0.0777 *** (0.0274)	0.0724 *** (0.0176)
是否购房	0.851 *** (0.250)	0.962 ** (0.386)	0.705 * (0.370)	0.816 *** (0.262)
月收入对数	— —	- 0.522 * (0.307)	- 0.501 (0.380)	- 0.441 * (0.233)
每周工作时间	— —	0.166 (0.337)	- 0.995 *** (0.321)	- 0.432 * (0.223)
管理人员	— —	- 0.282 (0.391)	- 0.930 * (0.490)	- 0.468 (0.298)
技术人员	— —	- 0.266 (0.491)	0.100 (0.982)	- 0.271 (0.422)
签订劳动合同	— —	- 0.299 (0.332)	0.628 * (0.339)	0.136 (0.229)
加入工会	— —	- 0.698 (0.458)	- 0.0800 (0.448)	- 0.325 (0.311)
社会保障及住房公积金	— —	0.736 *** (0.248)	- 0.140 (0.241)	0.284 * (0.168)
工作满意度	— —	0.324 * (0.183)	0.434 ** (0.198)	0.382 *** (0.132)
_cons	- 2.463	0.154	0.925	0.322
N	0.335 614	(2.589) 344	(3.104) 270	(1.910) 614

注:***、**、*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2. 就业质量与市民化意愿

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就业质量相关变量得到模型2、模型3、模型4,见表1。具体来说,劳动报酬不论对男性农民工还是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都表现为负相关的关系,这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大相同。杜宝旭认为,农民工进入城镇的重要原因是城乡收入的差距引起的,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显著差异使得农民工面临着更高的生活消费成本^[21]。李晓阳等认为,农民工的收入虽有所提高,但与城镇居民所享有社会福利等差距才是市民化的关键要素^[22]。因而,不管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农民工而言,在城市高房价和巨大的城市生活压力下,其返乡的可能性变大,市民化的意愿也因此降低。

工作时间对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过长的工作时间对于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显著负向影响。过长的劳动时间使得女性农民工的休息和闲暇的时间减少,导致她们难以兼顾家庭以及构建本地朋友圈,适应城市快节奏的生活,进而降低其市民化的意愿。工作时间对男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可能由于大多数男性承担家庭重任,工作的时间越长意味着加班费更多劳动报酬更高。

与普工相比,女性从事管理岗位的市民化意愿较低。可能是由于女性农民工从事管理岗位的压力大,对自身未来规划还不明确。从工作稳定性来看,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是未签订者的1.874倍。女性农民工通过劳动合同来稳定工作关系进而提升定居于城镇的意愿。

劳资关系主要表现为是否加入工会上,其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被调查者中参加工会的人数不多。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工会组织的存在,或者是单位没有建立工会。

是否享受企业所提供的就业保护关系到农民工在城市抵御疾病、失业、养老等风险的能力。通过模型可以看出,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对男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男性农民工来说在城市落户的前提是能够安居乐业,而住房公积金的缴交无疑有利于其在高房价的背景下实现安居梦,合家欢。社会保障有助于其在城市抵御各种突发风险,提高城市生活安全

感,进而提升男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工作满意度对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市民化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进城是为了寻求一份高收入的工作甚至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因而,不管对男性还是女性农民工,对于工作的满意度越高,对于城市的认同感越强,越渴望留在城市,其市民化的意愿也就越强,

五、结语和讨论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23]。因此,基于性别差异视角探讨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厦门、漳州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进行了初步描述,并通过建模方式测量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城市户籍制度逐渐改革的背景下,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并不强烈,只有28.3%的农民工有明确的市民化意愿。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男性农民工。第二,较高的就业质量是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合理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合同的签订对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对于男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发挥显著促进作用,但城市高消费成本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职业类型和有无参与工会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不具有促进作用。

以上研究表明,在开放户籍制度以外,综合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是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应该完善相关劳动法律法规,为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制度保障。农民工来到城市务工的初衷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收入和工作机会,但由于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呈现二元格局,农民工常遭遇到工资拖欠且不高、劳动强度大、劳动合同形同虚设、社会保障不到位、性别歧视等问题。因此,加强对企业的合同签订、劳动报酬、劳动时间、性别歧视等多个环节监控,充分保护好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不受侵害。

其次,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尤其是住房公积金。有序推进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

参与,支持农民工住所所居、居有所住。同时对在本地就业年限较长的农民工提供优惠性租房和购房政策。

再次,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市场上,自身条件和能力越高才能保证自身不被淘汰。可以根据不同性别农民工的个体差异,提供多样化课程,具体分析指导,增强其在城市就业的可持续

性。

最后,企业应主动承担并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帮助农民工提升就业质量的主体之一,企业可以创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为农民工提供宽广的职业发展空间。让农民工更好地体面劳动,提高其对城市的认同感,进而增强市民化意愿,更好地推进城镇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蒋国保.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分析[J].特区经济,2005(12):130-132.
- [2]聂伟,风笑天.就业质量、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入户意愿[J].农业经济问题,2016(6):34-42.
- [3]张笑秋.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化意愿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J].调研世界,2016(4):17-22.
- [4]王桂新,胡健.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J].人口学刊,2015(6):45-55.
- [5]王竹林.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困境及其缓解出路[J].农业经济问题,2010,31(2):28-32.
- [6]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人口研究,2004(5):12-18.
- [7]国福丽.国外劳动领域的质量探讨:就业质量的相关范畴[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1):86-91.
- [8]Beatson M. Job quality and job security: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job quality and ways of measuring one of its aspect ,job security [J]. Labour Market Trends,2000,108(10).
- [9]Lucie Davoine, Christine Erhel. Monitoring employment quality in Europ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indications and beyond [R]. Document de travail, 2006.
- [10]European Commission. Taking Stock of Five Years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C]. Communication 7. 2001.
- [11]European Foundation. Quality of Work and Employment[C].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1,2002. :6
- [12]马庆发.提升就业质量——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视角[J].教育与职业,2004(12):6-8.
- [13]刘素华.建立我国就业质量量化评价体系的步骤和方法[J].人口与经济,2005(6):34-38.
- [14]赖德胜.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包容性增长背景下的就业质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15]王桂新,胡健.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J].人口学刊,2015(6):45-55.
- [16]黄乾.城市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效应[J].人口研究,2009,33(3):53-62.
- [17]徐延辉,王高哲.就业质量对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基于深圳市的实证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4(2):101-111.
- [18]李丹,李玉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7):151-155.
- [19]姚植夫,薛建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4,36(3):107-112.
- [20]蔡禾,王进.珠三角“农民工”的迁移意愿与影响因素(英文)[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8(3):157-171.
- [21]杜宝旭.农民工市民化私人成本收益均衡系数及其城镇化效应[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39(4):98-109.
- [22]李晓阳,黄毅祥,彭思颖.1989—2010年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3(13):6-8.
- [23]蒋国保.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分析[J].特区经济,2005(12):130-132.

(下转第49页)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21-08

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分析

——基于厦门307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车鑫, 周毕芬, 赵清军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在城市内的生活质量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何去何从。本文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就业质量、社会保险质量、住房质量、社会关系质量、心理认同5个维度对其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整体不高、就业满意度也较低,城镇社会保险覆盖率低,整体住房满意度达不到期望,在本地社会关系网较弱,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够强烈。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应该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将城中村管理划入城市建设中,应该继续提高社会保障福利待遇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关键词:农民工;生活质量;描述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D4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04

一、引言

推进城镇化的前半程中,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特征明显,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储蓄仓,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刘易斯转折点的显现,促使农民工城镇化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1]。据统计,截止到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相较于2016年增加481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13710万人,比2016年增长0.9%,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数量呈上升趋势。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界限已经被放开,一旦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便会成为“边缘人”,如何有序管理这些劳动力便成为了摆在政府职能面前的一大难题。学术界认为,

城镇化的核心为农民工市民化,包括定居地市民化以及户籍市民化两个部分^[2]。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会随着对城市的总体满意度而发生改变,而这个满意度是农民工通过平时的生活质量感受到的。生活质量直接作用于农民工的幸福感,进而使其产生相应的留城行为,可以说对农民工生活质量进行调查是分析市民化水平的前提步骤。本文利用2018年3月厦门针对农民工的调查问卷,进行描述性分析,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进行测评。

(一)文献回顾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针对农村劳动力的词汇,国外将其称为农民移民(或移民工、劳工),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大量农民劳动力,大规

收稿日期:2018-05-26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农业人口转移背景下乡村精英培育机制研究”(FJ2016B084);福建省软科学项目“农民工城镇就业可持续性与市民化耦合及政策研究”(2017R0013);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就业可持续发展研究”(闽教科[2016]23号);福建农林大学科技创新专项基金项目“农民工就业质量与市民化进程研究”(闽农林大社科[2017]8号)。

作者简介:车鑫(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本文信息:车鑫,周毕芬,赵清军.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分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21-28.

模离开原居住地进入到城市中的现象^[1]。在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并且市民化时,生活质量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当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主观质量与客观质量两大方面,实地考量时应从主客观两大维度入手。

以章国荣为首的国家统计局课题组认为,收入和消费、住房、健康和就医、劳动时间、社会保障以及权益保护等 6 个方面可以客观地反映出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高低,并以此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农民工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3]。刘渝琳、刘明等人在已有标准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完善,将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作为重要考察点,总结出就业状况、物质生活、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身心健康、精神生活等 6 个方面分析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并且提出生活质量的提升是这 6 个方面相互协调统一的实现过程^[4]。杨云善认为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以及生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如果农民工的身份没有转变,那么他们无法享有与市民同样的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无法融入社会,最终成为“孤岛人”,生活将持续处于低质量状态^[5]。常韬等人根据对全国 20 个省区市的调查结果做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高低会因教育水平、工作质量、居住条件以及社会保障水平而发生变化^[6]。毕先进通过对农民工的劳动与社会保障进行研究,认为劳动权益的损害、冒险工作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会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居住面积、工伤保险会从正向影响农民工的生活质量^[7]。胡春梅等人从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环境领域、社会领域 4 个维度来测量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水平,得出公平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关键因素,呼吁社会应该更加注重农民工的心理需求^[8]。康绍霞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调查分析,以文化程度、月收入水平、婚姻状况为切入点,细化到居住、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 8 个角度对其生活质量进行评价,最后得出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质量普遍不高的结论^[9]。刘鑫利用 CFPS 数据来分析中老年农民工生活质量,得出包含个体生活方式、社会支持网络在内的社会疏离感与社会凝聚感会显著影响这一群体的生活质量^[10]。梁土坤从经济、社会、心理、制度 4 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民工的主观生活幸福感,以此来判断农民工目前的生活质量^[11]。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现在分析农民工生活质量问题时,基本上都将就业水平、社会保

障、住房条件考虑在内,但大多都是基于常态化与短期性便可实现的因素而做出的因子分析,而轻视了需要长期磨合学习才能显出作用的因素,比如语言掌握度、城市归属感等,因此本文在已有基础上加入社会关系与心理认同指标,对农民工生活质量进行描述性分析。

(二) 生活质量测量指标构建

根据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分析,结合调查问卷,从就业质量、社会保险质量、住房质量、社会关系质量、心理认同 5 个维度来测量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生活质量,具体衡量指标见表 1。

表 1 农民生活质量程度衡量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衡量指标
就业质量	就业稳定性	更换工作次数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就业满意度	日均工作时间
		每月工作天数
		平均月工资 有无工资拖欠 工作满意度
社会保险质量	保险覆盖度	是否购买医疗保险
		是否购买养老保险
		是否购买失业保险
		是否购买工伤保险
住房质量	住房形式	现在的居住形式是怎样的
		是否有住房公积金
	住房满意度	对于住房满意吗
		对于住房安全满意吗
社会关系质量	社会网络情况	朋友圈构成
		与本地人接触次数
	语言掌握力 业余活动	是否能听懂并且掌握 本地方言
		是否参加社区居民 活动
		是否参加社区居民选 举活动
心理认同	身份认同	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 群体
	城市融入	认为自己生活幸福吗 对城市有归属感吗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的数据来自课题组于 2018 年 3 月份前往

厦门对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实地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厦门市不同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共发放350份,回收338份,有效问卷90.83%。将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调查对象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从而将农民工划分为新老两代不同代际的农民工^[12]。本次调查中的农民工大多来自于福建省,少数来自于河南、四川,因此将户籍划分为福建本省和省外两类。

在被调查的群体中,男性占52.77%,女性占47.28%。从年龄来看,17~26岁占比38.11%,27~36岁占35.50%,37~46岁占12.38%,46岁以上占14.01%。从教育水平来看,小学及以下占12.05%,初中学历占27.69%,高中占34.20%,大专学历占15.31%,本科及以上学历占10.75%。从职业分布情况来看,16.12%受访者为管理人员,21.19%为服务员,11.34%为工厂技术工人,2.09%为建筑工人,49.25%的受访者职业为其他。农民工户籍是影响他们与市民社会福利差异的一大重要因素,应该考察户籍地在市民化中起到的作用^[13]。此次调查中,福建省本省户籍比率为55.37%,外来地区户籍人口为44.63%。值得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调查对象的健康状况,据调查显示,身体状况不健康的农民工所占比率为26.38%,64.50%的农民工身体健康。

三、农民工市民化的生活质量分析

(一) 就业质量

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是破解市民化困境、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尤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更加突出^[14]。就业质量会直接决定经济收入,虽然经济收入不能够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生活质量的测量点,但却是提高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基本条件^[2]。就业作为经济收入来源,综合体现出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地位以及经济地位,而后农民工也会享受相应质量的生活。

1. 就业稳定性

根据问卷结果,农民工自从进城工作以来,更换工作次数由0~15次不等,94.46%的农民工转换工作次数在5次以内,无论是新一代农民工或是老一代农民工,皆追求尽量稳定的工作。从劳动合同的签订率来看,43.65%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39.09%签订定期劳动合同,14.01%农民工所签订的合同为不定期合同,3.26%农民工

的劳动合同以完成固定期限的任务为准,可以看出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大部分的劳动权益还没有完全得到保障。

如表2所示,农民工的就业总体呈现出的不稳定性,就业流动性强,这是因为他们想要追求更好的待遇福利^[15]。相较于女性,男性的就业更加稳定。近三年来没有换过工作的男性农民工所占比例为16.05%,女性为9.66%,相差6.39%。新生代农民工变换工作次数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新老两代农民工工作转换次数平均值分别为3次和2次,16.88%的老一代农民工表示没有更换过工作,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此项比率为11.74%,说明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更高。从户籍地来看,外省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更高,说明户籍所在地会影响农民工的未来定居落户意愿,并且外化为工作的更换次数,这与卢海阳的研究结论吻合^[16]。农民工为了改变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而寻求更好的工作岗位,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限制因素则是教育、技能等人力资本,他们对下一代的希冀更多的也在于教育。

2. 就业满意度

本次调查中,总体的就业满意度不高,44.21%的农民工认为当前的工作一般,45.70%的农民工对工作满意,10.09%对工作不满意。26.71%的农民工每个月需要工作26天,19.87%需要工作30天,21.17%每天需要工作10个小时,这一部分农民工整月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为4000元,与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的农民工平均工资为3677元(东部地区)相比有所提升,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呈上升趋势。79.81%的农民工工资在1000~5000元范围内,5000元以上的比例仅为20.19%。

工资是农民工生活中一切物质活动的内生决定因素,从性别差异来看(见表3),男性的工资明显高于女性,月工资水平在5000元以上的男性农民工为31.48%,女性为11.03%,工资在2000元以下的男性比率为5.56%,而女性所占比例为6.09%。从代际差异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工资水平要不如老一代农民工,工资在5000元以上的老一代农民工所占比例为20.78%,高于新生代农民工18.61%。从省级差异来看,工资在4000元以上的省内外农民工所占比例分别为44.7%和43.34%,本省农民工工资略高于外省农民工。从教育年限来看,小学及以下教育水

平的农民工工资主要分布在 3 000 元以下,占比 51.35%,初中及高中教育水平的农民工工资主要分布在 3 001~4 000 元,分别占比 35.29%和 28.57%,大专及本科教育水平的农民工工资主要分

布在 5 000 元以上,分别占比 34.04%和 27.27%,表明农民工的教育仍然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一大因素,教育所带来的回报与教育投资成正比。

表 2 农民工变换工作次数 %

项目	农民工变换工作次数				
	没有换过	1 次	2 次	3 次	4 次及以上
男性	16.05	10.49	22.22	25.93	25.31
女性	9.66	15.17	25.52	28.28	21.38
新生代农民工	11.74	9.57	23.91	29.57	25.22
老一代农民工	16.88	22.08	23.38	19.48	18.18
小学及以下	16.22	27.03	18.92	16.22	21.61
初中	10.59	4.71	23.53	30.59	30.59
高中(中专)	14.29	11.43	22.86	26.67	24.76
大专	8.51	12.77	19.15	36.17	23.40
本科及以上	18.18	21.21	39.39	18.18	3.03
本省户籍	15.88	14.71	19.41	28.24	21.76
外省户籍	9.49	10.22	29.20	25.55	25.55

表 3 农民工的工资分布 %

项目	农民工的工资分布				
	2 000 元以下	2 001~3 000 元	3 001~4 000 元	4 001~5 000 元	5 000 元以上
男性	5.56	13.58	25.31	24.07	31.48
女性	6.09	34.48	28.28	19.31	11.03
新生代农民工	4.35	21.74	30.00	21.74	2.17
老一代农民工	11.69	28.57	16.88	22.08	20.78
小学及以下	21.62	29.73	10.81	27.03	10.81
初中	1.18	25.88	35.29	21.18	16.47
高中(中专)	4.76	20.95	28.57	22.86	22.86
大专	2.13	23.40	25.53	14.89	34.04
本科及以上	12.12	18.18	18.18	24.24	27.27
本省户籍	7.06	21.76	26.47	19.41	25.29
外省户籍	5.11	25.55	27.01	24.82	17.52

(二) 社会保险质量

社会保险做为社会保障的重点内容,牵涉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是农民工在城市内社会公平感的关键来源,也是生活质量的一大影响因素,本文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以及失业保险 4 方面来观察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购买情况,并以此评价农民工的生活质量。

表 4 显示,当前农民工的城镇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且参保项目不完整。城镇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最高达到 43.00%,农村养老保险的购买比

例最低为 28.66%,说明没有购买保险的农民工仍然存在大多数。老一代农民工的城镇参保率低于新一代农民工,整体参保率也低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与老一代农民工落叶归根的思想有关,也体现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需求更高。最为明显的是,身体健康的农民工的参保率高于身体不健康的农民工,并且参保项目整体多于不健康的农民工。此外,本省户籍的农民工倾向于购买城镇保险,省外农民工倾向于购买农村老家中的医疗保险,这是因为本省民工更适应本地生活,他们的主观生活质量感受也会高于外省农民工。

表 4 农民工社会保险购买率 %

项目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城镇	农村	企业职工	农村		
男性	41.36	40.12	37.04	30.86	42.24	33.33
女性	44.83	35.86	38.62	26.21	39.16	33.79
新生代农民工	46.96	33.91	40.00	22.61	44.05	36.09
老一代农民工	31.17	50.65	31.17	46.75	31.17	25.97
身体健康	46.90	36.28	29.63	23.46	44.00	34.96
身体不健康	32.10	43.21	40.71	30.53	31.65	29.63
本省户籍	48.82	32.94	44.12	22.35	46.71	39.41
外省户籍	35.77	44.53	29.93	36.50	33.58	26.28
总体	43.00	38.11	37.79	28.66	40.79	33.55

（三）住房质量

现在城市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城中村,将农民工与本地市民分开,村内的基础设施也不及城市设施齐全完备,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与生活质量。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以后,或是由于没有长期定居的意愿,或是由于城市房价过高而自身收入不充足,难以在城市内买房,居住方式多以集体宿舍或者家庭集体租房为主。在本次调查中,仅有 26.38%的农民工享受住房公积金福利待遇,80.78%的农民工居住在出租房内,10.75%住在集体宿舍,仅有 8.47%的农民工已经买房。囿于买房需要承担的巨额费用支出,他

们更加倾向选择居住在相对来说成本较低的出租房内。

总体看来,目前农民工的住房质量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表 5 显示,针对目前的居住方式,68.73%的农民工持不满意态度,针对居住安全的满意度高于居住条件满意度 25.08%。无论在居住条件或是居住安全满意度上,普遍存在男性的主观满意度低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低于老一代农民工、未婚农民工低于已婚农民工、外省农民工低于本省农民工的情况。居住满意度差的原因多源自于过高的房价,在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状况下,居住问题总是最先触动这个群体。

表 5 居住满意度调查 %

项目	居住满意度		居住安全满意度	
	不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
男性	67.90	32.10	42.59	57.41
女性	69.66	30.34	44.83	55.17
新生代农民工	70.87	29.13	45.22	54.78
老一代农民工	62.34	37.66	38.96	61.04
已婚	66.47	33.53	38.32	61.67
未婚	71.43	28.57	50.00	50.00
本省户籍	64.12	35.88	37.06	62.94
外省户籍	74.45	25.55	51.82	48.18
总体	68.73	31.27	43.65	56.35

（四）社会关系质量

社会关系体现出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状况,也体现出生活外拓程度,在对农民工的市民化生活进行经济、住房、社保等的评价时,也应该注重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17]。

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程度不乐观,有待改善。

本次调查中,58.63%的农民工朋友圈以工友或同事为主,27.36%的农民工主要与农村老乡联系,说明农民工的弱社会关系网络程度得到了提升,以血缘、家缘为主的强社会关系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削弱。根据表 6 可以看出,农民工与本地市民的接触率较低,61.89%的农民工与本地市民的接触较少。男性与本地市民接触多所占比例低于女

性 0.68 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接触较多的比例也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外省农民工与本地市民接触频率更是明显低于福建省本省农民工。在语言的沟通上仍然存在障碍,仅有 35.83%的农民工掌握本地方言。对于新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对自己进城的初衷达成感比较容易满足,这部分群体的社会网格主要由学缘构成,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对于社会的不公平感受很小,就算语言掌握度不高也不会影响日常生活,故新生代

农民工的总体生活质量优于老一代农民工^[18]。

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也可通过业余活动来衡量,此次调查显示农民工参加社区居民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仅有 9.45%的农民工参加过社区居民活动,其中只有 5.54%参加过社区居民选举活动。此外,教育与农民工的社区居民选举活动参与度具有促进作用,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民工会越倾向于参加此类课余活动。

表 6 本地的社会关系 %

项目	与本地市民接触			本地方言掌握情况	
	没有	接触少	接触多	听得懂也会讲	不懂
男性	16.05	59.88	23.46	35.19	64.81
女性	11.72	64.14	24.14	36.55	63.45
新生代农民工	11.74	62.17	26.09	33.48	66.52
老一代农民工	20.78	61.04	18.18	42.86	57.14
本省户籍	10.00	61.76	28.24	48.52	51.48
外省户籍	18.98	62.04	18.98	21.90	78.10
总体	14.01	61.89	24.10	35.83	64.17

(五)心理认同

身份认同是农民工适应并且感知城市生活的最后一环,通过在城市中长此以往的生活,农民工会产生对城市的归属感与主观幸福感,从而产生留城行为。此次调查发现,农民工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感较低,60.59%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村人,25.73%还不能清楚地为自身身份定位。

根据表 7 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不强。男性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低于女性农民工,男性农民工中 51.85%认为自己现在生活不幸

福,30.86%对城市完全没有归属感,而女性农民工的这两个指标占比分别为 48.97%和 19.31%。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知力度强于老一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略低于老一代农民工。福建省本省户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比外省农民工高。感觉自身不幸福的省内外农民工所占比例分别为 50%和 51.9%,对城市有归属感的省内外农民工两个群体分别占比 77.65%和 70.8%。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知与归属感均呈现“N”变化,说明教育可以增加人的幸福感、归属感。

表 7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

项目	主观幸福感		对城市的归属感		
	不幸福	幸福	完全没有	很弱	很强烈
男性	51.85	48.15	30.86	51.85	17.28
女性	48.97	51.03	19.31	60.69	20.00
新生代农民工	49.57	50.43	25.65	58.26	16.09
老一代农民工	53.25	46.75	24.68	49.35	25.97
本省户籍	50.00	50.00	22.35	57.06	20.59
外省户籍	51.09	48.91	29.20	54.74	16.06
小学及以下	62.16	37.84	35.14	40.54	24.32
初中	51.76	48.24	24.71	63.53	11.76
高中(中专)	49.52	50.48	25.71	54.29	20.00
大专	46.81	53.19	23.40	61.70	14.89
本科及以上	42.42	57.57	18.18	51.52	30.30
总体	50.49	49.51	25.41	56.03	18.57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整理了对农民工生活质量的测量指标,并根据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做出描述性分析。综合来看,现在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总体质量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本省户籍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优于外省户籍农民工。虽然现在农民工以亲缘、血缘、家缘为主的强社会关系已经弱化,但农民工更愿意将来回到老家,落叶归根思想仍然占据主流思想地位。关于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由于地理位置、受访者主观思想、调查地点客观原因等,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测评标准,因此本文所选择的测量指标是基于厦门市客观情况与受访农民工在回答问卷时的语言交流,这是本文的最大不足。今后的研究中,如果可以有较为权威的评价标准,那么文章的分析结果会更加具有说服力,这也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问卷调查的同时,与农民工的交流不仅限于问卷当中谈及的问题,据此,总结出以下启示:

(1)应该加强人力资本的累积,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使他们可以具备更高的个人技能。个人技能会决定农民工可以从事的职业类别,当一个人从事较高的职位时,他的心理自豪感会提升,随之提高的还有整体生活质量,这种切身感受使得许多农民工十分注重子女教育。

(2)针对城中村,政府应该进行整改,调查时

很多农民工表示城中村的环保很不到位,整体的生活环境较差,这一点令他们很不满意。政府在着力加强城市整体市容市貌完善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城市中的弱势群体的需求,统筹兼顾整体的发展。城中村建设的忽视,使得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内卷化”,在他们看来,他们与城市市民存在差别,心理落差会持续拉大,整体的生活质量会随着这种落差而降低。

(3)应该继续积极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拉低城乡社会保障的福利待遇差别,可以适当地提高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福利,促使农民工增加购买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19]。目前我国的新农合与城镇医疗保险已经整合一体化,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很多农民工仍然表示外来农民工享受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不如本市人,很多福利仅限于本地市民,这说明社会保障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改革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停留于同市城乡的社保改革。

(4)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加强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使他们感觉到社会公平,增强自身的生活质量保障。劳动合同是保障劳动者权益最重要的方法,应该加强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考虑到农民工的流动性以及未来定居意愿,不一定要签订定期合同,可以根据农民工的职业规划而设置不同类别的劳动合同。在劳动者权益保护中,加大监管,对于不懂法律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保障人身安全,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 [1]李开宇,李九全,王锴.基于城市社会地理学视角的农民工城镇化研究[J].人文地理,2011,26(5):39-42,132.
- [2]龚紫钰.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1):137-146.
- [3]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章国荣,盛来运,王冉.中国农民工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研究,2007(3):13-19.
- [4]刘渝琳,刘明.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现状及成因分析——来自重庆市农民工样本的调查[J].人口学刊,2009(1):31-36.
- [5]杨云善.制度供求失衡: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障碍及破解思路[J].求实,2012(3):48-50.
- [6]常韬,许萍,张立军.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2012年全国20个省区市的样本[J].调研世界,2013(10):32-35.
- [7]毕先进.劳动权益、劳动条件与社会保障——农民工生活质量研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0(2):38-46.
- [8]胡春梅,曹成刚,何华敏,等.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组织公平感[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4,28(5):398-400.
- [9]康绍霞.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调查分析——以河南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2015(16):118-119.
- [10]刘鑫.中老年农民工社会疏离感与生活质量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6.
- [11]梁土坤.代际延续还是适应转化: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城市适应理论的实证分析[J].

- 中国青年研究,2018(2):66-74.
- [12]田新朝,张建武.基于双重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人口与发展,2013,19(1):2-12.
- [13]王桂新,胡健.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J].人口学刊,2015,37(6):45-55.
- [14]张洪霞,崔宁.市民化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基于全国3402个样本数据的调查[J].调研世界,2014(11):25-28.
- [15]明娟.工作转换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工作原因、行业、城市转换维度[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38-45.
- [16]卢海阳,梁海兵,钱文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与政策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5,36(7):26-36,110.
- [17]汤兆云,张憬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数据的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7(5):8-15.
- [18]刘林平,王苗.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80后农民工与80前农民工之比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3(5):136-150.
- [19]李迎生,袁小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因应——以农民工为例[J].社会科学,2013(11):76-85.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a survey of 307 migrant workers in Xiamen

Che Xin, Zhou Bifen, Zhao Qingj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0, China)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flooded into citie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cities directly affects the migrant workers' whereabouts. This article u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living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five dimensions: employment quality, social insurance quality, living conditions quality, social relations quality, and psychological ident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is not high, and the job satisfaction is also low. The coverage of urban social insurance is low, and the housing satisfaction does not meet expectations. The social network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is weak, and they lack of a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it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villag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urban construction, meanwhile, the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the interests of migrant workers should be guaranteed.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quality of life; descriptive analysis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29-07

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张曼玉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本文在对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福建省46个村的调研数据,从社会资本总体情况和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互惠规范、关系网络、社会信任)考察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维度的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对收入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退养户社会资本存量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且社会资本的三个分维度对生计策略选择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年龄大的退养户其收入低于年轻退养户,且退养户年龄越大,其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

关键词: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生计策略;收入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18.04.05

随着国家逐步加大养殖污染治理力度以及建设生态文明的需要,南方水网区生猪退养户群体因此日益扩大,继而出现退养户需重新选择生计策略的局面。生计是建立在资产、能力和活动等基础之上的谋生方式,生计策略则是人们为了达到生计目标而进行的活动和做出选择的范围及其组合,生计策略的选择对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1]。而中国在传统上便是一个关系型社会,在此背景下,深刻体现退养户群体特征及制度背景特征的社会资本成为研究退养户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视角^[2]。社会资本产生于人们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资源交换与情感关系,主要是由关系网络、社会信任和互惠规范三个方面所组成,人们交往的网络结构主要分为结构洞、结构封闭,这两种不同的网络结构都能产生社会资本^[3-4]。

目前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社会资本的对收入、就业寻找、经济绩效等问题^[5-6]。例如,章元、刘林平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具有显著影响,而有的学者提出社会资本对收入具有显著影

响;同时,社会资本有助于人们找到工作机会,社会资本维度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至少相当于教育或人力资本的作用^[7-13]。但较少文献以退养户为研究对象,更少文献从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出发,探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和社会资本总体情况对退养户收入和生计策略分别有何影响。

中国农村是“熟人社会”和“人情社会”,我国农村社会比较注重构建基于家庭之上的人情关系网络,农村中的“人情”可以带给人以信任、依托、互助等各种好处,社会网络越发展,社会资本存量越高。在这样的关系社会中,退养户的家庭收入、生计策略选择与其生活中的社会资本是不是存在联系以及存在怎样的联系正是本文研究兴趣所在。为此,本文利用福建省364个退养户的调查数据,就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填补目前关于退养户文献研究以及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生计策略选择文献的空白,进而为政府关于退养户就业问题等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收稿日期:2018-06-25

作者简介:张曼玉(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本文信息:张曼玉.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29-35.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 社会资本与劳动力收入研究

自从 Bourdieu、Coleman 和 Putnam 等人先后提出并发展了社会资本概念以来,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领域尤其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许多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在改善收入甚至减少贫困方面发挥作用^[14-15]。

由于退养户是一个新兴的群体,比较缺乏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不过目前可以借鉴的是对农民工这方面的研究^[16-22]。从理论上来看,目前许多学者已对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收入水平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但基本上都是从社会资本单方面探讨其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23-24]。例如,唐灿、冯小双考察“跨越型”社会资本对工资的影响;孙立平主要研究“整合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也有学者从总体上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叶静怡、衣光春认为社会网络不仅在减少搜寻工作成本方面有影响,而且对提高收入水平也有重要影响。更有研究提出,因为非市场互动的存在,市场均衡的结果将根据社会地位和收入对人们进行分层,会出现所谓的“群分效应”,因而对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和公共品消费等产生显著负向影响^[25]。因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年收入具有正向影响。

(二) 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

目前有些学者做了生计策略方面的研究,但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研究较为缺乏,可供借鉴的是对职业获得的研究^[26-30]。在社会资本领域,社会网络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研究,个人的社会网络影响其职业获得的结果是其核心命题。为了验证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采用两种思路:第一种是考察个人在职业获得过程中动用的社会网络资源与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是考察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与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普遍支持了这两种研究思路,即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和在寻找

工作过程中动用的社会网络资源分别与个人职业获得结果之间存在关联^[31]。社会资本可帮助那些由于信息不对称或逆向选择问题而不能识别求职者特征的企业筛选员工,雇主也动用社会网络资源来获取潜在雇员的信息,许多企业都会给被推荐的职位申请者机会。社会资本有利于人们找到工作,赵延东通过对下岗工人再就业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职工再就业的作用相当明显,具有丰富社会资本的下岗职工不仅能更容易获得再就业机会,也更可能找到好工作^[32]。本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退养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选择非农生计策略具有正向影响。

二、研究方法 with 数据说明

(一) 研究方法

生计策略体现农户对生计资本利用的程度和经营活动的选择,生计策略选择适当,才能够实现生计目标。Scoones 认为生计策略主要有两种:一是单一依靠农业生产的生计策略,农业生产的集约型或粗放型不仅要依靠土地的肥沃程度,还要依靠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二是生计多样化,生计多样化关注非农生产,如从事副业、外出打工或经商等^[33]。本文根据延平区和龙岩市农民生计活动的实际情况,将退养户的生计策略分为两类:以农业专业型为主的生计活动和以非农为主的生计活动。本文以生猪退养户的收入和生计策略选择作为因变量,将它们作为实证分析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其中收入是连续变量,生计策略是 0-1 虚拟变量,0 代表选择以非农为主的生计策略,1 代表选择以农业专业型为主的生计策略。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包括三个维度: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互惠规范,由于社会资本各个维度的变量都是虚拟变量,通过对以上社会资本变量进行加总平均后,获得社会资本存量总水平的测度。本文将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各维度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作为实证分析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以及健康状况。基于上述分析构建模型如下:

$$y_1, y_2 = f(x_1, x_2, x_3) \quad (1)$$

$$y_1, y_2 = f(x_1, x_2, x_3, x_4, x_5, x_6, x_7, x_8) \quad (2)$$

$$y_1, y_2 = f(x) \quad (3)$$

$$y_1, y_2 = f(x_1, x_2, x_3, x_4, x_5, x_6)$$

(4)

上述(1)式是社会资本存量的三个维度对因变量影响的模型;(2)式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社会资本存量的三个维度对因变量影响的模型;(3)式是社会资本存量总水平对因变量影响的模型;(4)式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社会资本存量总水平对因变量影响的模型。

(二)数据说明

围绕主题,本文借鉴了代表性文献(Han)的测度方法,并根据生猪退养户实际情况设计问卷^[34]。为保证问卷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作者首先进行了预调研,2017年5月在福建省退养户比较集中的南平市延平区,通过随机抽样调查获取30份问卷。根据被调查对象反馈的信息和变量测度的信度检验,修正了问卷中题目的选项设置和表达方式,形成正式调查问卷。在2017年七八月份,分别到猪栏拆除比较典型的南平市延平区和龙岩市进行调研,并在调查前进行培训以保证调查质量和效率。本次调研调查地点包括46个村。此次调研总共发放380份问卷,剔除无效样本(数据空缺或前后矛盾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364份,有效率为95.78%,其中南平市延平区回收280份问卷,龙岩市回收84份问卷。

(三)样本描述

调查发现,福建省生猪退养户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为51.83岁和6.37年,可以看出,退养户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这或许是由于退养户人群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当时的教育普及程度不高且农户的受教育意识也比较薄弱所导致的。从表1中可以发现,退养户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社会资本总量均值达0.72,其中,互惠规范均值0.76,关系网络均值0.68,社会信任均值0.7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退养户社会资本较多,但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的退养户居多,一方面或许是由于退养户教育水平、年龄和生存技能的限制,致使其选择对文化和技术要求较低的农业型生计策略,另一方面与退养户的身体状况也密切相关,可以发现退养户健康状况均值达0.83,符合农业型生计策略对退养户身体状况的高要求。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退养户的收入水平较高,经了解,由于是在退养初期获取的数据,退养户刚好领取以两百块一平米为标准的退养补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因此退养户的收入水平此时较高。表1是模型变量说明及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模型变量说明与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说明	均值	标准差
生计策略	以农业为主生计策略 = 1; 以非农为主生计策略 = 0	0.69	0.46
年收入对数	年收入(原单位:元)的对数	12.27	0.78
社会资本	所有具体社会资本变量加总平均所得结果	0.72	0.34
互惠规范	能否与村民相互帮助:能 = 1; 否 = 0	0.76	0.43
关系网络	与所来往的村民关系如何:自评关系好 = 1; 自评关系不好 = 0	0.68	0.47
社会信任	村民是否值得信任:是 = 1; 否 = 0	0.72	0.45
性别	性别:男 = 1; 女 = 0	0.96	0.20
年龄	岁	51.83	9.21
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数(年)	6.37	3.46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程度低 = 0; 自评健康程度高 = 1	0.83	0.38
地区	南平市 = 1; 龙岩市 = 0	0.77	0.42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估计模型之前,本文已对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检验表明,各变量 VIF

(方差膨胀因子)值均低于2,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由于横截面数据回归普遍存在异方差问题,所以本文直接采用计算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方式(heteroskedasticity-ro-

bust standard error)进行统计推断^[35]。由于收入是连续变量,所以采用 OLS 回归分析,而生计策略是二分变量,因此采用 Logistics 回归分析。模型 1 只加入了社会资本分维度变量,模型 2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纳入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和地区这 5 个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建立的,模型 3 只加入社会资本总体情况,模型 4 是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所建立的。

(一)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

根据表 2 的估计结果,退养户社会资本对退养户收入回归系数为正,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退养户的社会资本存量高会使其收入增加,退养户社会资本是其一种隐性资本,其所拥有的人脉关系等对其各方面都会有潜在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资本丰富退养户的收入高于社会资本匮乏的退养户也不难理解。从表 2 可以看出,退养户的关系网络对其收入的影响也在 1%的水平显著为正,这说明退养户关系网络越发达,其收入越高。在调研访谈中也有发现,关系网络

丰富的退养户在投资经营方面要比关系网络贫乏的退养户敏锐且其信息来源多而广,这直接影响退养户选择最优工作方式以实现收入最大化。表 2 中退养户互惠规范对收入的回归结果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示退养户互惠规模越大、越遵守规范,其收入越高。中国是关系型社会,非常讲究人情世故,受到帮助必将给予回报。在这种环境下,退养户之间会形成相互促进的氛围,相互介绍彼此的人脉,其社会网络也会因此越来越发达,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收入因此要高于互惠规范差的退养户。从表 2 的统计结果来看,社会资本维度中的社会信任对退养户收入并无显著的影响,这或许与中国农村的大环境有关,中国农村民风淳朴,居民之间彼此熟悉、信任度普遍较高,尽管如此但以群分现象普遍,社会资本丰富的退养户平时会更多地与社会资本丰富的村民交往,因此社会资本匮乏的退养户并不能真正融入社会资本丰富的退养户群体中,因而其收入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表 2 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的影响

变量名称	因变量:退养户年收入对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社会资本	—	—	0.413 8***	0.425 0***
互惠规范	0.210 7 **	0.203 2 *	—	—
关系网络	0.286 2***	0.292 2***	—	—
社会信任	-0.056 8	-0.046 2	—	—
性别	—	-0.172 0	—	-0.198 6
年龄	—	-0.014 8**	—	-0.014 7**
受教育状况	—	-0.005 4	—	-0.003 2
健康状况	—	0.140 9	—	0.127 8
地区	—	-0.107 3	—	-0.098 4

注: *、**、*** 分别表示 10%、5%、1%显著水平。资料由作者通过 STATA 软件计算后整理得到。

(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

表 3 中社会资本的系数在 1%的水平显著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存量越高的退养户,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退养户社会资本存量高意味着其人际关系各方面较为发达,村民对其信任度比较高,得到其他人各方面的支持也比较多,这为其选择非农生计策略奠定了群众基础。退养户在这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群众基础之上,对于生计方式的选择自然就比社会

资本存量低的退养户多了许多,也因此其选择就不再局限于只依靠体力的农业生计方式,更多的是选择依靠多方面能力的非农生计策略,从纯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在访谈中不难发现,退养户们对非农生活非常向往,他们认为非农不仅是一种体力解放,更是生计策略的一种升级,很多退养户由于现实生活的种种限制不得不选择农业型生计方式,是因为生活所迫而做的选择,这也印证了实证结果是有现实基础的。从表 3 中可以发现,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关系网络在 10%的水平显著为负,这说明退养户关系网络越发达、互惠程度越高、对村民越信任,其更愿意选择非农生计策略。退养户对村民越信任就越放心与他们共事、相互交流就业创业的信息,而不仅仅再局限于“一亩三分地”的劳动中,这是社会信任程度高的退养户选择非农生计策略的一大助力,研究表明,信任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并减少干预或纠正不诚实行为的需求(James 等);降低甚至消除了控制或契约的需要^[36]。而非农生计策略对退养户的社会交往能力要求明显高于农业生计策略,社

会交往能力强的退养户比较活跃,在枯燥乏味的农业劳动面前显然很难坚持,这种特征就决定了社会交往能力强的退养户更愿意选择非农生计策略,某种意义上,他们认为非农生计方式能发挥其独特价值,这是社会交往能力弱的退养户所不具备的。在我们调研访谈中也可以发现,关系网络丰富的退养户在号召力以及人员调配方面在村里都比较有权威,大家也很支持他们,这在关系社会中比较普遍,研究表明(陆铭),人更愿意支持自己熟悉的人,这是退养户选择非农生计策略的一种推动力。

表 3 退养户各社会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变量名称	因变量:退养户生计策略选择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社会资本	—	—	- 1. 948 1***	- 1. 962 4***
互惠规范	- 0. 721 3**	- 0. 770 6**	—	—
关系网络	- 0. 538 2*	- 0. 559 8*	—	—
社会信任	- 0. 768 9**	- 0. 731 3**	—	—
性别	—	0. 626 2	—	0. 585 4
年龄	—	- 0. 030 4**	—	- 0. 030 2**
受教育状况	—	0. 024 9	—	0. 024 5
健康状况	—	- 0. 294 1	—	- 0. 289 1
地区	—	0. 538 4*	—	0. 547 6*

注: *、**、*** 分别表示 10%、5%、1%显著水平。资料由作者通过 STATA 软件计算后整理得到。

（三）其他控制变量对退养户收入和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表 2 回归结果显示,退养户年龄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退养户年龄越大,其收入水平越低。由于调研的时间是在退养初期,退养户这时候的收入包括了退养补贴,退养补贴与其养殖规模大小密切相关,年龄大的农户由于精力、体力各方面状况不如年轻人,其养殖规模自然比年轻农户小,退养补贴也就少,因此在收入上就呈现出年龄越大的退养户收入越低的情况。退养户性别、受教育状况与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表明这些个人特征对退养户收入影响不大,这或许是由于调研对象的健康程度和受教育水平差异不大所造成的。表 3 的回归结果显示,退养户年龄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退养户年龄越大,其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

略;控制变量地区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南平市的退养户更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一方面,调研样本主要集中在南平市;另一方面,南平市的非农资源较龙岩市更为丰富,这是南平市退养户更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的重要原因。从调研结果来看,虽然退养户总体健康状况在中等偏上水平,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其身体状况不适合从事繁重的农业活动,且年龄大的退养户社会资本存量要高于年轻退养户,这更有利于开展非农生计策略。我们的访谈中发现,由于年龄大的退养户在生活、养育子女等各方面的压力要远低于年轻退养户,因此年龄大的退养户更倾向于选择轻松一些的生计方式。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福建省退养户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的总体情况以及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互惠规

范、关系网络、社会信任)分别考察了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计量分析结果来看,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具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收入越高,其中退养户的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影响其收入较为突出。第二,总体来说,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显著,且社会资本的三个分维度对生计策略选择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退养户社会资本存量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退养户社会资本存量高意味着其人际关系各方面较为发达,这为其选择非农生计策略奠定了群众基础,社会资本丰富的退养户在这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群众基础之上,更多的是选择依靠多方面能力的非农生计策略,从纯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三,年龄大的退养户其收入低于年

轻退养户,且退养户年龄越大,其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大的退养户其身体状况不适合从事繁重的农业活动,另一方面年龄大的退养户其生活压力远小于年轻退养户,因此其更倾向于选择轻松一些的生计方式。

通过研究,得到以下启示:第一,需要加大对农村社会资本的投入。增强退养户家庭与内外部的联系程度,整合农村现有民间组织资源,在交际过程中培育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提升退养户个体社会资本等,最终形成主体信任、沟通协作和规范有序的运行机制。第二,加大对退养户的技能培训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缓解当前退养户生计困难问题。第三,完善退养户创业就业补贴制度,减少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后顾之忧,进而更好的实现生计可持续。

参考文献:

- [1] Chambers R, Conway R.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J]. IDS Discussion, 1992; 296.
- [2] 郑世忠, 乔娟. 农户社会资本及其对借贷行为的影响[J]. 乡镇经济, 2007(12): 64-67.
- [3] (法) 布尔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34-56.
- [4] Burt R S.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0 (22): 345-423.
- [5] Zhang X, Li G. Does Guanxi Matter to nonfarm employment?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31): 315-331.
- [6] Hellerstein J K, M Mc Inerney, D Neumark. The importance of residential labor market networks [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1, 29(4): 659-695.
- [7] 章元, 陆铭. 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J]. 管理世界, 2009(3): 45-54.
- [8] 刘林平, 张春泥. 农民工工资: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 ——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模型[J]. 社会学研究, 2007(6): 116.
- [9] Knight J, Yueh L.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labour market in China[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8(3): 389-414.
- [10] 叶静怡, 衣光春.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J]. 学习与探索, 2010(1): 143-144.
- [11] 刘林平. 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5): 112-124.
- [12] 翟学伟. 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J]. 社会学研究, 2003(1): 1-11.
- [13] Whiteley P F.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apital [J]. Political Studies, 2000(48): 443-466.
- [14] Abdul-Hakim R N A, Abdul-Razak, R Ismail. Does social capital reduce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erengganu, Malaysia [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010(14): 556-567.
- [15] Grootaert C, G Oh, A V Swamy.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Burkina Faso[J].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002(1): 4-38.
- [16] 王春超, 周先波. 社会资本能影响农民工收入吗? ——基于有序响应收入模型的估计和检验[J]. 管理世界, 2013(9): 55-68.
- [17] 叶静怡, 周晔馨. 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民工收入——来自北京农民工调查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0(10): 34-46.
- [18] 何国俊.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J]. 农业技术经济, 2008(1): 57-58.
- [19] 李树茁.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 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J]. 当代经济科学, 2007(1): 25-26.
- [20] 章元, Mouhoud, 范英. 异质的社会网络与民工工资: 来自中国的证据[J]. 南方经济, 2012(2): 4-5.
- [21] 周晔馨. 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吗? ——基于中国农户收入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2(7): 84-85.
- [22] 叶静怡, 薄诗雨, 刘丛, 等. 社会网络层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基于身份定位模型的分析[J]. 经济评论, 2012(4): 31-32.
- [23] 唐灿, 冯小双. “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J]. 社会学

- 研究,2000(4):72-73.
- [24]孙立平. 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50.
- [25]陆铭,张爽.“人以群分”:非市场互动和群分效应的文献评论[J]. 经济学(季刊),2007,6(3):991-1020.
- [26]王娟. 山区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分析——基于滇西南农户的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2014(9):97-107.
- [27]陈卓,续竞秦,吴伟光. 集体林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差异及生计满意度分析[J]. 林业经济,2014(8):36-41.
- [28]A Soltani. Poverty,sustainability and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Zagros,Iran[J]. Ecological Economics,2012(79):60-70.
- [29]Tefaye Y.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 role of forest income in participatory-managed forests of Dodola area in the bale highlands, Southern Ethiopia[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2011(13):258-265.
- [30]朱建军. 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2016(2):49-59.
- [31]魏永峰. 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问题与研究方向[J]. 浙江社会科学,2009(5):107-108.
- [32]赵延东. 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J]. 社会学研究,2002(4):43-44.
- [33]Scoones I.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 IDS Working Paper,Brighton: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8:72-75.
- [34]Han S. Compositional and contextual associ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and self-rated health in Seoul, South Korea: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evidence[J]. Social Science&Medicine,2013(80):113-120.
- [35](美)伍德里奇. 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的经济计量分析[M]. 王忠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0-45.
- [36]James H,Sykuta M. Property right an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er-owned firms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J].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2005(4):545-580.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Income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Zhang Manyu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income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of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f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on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and total social capital, by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46 villages in Fuji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e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income, and the reciprocal norms and relationship network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also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income. The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social capital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their livelihoods strategy choice, the higher the stock of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social capital, the more inclined they are to choose off-farm livelihoods strategy.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hav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 of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Aged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have lower income than young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and the older the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the more they tend to choose non-farm livelihood strategies.

Key words: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social capit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come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36-09

“985工程”院校科研效率的时空差异与成因分析

——基于面板数据与EBM模型

刘悦, 汪克亮, 孟祥瑞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以“985工程”院校为研究对象,首先采用兼容径向与非径向特征的EBM(Epsilon-based Measure)模型测算2007—2015年36所“985工程”院校的科研效率,并分析效率的时空差异特征;其次,从投入要素视角对各所“985工程”院校科研资源无效率进行解构,测算各投入要素的贡献率;最后,根据EBM模型计算得到的投入目标值与实际值的差值测算各所“985工程”院校科研资源节约潜力指数。结果表明:“985工程”院校科研效率水平较低,不同院校间效率差异显著,地区间效率差异较小,科研资源节约潜力较大;“985工程”院校整体科研效率恶化主要是由纯技术效率下降所致;科研资源人员投入与经费投入要同时把控,并重点关注经费投入。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985工程”院校实现科研资源高效利用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关键词:“985工程”院校;科研效率;时空差异;EBM模型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06

一、引言

在国际竞争尤其是人才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科学评价高校效率、合理配置科研资源是关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问题。1998年5月,国家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985工程”是国内最顶尖的一批高校,获得了绝大部分稀缺优质科研资源,拥有中国最先进的设备、最优秀的师资力量、最充足的科研经费、最优异的生源等。在此背景下,衡量这些“高消耗”院校的科研活动质量,进行科学的效率评价和绩效引导是非常必要的。当前,中央及地方政府用于“985工程”建设的投入资金累计超过

千亿元,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仍无法完全令人满意,且“985工程”的经费中绝大部分直接来自于政府拨款,因此其效率水平、内部资源配置及分配依据和标准也一直备受关注、饱受争议^[1]。因此,对“985工程”院校进行科研效率评价和实证研究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和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对高校科研效率展开研究^[2-16]。国外研究大部分集中在高校或者院系科研效率的评价,而国内的研究对象更为多样,主要包括不同省市的高校整体、高校本身和高校院系等,如表1所示。学者们对高校科研活动效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的局限,现有文献仍存在以下不足:

收稿日期:2018-02-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71403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3YJC79013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5T80643)

作者简介:刘悦(199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

本文信息:刘悦,汪克亮,孟祥瑞.“985工程”院校科研效率的时空差异与成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与EBM模型[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36-44.

(1) 科研效率测算模型大多采用径向模型,如 CCR 模型和 BCC 模型,忽略了松弛变量的影响,容易产生与现实背离的研究结论;(2) 现有文献通常将产出指标为 0 的变量剔除以满足 DEA 对投入产出指标非空的要求,导致低估部分高校的科研效率水平;(3) 大多数文献研究区间较短或者只研究某一年,使得实证结果无法全面体现其变动趋势;(4) 实证分析多是对模型测算出的效率值进行评价,没有对科研资源无效率进行深层次探究。

表 1 基于 DEA 方法的高校科研效率评价相关文献及分类^[7-16]

决策单元	模型或方法	作者	研究内容	评价对象/数据时间
不同省市的高校作为一个整体	CCR、BCC	徐娟	不同省市高校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31 个省市的高校;2006 年
	CCR、BCC、Malmquist 指数	郭峻等	不同地区高校科研资源配置效率	31 个省市的高校;2004—2008 年
	CCR、BCC	王欢等	各省份高校科研投入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	28 个省份的高校;2001—2009 年
不同高校如教育部直属高校、“211 工程”高校、“985 工程”高校或普通高校等	DEA 和多指标综合评价	王晓红等	修正的大学科研绩效评价方法及应用	57 所大学;2001 年
	CCR、BCC	陆根书等	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科学研究效率及其变化趋势的分析	54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2000—2002 年
	CCR、BCC	胡庆江等	对重点院校的科研效率实证分析并提出改进措施	36 所“985 工程”院校;2001、2003、2006 和 2008 年的平均值
	BCC	陈立泰等	对高校科研效率进行评价	西部 23 所省部共建 211 高校;2007—2009 年
	CCR、BCC	姜彤彤	测算高校科研效率并进行区域差异分析	36 所“985 工程”高校;2005—2010 年
高校院系	CCRMP	王莹等	对高校科研效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	8 所高校的管理学院,文中未提
	PCA、BCC	王冬梅	对校基金的科研成果进行评价	7 个理工科学院,2003—2008 年

因此,本文尝试从上述几方面改进研究工作。首先采用兼顾径向与非径向特点的 EBM 模型测算 2007—2015 年中国 36 所“985 工程”院校的科研效率;其次,利用 EBM 模型的性质将“985 工程”院校科研资源无效率基于每种投入要素视角进行分解,计算各投入要素的贡献率,以此追溯无效率的深层次来源;最后,结合高校效率评价结果,对不同高校提出不同的改进措施与政策建议。

二、方法与模型

DEA 能够有效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问题,并且减轻随机前沿分析(SFA)具体函数形式的限制,从而更具现实解释力。从测算方法来看,

经典的 DEA 模型主要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径向测算为基础的模型,如 CCR 模型和 BCC 模型,另一类是以非径向测算为基础的模型,如 SBM 模型。前者忽略非径向松弛变量的影响,容易产生与现实背离的结果;而后者虽然包含了非径向的松弛变量,但损失了效率前沿投影值的原始比例信息。为了改进这一局限,Tone 和 Tsutsui 提出了一种兼容径向比例和非径向松弛的 EBM (Epsilon-Based Measure) 模型^[17],从而更加真实、准确地评价决策单元相对效率。对于具有 m 个投入要素(x)和 s 个产出要素(y)的 n 个决策单元,投入导向规模报酬不变 EBM 模型的线性规划表达式为:

$$\begin{aligned} \min \gamma^* &= \theta - \epsilon_x \sum_{i=1}^m \frac{\omega_i s_i^-}{x_{i0}} \\ \text{s. t. } X\lambda - \theta x_{i0} + s^- &= 0, Y\lambda \geq y_o, \lambda \geq 0, s^- \geq 0 \end{aligned} \quad (1)$$

式中, γ^* 为决策单元的效率目标值; $\omega_i (i = 1, 2, \dots, m)$ 表示第 i 个投入的权重, 且满足 $\sum \omega_i = 1$; X, Y, λ, s^- 分别为投入、产出、权重系数向量和投入松弛向量; ϵ_x 是一个关键参数, 取值范围为 $[0, 1]$, 它表示效率计算中非径向部分的重要程度; 取 0 时相当于径向模型, 取 1 时相当于 SBM 模型。

公式(1)的解为“综合技术效率”, 如果在公式(1)中加入 $\sum \lambda = 1$ 这一约束条件, 则可以计算得到各决策单元的“纯技术效率”, 两者之间的比值为“规模效率”。为了表述方便, 文中基于投入导向、规模报酬不变 EBM 模型可以简称为 EBM-I-C, 投入导向、规模报酬可变的 EBM 模型则可简称为 EBM-I-V。为了进一步挖掘决策单元无效率的来源, 可以对技术无效率基于每种投入视角进行分解, 以衡量每种投入在技术无效率中的贡献率。由于 ω_i 是各投入变量的权重, 则目标函数可分解如下:

$$\begin{aligned} \gamma^* &= \sum_{i=1}^m \omega_i^* \theta^* - \epsilon_x^* \sum_{i=1}^m \frac{\omega_i^* s_i^{*-}}{x_{i0}} = \\ &\sum_{i=1}^m \omega_i^* \left(\theta^* - \frac{\epsilon_x^* s_i^{*-}}{x_{i0}} \right) \end{aligned} \quad (2)$$

则各投入要素的无效率值为:

表 2 投入产出变量描述性统计(2007—2015 年)

变量	单位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教学与科研人员	人	4 891.50	15 922.00	1 090.00	3 826.18
科技经费当年拨入	千元	1 223 983.67	5 078 989.00	129 233.00	856 453.99
专著数量	部	23.48	108.00	0.00	19.90
学术论文	篇	6 207.94	211 34.00	1 339.00	4 040.72
鉴定成果数	项	30.39	306.00	0.00	39.66
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	千元	29 284.42	613 524.00	0.00	82 478.72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985 工程”院校科研效率的时空差异特征

由于 EBM 模型既考虑了投入目标值与实际

$$I_i^* = 1 - \left(\theta^* - \frac{\epsilon_x^* s_i^{*-}}{x_{i0}} \right) \quad (i = 1, 2, \dots, m) \quad (3)$$

基于此, 各投入要素对技术无效率的贡献率 $Contri_i (i = 1, 2, \dots, m)$ 可以由下式计算得到:

$$Contri_i = \frac{\omega_i^* \left[1 - \left(\theta^* - \frac{\epsilon_x^* s_i^{*-}}{x_{i0}} \right) \right]}{\sum_{i=1}^m \omega_i^* \left[1 - \left(\theta^* - \frac{\epsilon_x^* s_i^{*-}}{x_{i0}} \right) \right]} \quad (i = 1, 2, \dots, m) \quad (4)$$

三、样本、变量与数据

本文选取 2007—2015 年中国 36 所“985 工程”院校为决策单元建立科研效率评价模型, 未入围的 3 所“985 工程”高校分别是国防科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其中前两所高校由于保密性和学科性质原因统计资料缺失, 而后一所作为以传统文科为主的高校, 科研投入产出数据偏低, 与其他“985 工程”高校差距太大, 不符合 DEA 要求决策单元具有同质性, 因此将其去除。上述处理与国内相关研究一致^[18-20]。根据前文所述, 本文选取教学与科研人员、科技经费当年拨入作为投入变量, 产出变量分别为专著数量、学术论文、鉴定成果数和技术当年实际收入。上述各变量数据均来自 2008—2016 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样本投入产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值之间的径向比例, 又考虑了各投入之间差异化的非径向松弛变量, 兼顾了径向模型与非径向模型的优势, 克服了它们的缺点, 从而更科学地测度决策单元的效率水平。在效率模型中, CCR 模型由于未考虑松弛变量, 因而高于决策单元的实际效率, SBM 模型则因为忽略投入之间的线性比例

关系,所以低于决策单元的实际效率。通过效率测算结果的比较,EBM 模型效率测算值正好处于 CCR 模型与 SBM 模型之间。3 类模型下 36 所“985 工程”院校科研效率均值如表 3 所示。

表 3 2007—2015 年 36 所“985 工程”院校科研效率均值比较:基于不同 DEA 模型

年份	CCR-I-C	SBM-I-C	TE;EBM-I-C	PTE;EBM-I-V	SE;EBM-I-V
2007	0.815	0.772	0.808	0.907	0.891
2008	0.844	0.817	0.841	0.889	0.945
2009	0.836	0.783	0.817	0.897	0.910
2010	0.784	0.731	0.774	0.882	0.877
2011	0.799	0.744	0.777	0.876	0.887
2012	0.763	0.709	0.746	0.847	0.881
2013	0.795	0.762	0.790	0.876	0.902
2014	0.823	0.761	0.802	0.901	0.890
2015	0.777	0.732	0.770	0.857	0.898
均值	0.804	0.757	0.792	0.881	0.898

根据表 3,基于投入导向 CCR 模型与 SBM 模型的科研效率均值分别为 0.804 与 0.757,而 EBM 模型的科研效率均值为 0.792,正好位于二者之间。考虑到 EBM 模型兼顾了 CCR 模型与 SBM 模型的优势,因此本文将根据 EBM 模型测算结果分析科研效率的时空特征。2007—2015 年,中国 36 所“985 工程”院校科研效率均值为 0.792,未来效率改进空间较大,这表明“985 工程”院校科研过程中存在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现象。从效率分解结果来看,“985 工程”院校科研资源利用的纯技术效率(PTE)与规模效率(SE)均值分别为 0.881 和 0.898,二者均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并且规模效率略高于纯技术效率。因此,为促进中国“985 工程”院校科研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今后在提高科研资源利用与科研资源管理水平的同时,还应优化科研规模,有效发挥科研资源利用的技术有效性与规模有效性,让二者产生协同效应。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研究期内“985 工程”院校科研效率从 2007 年的 0.808 波动降至 2015 年的 0.770,这意味着科研资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趋于恶化。具体来看,纯技术效率从 2007 年的 0.907 降至 2015 年的 0.857,规模效率从 2007 年的 0.891 升至 2015 年的 0.898。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来“985 工程”院校科研效率恶化主要是由纯技术效率下降所致,在未来科研资源利用过程中应更加注重改进技术与管理水平。

1. 分院校测度结果

从各所院校层面来看,如图 1 所示,2007—2015 年,只有清华大学一所高校始终位于生产前

沿面,科研资源利用是完全有效的;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等 6 所高校科研效率在 0.90 以上,距离生产前沿面很近;科研效率位于 0.70~0.90 之间的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 19 所高校;其余 10 所高校科研效率水平相对较低,均在 0.50~0.70 之间,科研资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匹配度较差,其中不乏知名学校,比如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这些高校距离生产前沿面较远。这是因为 DEA 模型测算的是相对效率,相当于矮子里拔将军,因此很多知名高校虽然科研规模较大,但是投入产出效率相对较低。根据效率分解结果,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等 6 所高校的纯技术效率为 1,而规模效率不为 1。说明这些高校应通过调整科研活动的投入、产出规模来实现规模和整体有效。其余 29 所高校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皆无效,意味着在今后的科研活动中技术改进和规模优化要两手抓,从而提升整体效率。再考察时间变化趋势,从表 4 可以更加直观、清晰地分析各高校在 9 年间的科研效率差异。研究期内,清华大学科研效率一直为 1,是其它高校学习的楷模和榜样。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绝大多数年份距离生产前沿面较远,科研效率常年偏低。这种现象应引起高校自身及其主管部门的足够重视,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来判断科研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投入人力、经费利用率低,还是科研产出数量质量不具备竞争优势,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2. 分区域测度结果

将 36 所“985 工程”院校按其所在省市划分为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地区以考察科研效率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琼 11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晋、吉、黑、皖、赣、豫、鄂、湘 8 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渝、川、贵、云、陕、甘、青、宁、新、蒙、桂 11 个省市;36 所“985 工程”院校中有 22 所位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有 7 所。

从区域层面上来看,如表 5 所示,2007—2015 年间科研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存在区域差异,但差异较小。整体而言,科研效率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东部、中部;纯技术效率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中部、东部、西部;规模效率均值由高到低为西部、东部、中部。具体来看,在科研效率方面,2008—2010 年间、2012—2013 年间东部高于中西部,2011 年、2014—2015 年间中部高于

东西部,2007 年西部高于东中部。究其原因,东部地区大多数省市经济环境好,平均收入高,更容易吸引高水平人才和获取各种横向科研课题,从而促进了高质量科研产出的增加;中部地区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优于西部地区,但是科研效率与西部相比互有胜负,差距不大;而西部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享受国家各种优惠政策,在科研方面大步向前,发展势头迅猛。在纯技术效率方面,2007—2009 年、2012—2013 年东部高于中西部,其余年份中部高于东西部。在规模效率方面,2007—2012 年间、2015 年西部高于东中部,其余两年中部高于东西部。这说明,最初西部地区“985 工程”院校科研规模是最为恰当的,后来经过调整中部地区规模占优,东部地区的科研规模一直都距离生产前沿面较远。东中西部均应根据需要调整科研规模,逐渐接近最优规模,最终实现规模长期有效。

表 5 2007—2015 年“985 工程”院校分区域科研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值

年份	TE;EBM-I-C			PTE;EBM-I-V			SE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7	0.812	0.788	0.816	0.929	0.892	0.853	0.874	0.884	0.957
2008	0.851	0.838	0.813	0.906	0.901	0.827	0.939	0.930	0.982
2009	0.830	0.782	0.808	0.910	0.902	0.855	0.913	0.867	0.946
2010	0.797	0.683	0.793	0.891	0.903	0.836	0.894	0.756	0.949
2011	0.765	0.819	0.773	0.866	0.955	0.828	0.883	0.857	0.933
2012	0.755	0.717	0.750	0.859	0.828	0.827	0.878	0.866	0.907
2013	0.802	0.762	0.782	0.890	0.840	0.871	0.901	0.908	0.897
2014	0.772	0.887	0.811	0.878	0.963	0.911	0.880	0.920	0.891
2015	0.738	0.825	0.815	0.833	0.901	0.886	0.886	0.915	0.919
均值	0.791	0.789	0.796	0.885	0.898	0.855	0.894	0.878	0.931

(二)“985 工程”院校科研资源无效率的来源——基于投入分解视角

本文利用 EBM 模型的性质将“985 工程”院校科研资源无效率基于每种投入要素视角进行分解,以此探究无效率的深层次来源,从而为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如表 6 所示,2007—2015 年间“985 工程”院校科研资源无效率均值为 0.209。由教学与科研人员投入、科技经费当年拨入导致的无效率均值分别为 0.212、0.206。教学与科研人员投入是“985 工程”院校科研资源无效率的首要原因,科技经费当年拨入为次要原因。具体来看,教学与科研人员投入、科技经费当年拨入对“985 工程”院校科研资源无效率的贡献率分别为 50.51%、49.49%。可以看出,教学与科研人员投入的贡献率略高于科技经费当年拨入,这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985 工程”院校在科研活动中对人力投入和资金投入基本同等重视。从变化趋势来看,2007—2015 年间“985 工程”院校科研资源无效率由 0.195 上升为 0.231。其中,教学与科研人员投入导致的无效率由 0.187 上升至 0.239,科技经费当年拨入导致的无效率由 0.204 上升至 0.223。教学与科研人员投入、科技经费当年拨入的效率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下降,进一步表明“985 工程”院校科研资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两种投入要素中,教学与科研人员投入对科研资源无效率的贡献率由 2007 年的 47.82% 升至 2015 年的 51.77%,科技经费当年拨入的贡献率从 2007 年的 52.18% 降至 2015 年的 48.23%,这启示“985 工程”院校应同时把控科研资源人员投入与经费投入,并重点关注经费投入。

表 6 2007—2015 年各投入要素对“985 工程”院校科研资源无效率的贡献率

年份	科研资源 EBM-I-C 无效率			贡献率/%	
	教学与科研人员投入	科技经费当年拨入	总量	教学与科研人员投入	科技经费当年拨入
2007	0.187	0.204	0.195	47.82	52.18
2008	0.156	0.162	0.159	49.06	50.94
2009	0.178	0.192	0.185	48.06	51.94
2010	0.217	0.236	0.226	47.96	52.04
2011	0.237	0.209	0.223	53.14	46.86
2012	0.268	0.239	0.254	52.91	47.09
2013	0.209	0.210	0.210	49.93	50.07
2014	0.213	0.182	0.198	53.94	46.06
2015	0.239	0.223	0.231	51.77	48.23
均值	0.212	0.206	0.209	50.51	49.49

（三）36 所“985 工程”院校科研资源节约潜力指数测算

本文通过 EBM 模型计算各投入目标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值来衡量“985 工程”院校科研资源节约潜力。如表 7 所示,“985 工程”院校人力投入与资金投入的节约潜力是比较可观的,多数高校投入实际值与目标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总体来看,计算期内 36 所“985 工程”高校教学与科研人员节约潜力、科技经费当年拨入节约潜力分别为 21.73%和 23.84%。如果每所高校都能达到效率前沿高校的水平,那么“985 工程”科研资源

利用与科研质量将会得到极大改善。从各所高校来看,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 3 所高校教学与科研人员节约潜力最大,分别为 49.25%、44.89%和 44.67%;科技经费当年拨入节约潜力最大的是西北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and 浙江大学 3 所高校,分别为 51.50%、51.00%和 46.13%。从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科研投入节约潜力差距较小,其中教学与科研人员节约潜力最大的是中部,其次是东部,最后是西部;科技经费当年拨入节约潜力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西部和中部。从数值上来看,同时挖掘东中西部的科研资源投入节约潜力是未来进一步改善“985 工程”院校科研效率的主要途径。

表 7 36 所“985 工程”院校科研资源投入节约潜力指数(2007—2015 年) %

高校名称	教学与科研人员 节约潜力	科技经费当年 拨入节约潜力	高校名称	教学与科研人员 节约潜力	科技经费当年 拨入节约潜力
北京大学	- 44.67	- 31.44	厦门大学	- 37.58	- 37.06
清华大学	0.00	0.00	山东大学	- 27.80	- 15.0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15.24	- 51.00	中国海洋大学	- 25.64	- 20.33
北京理工大学	- 10.34	- 35.10	武汉大学	- 31.70	- 20.08
中国农业大学	- 16.93	- 23.53	华中科技大学	- 19.26	- 16.19
北京师范大学	- 13.52	- 11.50	湖南大学	- 33.45	- 33.31
南开大学	- 10.22	- 8.37	中南大学	- 31.28	- 14.55
天津大学	- 18.82	- 21.84	中山大学	- 44.89	- 15.22
大连理工大学	- 28.34	- 27.54	华南理工大学	- 13.84	- 14.27
东北大学	- 1.61	- 3.00	重庆大学	- 10.01	- 7.33
吉林大学	- 36.79	- 24.73	四川大学	- 27.42	- 20.71
哈尔滨工业大学	- 2.01	- 6.19	电子科技大学	- 12.30	- 12.30
复旦大学	- 39.60	- 34.08	西安交通大学	- 38.56	- 33.68
同济大学	- 39.68	- 39.36	西北工业大学	- 25.22	- 51.50
上海交通大学	- 23.28	- 18.2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43.29	- 35.28
华东师范大学	- 31.91	- 36.65	兰州大学	- 5.62	0.01
南京大学	- 2.70	- 3.94	东部	- 23.59	- 23.12
东南大学	- 23.17	- 14.86	中部	- 25.85	- 22.04
浙江大学	- 49.25	- 46.13	西部	- 23.20	- 22.9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26.49	- 39.22	总体	- 21.73	- 23.84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兼顾径向与非径向特征的 EBM 模型测算 2007—2015 年间 36 所“985 工程”院校科研效率,并全面考察科研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结果表明:36 所“985 工程”院校科研效率水平较低,科研资源投入节约潜力较大。不同院校之间的效率指数差异显著,地区间效率差异较小;教学与科研人员投入、科技经费当年拨入对“985 工程”院校科研资源无效率的贡献率分别为 50.51%与 49.49%;通过目标值与实际值的比较,发现“985 工程”院校教学与科研人员投入节约潜力、科技经费当年拨入节约潜力分别为 21.73%与 23.84%。

本文研究结论蕴含的政策启示:

(1)鉴于 36 所“985 工程”院校之间科研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相应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应引起足够重视,认清科研效率的校际差别和地域差异。对科研效率偏低的高校,通过各项优惠政策扶持和科研经费投入增加等予以倾斜,保证全国高校均衡、稳定、持续发展。

(2)为了进一步缩小不同地区高校的科研效率差异,建立相应的长效机制推动东部、中部和西部各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使科研效率较低

地区的高校逐步向效率较高地区的高校靠拢。

(3)改变传统体制下科研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的局面,通过多渠道积极筹措科研资金。如积极申请国家、部委、地方各类基金和各种横向联合课题,开展各类科技咨询服务等,保证科研经费满足需要,实现高校科学研究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

(4)合理制定科研活动目标,改善科研管理环境,提升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如有针对性地引进新技术与高能设备,促进科研生产和创新技术的进步;优化科研管理流程,改进科研管理体制;通过科研奖励制度引导教师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而非一味看重科研立项数和经费数;高校和地方政府、企业互相合作,建立产学研创新平台和研究基地,促进高校融入当地经济发展,推动科技成果顺利转化。

(5)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制定有助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和能动性的激励机制鼓励高校现有人才。另外,对部分人才紧缺的学科,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引进高水平人才,给予其满意的待遇,免其后顾之忧,从而更好地进行学科建设。

参考文献:

- [1]丁岚. “985 工程”实施中教育部直属高校生产效率的计量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12, 33(7): 20-29.
- [2]Ying Chu Ng, Sung Ko Li. Measuring the research performance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 application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Education Economics, 2000, 8(2): 139-156.
- [3]Johnes J, Li Y U. Measuring the research performance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8, 19(4): 679-696.
- [4]Giovanni Abramo, Ciriaco Andrea D'angelo, Fabio Pugini. The measurement of Italian universities' research productivity by a non parametric-bibliometric methodology [J]. Scientometric, 2008, 2(76): 225-244.
- [5]Beasley J E. Compar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s[J]. Omega, 2009, 18(2): 171-183.
- [6]Chen J K, Chen I S. Inno-Qual efficiency of higher education: Empirical testing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11, 38(3): 1823-1834.
- [7]徐娟. 我国各省高校科研投入产出相对效率评价研究——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9, 30(2): 76-80.
- [8]郭峻,熊世权. 中国 31 个省市高校科研绩效实证评价[J]. 情报杂志, 2010, 29(9): 83-88.
- [9]王欢,宗晓华. 中国各地区高校科研的技术效率与规模调整——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 DEA 分析[J]. 科技与经济, 2013, 26(3): 66-70.
- [10]王晓红,王雪峰,翟爱梅,等. 一种基于 DEA 和多指标综合评价的大学科研绩效评价方法[J]. 中国软科学, 2004(8): 156-160.
- [11]陆根书,刘蕾. 不同地区教育部直属高校科研效率比较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 2006(2): 55-59.
- [12]胡庆江,何玮佳,柳锐. 基于 DEA 的“985 工程”院校科研效率评价[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28(19): 135-139.
- [13]陈立泰,梁超,饶伟. 西部地区省部共建 211 高校科研效率评价[J]. 科技管理研究, 2012, 32(6): 45-48.

- [14]姜彤彤. “985”高校科研效率测算及区域差异对比[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4(4): 35-40.
- [15]王莹, 刘延平. 基于 DEA 方法的高校管理学院科研效率评价实证研究[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4): 43-47.
- [16]王冬梅. 基于 PCA-BCC 的某高校基金科研效率评价[J]. 科研管理, 2011, 32(4): 102-105.
- [17]Tone K, Tsutsui M. An epsilon-based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DEA: A third pole of technical efficiency[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0 (207): 1554-1563.
- [18]姜彤彤. “985”高校科研效率测算及区域差异对比[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4(4): 35-40.
- [19]胡庆江, 何玮佳, 柳锐. 基于 DEA 的“985 工程”院校科研效率评价[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28(19): 135-139.
- [20]罗杭, 郭珍. 2012 年中国“985”大学效率评价——基于 DEA-Tobit 模型的教学-科研效率评价与结构-环境影响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14, 35(12): 35-45.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par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fficiency of “985 Project” Universities and its Cause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and EBM Model

Liu Yue, Wang Keliang, Meng Xiangr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China)

Abstract: Taking “985 Project” 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utilizing EBM analysis model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dial model and non-radial model, this paper measures scientific research efficiencies of 36 “985 Project” universities and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7—2015.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inefficiency for each input is measured by the decomposition of overall scientific research in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put. The potenti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source reduction is measured according to the gap between target value and actual value of input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985 Project” univers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efficiency is relatively low. Different universiti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fficiency, while regional difference is small, indicating the large potenti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source reduction.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overall scientific research efficiency of “985 Project” colleges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decrease of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Scientific research resource personnel input and funding input should be controlled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focus should be on funding inpu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985 Project” universities to achieve the efficient us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sources.

Key words: “985 Project” univers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efficiency;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parity; EBM model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45-05

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坚实底气

王有炜, 豆艳荣

(安徽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100)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取得辉煌成就,理论创新取得丰硕成果,制度日益完善定型,文化建设成效显著。纵观世界局势动荡、经济发展增速乏力、西方民主政治撕裂,我国取得了生产力显著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等历史性成就,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愈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正确,彰显了中国人民的高度自信,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坚实底气。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是依据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而做出的,非常准确地把握到了我国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新变化,同时党的理论创新取得了新成果,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都有了新布局,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取得新成就,理论创新取得新成果,制度完善取得新进展,文化建设取得新成效,这些又强化了我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坚实底气。对此,应以过程性思维、整体性视野进行系统地认识和理解把握。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辉煌成就,为“新时代”奠定了现实基础

(一)道路决定命运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救亡图存、谋求复

兴,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前仆后继地进行了一次次的尝试和斗争,却屡遭挫折和失败。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让仁人志士看到了曙光。1921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带领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历经28年的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华民族从此挺直腰杆站了起来;经过社会主义“一化三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征程中,破除了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几代人的艰辛探索实践,最终形成一条符合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独特历史命运、独特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收稿日期:2018-08-09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省级教学团队(2014jxtd028);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SK2016SD22)

作者简介:王有炜(1963-),男,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本文信息:王有炜,豆艳荣.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坚实底气[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45-49.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是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华民族摆脱了贫困,结束了挨饿的历史,逐渐富了起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都进入了世界前列,我国实现了从落后时代到大踏步地赶上时代、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事实胜于雄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精准掌控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态势,沉着应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和国内“三期叠加”的经济下行压力,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通过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速度、质量、效益都得以不断提升,创造了宏观经济保持7.2%的年均增速,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201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827 122亿元,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9 660元^[1],稳居世界第二位,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发展动能转向创新驱动,“中国制造”、“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纷呈叠出,快步迈向创新型大国;通过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国内城乡一体化建设稳步推进,城市群、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加速,城乡间、区域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推进带来了生活上的便捷,天蓝地绿山青水净日益显现,美丽和谐中国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成果上,有“天眼”

探空、国产航母下水、“蛟龙”入海、国产大飞机试飞成功、纵横寰宇的量子通信惊艳世人,这些无不增强了我国人民在全面迈向小康社会中的获得感、自豪感、幸福感,体悟到中华民族真正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更加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为进入“新时代”提供指导思想

科学理论是时代的精华,是引领社会前进的行动指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既没有成功经验可借鉴,更没有现成模式可模仿,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自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勇于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索和实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时代重大课题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能够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来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准确把握了时代主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辉煌成就,成功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在中国由“赶上时代”走向“引领时代”,由大国走向强国的发展过程中,国际上有西方国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各种背离时代的逆流,国内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新的视野和境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它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党治国理政新境界、管党治党新境界,明确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做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完善定型,为进入“新时代”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是立国之本和事业之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美好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依据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中所预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运动的结果,所以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和全国人民的接续完善下,我国逐步形成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

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激发了人民创造活力,推动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针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维,坚持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发展与制度价值不断彰显发挥相统一,提出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关键,以坚持和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原则,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制度建设,并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逐步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事实面前“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不攻自破,西方文明模式“元叙事”论调悄然终结,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发展路径选择,这让世界不禁叹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和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4]。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成效,为进入“新时代”提供精神动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进的精神动力。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5]面对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以及意识形态的冲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民族复兴的新高度,指出任何一个大国走向强国,既是经济总量、科技力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6]并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

展”^[7]。遵循此精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使中国人民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牢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更加显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以理论、学术、文艺、影视、网络等多姿多彩的文化样式塑造着国家形象,引领着社会风尚,教育人民”^[8],坚决克服“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9]的现象和文化自卑、文化虚无等状况。

中华民族历经苦难曲折仍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有“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4],正是这样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激励着中华儿女持之以恒地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让我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交锋中站稳了脚跟。因此,让我们坚定且自信的文化,除了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还有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N]. 人民日报, 2018-02-28.
- [2]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4.
- [3]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70.
- [4]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7-02.
- [5]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国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5-04.

五、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长期努力奋斗的结果。纵观世界局势动荡、经济发展增速乏力、西方民主政治撕裂,我国取得了生产力显著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等历史性成就,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愈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9]。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有信心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更有能力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有自信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6]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3.
- [7]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N]. 人民日报,2017-7-28.
- [8]张国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优势的三大支点[J]. 红旗文稿,2017(20):23-25.
- [9]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3-12-27.

Four Confidences: The Emboldened Basi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Wang Youwei, Dou Yanro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ngbu 2331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firm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practice, and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system has been increasingly improved,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background of turbulent world situation, weak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tearing up of Western democracy, China has made historic achievements such as remarkabl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remarkable enhancement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distinct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Historic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society, which proves the correctness of the road, theory, system 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demonstrated the high confidence of Chinese people and consolidated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a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ur confidences

(上接第 20 页)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Employment Quality on the Peas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Xiamen and Zhangzhou

Wang Liyun, Zhou Bifen, Zhao Qingj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614 migrant workers in Xiamen and Zhangzhou,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binomial logistic model and analyze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quality on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o become citize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o be urbanized is not strong, only 28.3%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the willingness to become citizens; female migrant workers have higher willingness to become citizens than male migrant workers. The higher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reasonable working hours, labor contract signing, job satisfaction), the stronger the willingness of citizens. For male migrant workers, 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with social security and housing provident fund and job satisfaction), the stronger the willingness of citizens. The low quality of employmen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migrant workers. Therefo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group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quality of employment; willingness to citizenship; gender differences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50-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内容及其重大意义

徐长山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451150)

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既有它的理论来源、实践基础,而且与习近平的个人条件分不开,他是这个思想的突出贡献者。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具体方略和新时代九个方面的新部署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它们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体现在它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国际意义三个方面。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08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党的十九大的最大亮点和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是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贯穿十九大报告的灵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十九大报告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报告认为十八大以后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了新时代的重大课题,“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

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报告进一步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1]十九大报告的这三段话已经指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怎么形成的。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

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继承性,后人的思想、理论总要承继前人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

收稿日期:2018-03-17

作者简介:徐长山(1950-),男,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信息:徐长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内容及其重大意义[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50-55.

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要看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也要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发展。此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精华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中国文化的底蕴和人类文明的成果都在这个思想中得到体现,但这个思想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因为这个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12个字也可以看作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对前人、他人的继承和借鉴又创新发展的简明表达。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基础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认识发展的动力。我们党是一个与时俱进,具有创新精神的党,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品格,是我们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标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过去五年新的伟大斗争经验的总结,是新实践孕育了新思想,没有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在过去五年里进行的丰富生动、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就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确”的鲜活内容和“十四个坚持”的具体方略,都是在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极不平凡,面对国内外环境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思想和举措,经受了实践的检验,5年来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集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雄厚基础。实践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要继续丰富和发展并不断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贡献者

如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主要贡献者是毛泽东、邓小平一样,我们既要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又要看到这个思想的突出贡献者是习近平同志。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杰出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领袖站得高看得远,具有洞察历史规律、提出时代任务、反映人民意志和愿望、善于集中集体智慧、创造科学理论引领人民前进的作用,并且是站在时代潮头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核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这样的杰出人物,邓小平是这样的杰出人物。过去5年的实践证明,习近平同志也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的非凡的政治勇气、敢于担当和攻坚克难的宏大气魄、不忘初心和牢记使命的人民情怀、把握国内外大势和驾驭全局的眼界和睿智,使他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领袖,无愧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核心,无愧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时势造英雄。习近平同志的核心、领袖和总设计师的地位绝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造就出来的,同时也与他个人的背景、经历、智慧、才能和性格有关。习近平同志的核心、领袖和总设计师地位,不仅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戴,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因而,以习近平命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理所当然的。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绝非是靠时间划线,也不是主观认定,而是契合了强有力的现实逻辑,契合了颠扑不破的历史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出来的,是在过去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辛理论探索基础上新的艰辛理论探索的重大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作为新时代行动指南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有不同于前人的、以往时代的新形式和新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具体方略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方位的部署构成了这一新思想的丰富内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用“八个明确”对这一新思想进行了简明概括,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要深刻领会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这“十四个坚持”,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还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统领,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党的建设等九个方面作出了具体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部署。

“八个明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义,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而“十四个坚持”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部署则是贯彻“八个明确”思想的路径、政策与方法,它们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在这个新思想中,不仅“八个明确”和“十四个

坚持”、九个方面的新部署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其中的每个明确、每个方略、每个部署之间,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由一系列丰富内容构成的有机整体,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九个方面的部署既延续了前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成果和成功经验,又丰富发展了前人的成果,有一系列的新理念、新判断、新创造和划时代的贡献。如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的重大判断,与当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具有同样的划时代意义;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个15年”的总体设计,与20世纪“三步走”战略部署一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一样,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科学判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内容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而且在形式上也体现了民族风格。通过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我们不难发现,习近平同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实际、洞察世界大势的同时,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民族特点也有深刻的把握和独到的理解,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再一次获得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且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作为引领新时代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新思想。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具体方略、新时代新部署为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对走进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期的指导作用,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自觉贯彻执行。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本文提出如下几点: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是对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谁革命、靠谁来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的时代课题的回答和解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的回答和解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创新成果。

作为新时代的产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于对“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和解决,根植于过去5年新的历史性变革之中,聚焦于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分析和解决,形成于对推进“四个伟大”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认识和把握,体现为围绕大国成为强国而展开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总之,它是基于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所进行的思考。历史新使命、时代新课题和成果新拓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坚实基础和立论依据。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思想,我们党的这三次理论创新成果是与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个历史节点对应的,是党和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伟大实践中产生的三个伟大理论成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推动着党的理论不断创新,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站在了更高的历史基点上。

同前两次飞跃一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再一次在理论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在实践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部署,开拓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征程,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以

及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们必须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充分认识习近平思想的理论意义。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意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思想来自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过来又应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发挥指导作用,这是它的实践意义。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总是以新思想、新理论为标志。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3]。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迫切需要新思想的引领。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平凡的、砥砺奋进的五年,中国之所以发生历史性变革,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关键在于有新思想指引。正是因为有了“理论的支撑”,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航,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

新时代,是“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的历史使命,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四个伟大的实践特别需要习近平“新思想”领航。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同时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庄重地写入了党章。

习近平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动作用已经显现并将继续显现出来。我们相信,习近平思想必将指引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凝聚起、激发起全党和全国

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发展愿景一定能够达到。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意义——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总结过去五年成就后指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1]报告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1]这“三个意味着”是中国迅速发展、不断走向强盛的高度自信,由此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是内涵在习近平思想之中的。

百余年前,有人把中国的落后,概括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的落后。自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接力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如今怎样呢?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30%左右的平均贡献率,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的总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与此同时,支撑中国发展的中国理念,被寄予了开掘人类发展动力的厚望。在过去的5年里,习近平思想不仅带来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变革,也以其广阔的人类视野、深刻的思想力量、超凡的政治智慧、卓越的战略眼光,吸引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导,都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响应。《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600多万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目前在全球发行已突破1300万册,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著作之一。中国的成功崛起,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大大增强,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前不久开播的美国纪录片《中国:习

近平时代》监制认为,“过去5年,习近平主席的政策视野充分体现了继承与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新的里程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有力注解,也为世界提供着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国以后要变成一个强国,各方面都要强。”^[4]习近平同志的这句话,道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只有各方面都强起来,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获得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中的地位。现在,我们正大踏步地走在强国之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空前增强,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定能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说:“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8]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两个一百年”宏伟蓝图的绘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综合国力的提升,更是一种古老文明的浴火重生,是一次包涵了丰富价值内涵与制度体系的“文明的崛起”。以新思想引领新时代、以新使命开启新征程,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必将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四、结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它的理论来源、实践基础和个人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必然产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由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具体方略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事业的新部署构成,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我们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同心同德,永不懈怠,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而奋斗。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
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10-11，18-
20，26.

[2]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284.

[3]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407.

[4]范正伟. 新思想，改变中国的伟力[N]. 人民日报，
2017-10-20(4).

The Formation,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Xu Changsha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Industry Technolo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Zhengzhou 451150,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as its theoretical source, practical basis, and can't be separated from Xi Jinping's personal conditions. He is a prominent contributor to this idea. The eight clear goals , fourteen adherence strategies, and the nine new deployments of the new era in the reports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stitute the basic content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y are an organic integrity and must be fully and accurately grasped.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56-07

资源禀赋、政策调适与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

——基于“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个案研究

王 勇, 刘佳佳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贫困问题。脱贫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问题,而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工程。本文以资源禀赋和政策调适的理论视角,构建乡村振兴的治理分析框架,并通过“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个案研究,探寻乡村振兴的内在治理逻辑。研究发现,资源禀赋、政策工具理论可以对中国独具特色的扶贫“政策试验”实践进行学理性阐释。资源禀赋条件和政策工具各自对农民的脱贫减贫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外,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交互现象。资源禀赋条件作为振兴乡村的基础性资源;而政策调适作为乡村振兴治理的行动机制,起着重要的保障性作用。

关键词:乡村振兴;资源禀赋;政策调适;赤溪村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09

一、问题提出

目前,在城镇化的进程下乡村衰落问题逐步呈现,这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化的问题。截止至2016年世界各地城市人口比例为54%^[1],2017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平均为58.52%。每年都有上亿农村人口,其中大多数是青壮年,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形成许多“老人村”。乡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子就是农村的贫困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的总体要求振兴乡村,具体而言要围绕促进产业发展,加强农村资源环境保护促进农村科教文卫体的全面发展、加强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2018年2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也给出了指导性意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加强顶层设计的政策文件中对农村

的发展问题十分重视,乡村振兴是当前各级政府治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农村凋敝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必然要增加对农村的投入,但我国是幅员辽阔,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所具有的资源要素有所差异,同时不同地域的发展所采取的政策工具与设计也是不尽相同的。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城乡融合发展定位体制机制就不得不聚焦如何实现资源禀赋与政策调适的相互统一,以此来实现乡村振兴治理的永续发展。本文选取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作为案例基础,以赤溪村脱贫发展实践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的案例选择具有较为充分的方法论据。一方面,不仅因为该村振兴模式作为一个成功典范受到政府和新闻媒体的持续关注报道,还因为该村脱贫致富的实践演变展示了资源

收稿日期:2018-09-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基于城市治理转型的基层行政协商机制研究”(15CZZ021)

作者简介:王 勇(199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治理。

本文信息:王勇,刘佳佳.资源禀赋、政策调适与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基于“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个案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56-62.

禀赋要素条件、政策工具与乡村振兴的契合性。

一方面赤溪村的发展历程具有较充分的完备性与有效性,体现了要素禀赋的特点。第一,赤溪村区位优势明显,自然资源总量丰富,地处国家5A级风景区太姥山内,具备区位资源和自然资源发展优势。第二,赤溪村拥有独具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赤溪村作为中国扶贫第一村,历年来受到国家领导人和各级政府的关注与支持。赤溪村30多年的扶贫历程正是我国扶贫的一个缩影。第三,赤溪村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引进旅游公司,与其合作并借助旅游公司的力量兴建农家乐,鼓励支持村民到旅游企业就业。并主动接受所在景区旅游发展辐射,因地制宜发展旅游。第四,赤溪村发挥旅游资源优势,积极思考旅游开发和旅游扶贫无缝对接。

另一方面,赤溪村的发展历程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中国政府扶贫包括三个阶段,赤溪村的扶贫之路对应了以经济开发为主扶贫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政府对于赤溪村的扶贫工作模式、扶贫工作方式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总结。赤溪村扶贫所取得的成就基本上对应了中国近30年来的扶贫大政策走向,也符合中国扶贫的未来发展的走向。历经数年,赤溪村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帮助下,主动创造机会,抓住机遇,用足了一系列相关的扶贫政策。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在行政区域内得到了确认与支持,突破了“人走政息”的风险,从而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因此,对赤溪村脱贫致富的发展历程的分析能够较为全面地考察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框架:资源禀赋与政策工具的融合分析

城镇化不断推进,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乡村衰落问题凸显。乡村衰落并非单纯的是各种资源要素匮乏的问题,还包括国家政策导向、乡村治理行动逻辑方面的原因。因此,要摆脱乡村衰落,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把握好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内涵,正确揭示资源禀赋条件和政策工具对乡村振兴治理的作用机理。

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一项顶层设计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科学严谨的治理逻辑、治理机制,更需要环境、经济、人力、资金、土地等资源禀赋条件的支持。现有学者对精准扶贫脱贫的研究和实践中发现资源和国家政策已成为各地政府实

现所辖范围的贫困区域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筹码,地方政府非常重视自身所具有的资源禀赋条件以及优惠政策的宣传工作。由此不难看出,资源禀赋条件与政策工具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行动要素。在乡村振兴的治理中,通过选择正确的政策工具来科学配置有限的资源,才能更好的实现政策目标,使乡村振兴获得实质性进展。在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结构中(图1)资源禀赋为行动的基础,政策工具的选择作为重要的治理行动机制,同时也为其提供重要支持和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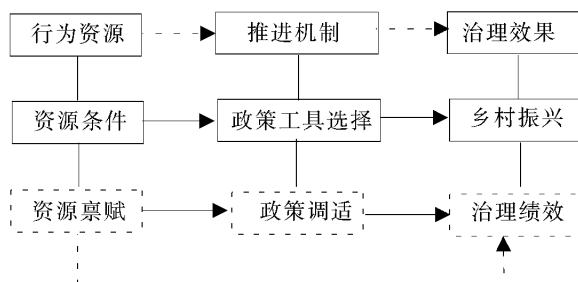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振兴治理的行为逻辑结构

(一)资源禀赋与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

资源禀赋又称要素禀赋,指一国拥有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资源。资源禀赋资源经济学中,专指为了发展社会经济的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素质状况,包括生态系统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的、能触碰到的各种有机质和物质资料等资源^[17]。资源禀赋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实施乡村振兴进程中促进乡村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18]。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政府,也必然要对该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进行全面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产业兴旺要以促进产业发展为中心,积极引导和推动诸如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禀赋条件向农业农村聚集,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实现资源与要素的流程再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此可见,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在实现“三产融合”,不断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宜居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推行乡村可持续发展方式,加强乡村环境整治力度,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这表明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只有生态资源好了才能靠的

住,靠得稳,才能持续持久的发展。乡风文明就是要促进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弘扬优良传统,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在此过程中需要政府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来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的文明程度。治理有效是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农村人力资本的支持,但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呈现出结构失衡,创造财富的人才流失严重等特点,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因此,留住农村人才,培育“三农”人才队伍是促进农村产业升级、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要求。生活富裕,就是要让农民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济宽裕,衣食无忧。生活富裕的首要前提就是摆脱贫困,而我国许多农村地区普遍贫困,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在开发过程中缺乏生态补偿机制,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反而出现“富饶贫困”甚至出现“荷兰病”效应,使得精准扶贫、脱贫、减贫的效果收效甚微。因此自然资源既是乡村衰落的原因之一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条件。

总之,在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中自然要素、资本要素、人力要素和技术要素等的作用不容小觑。自然资源作为一项重要的“地理资本”能够在对其改善的条件下使农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资本要素包括金融资本、土地和生产的相关的要素和社会资本,它们以不同的形式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区域内资本越富余,治理贫困受到的阻力越小,发展经济越有优势。因此,资本既是产业扶贫基本条件,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行动资源。人力资本是影响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对经济的贡献率相较于自然资源而言,其对经济的贡献率逐年上升。近年来,政府为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综合素质,在政策制定上予以倾斜,如:鼓励乡贤返乡就业、加强农民的技能培训等,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二)政策工具与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

政策工具是指执政党和政府部门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选择并确定的引导或促使政策相对人采取期望行为的具体路径和机制^[19]。本文在结合萨拉蒙和 Rothwell、Zegveld 和陈振明等学者的观点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两种类型。这些政策工具对于

乡村振兴的作用各不相同。环境型政策工具包括目标规划、策略措施等;供给型政策工具包括公共服务、技术支持、财政投入等;这两类政策工具尤其侧重点和发生机理,要善于将多种政策工具融合形成政策使用的合力,系统有效解决政策实施中的相关问题,从而实现政策的预期目标。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设计对发挥资源效益也有重要的影响,也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成功来透视政策工具与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赤溪村的成功振兴与它合理的利用资源禀赋条件和政策工具的配套使用是离不开的,然而在政策工具的使用过程中,有其自身适用性。也就是说当单一政策工具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时会给政策主体造成的紧张感,这时就必须采取新的政策工具来调适或补充先行政策工具无法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当福鼎县委对赤溪村进行输血式的发放救济金和物资等时,当这些政策依旧无法让赤溪村摆脱贫困的状态,这样一方面给政府造成压力,另一方面基于扶贫工作的政绩吸引力,采取财政投入的政策工具来搭建平台、说服村民们实行整村搬迁,以改善当前的贫困状况。从此角度看,该村振兴正是在基于政策工具之间的压力和引力基础上进行。当前我国的贫困乡村应充分利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提供一系列支持政策的大好机遇,积极把握机会,创新政策措施,走出乡村衰落的局面实现乡村振兴。

(三)政策工具弥补资源禀赋不足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资源禀赋条件和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设计逐渐受到各级政府重视,很多地区在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和资源配置等方面都会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前人的研究中发现除了资源禀赋和政策工具各自对乡村振兴进程中农业农村的发展产生影响外,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交叉现象。学者认为市场分配资源制度好坏能够促进或制约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20]。所以选择科学合理的政策工具有利于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各区域的资源有所差异,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形式,不仅无法发挥优势资源的独特作用,更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体现党和国家对地区发展的支持。政府对一个地区的扶持需要“因材施教”其所制定的政策也需要“因地制宜”。如果一个地区的水利资源丰富,但政策却不予支

持建设水电站,反而发展生态游这样不仅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政策实施的效果也收效甚微。所以政策需要根据资源状况,自然环境等条件的不同,及时进行调整,只有适应当地需要才能发挥政策的扶持的价值。由此看出,要素禀赋条件和政策工具在乡村振兴的治理中有着密切联系,合理的政策工具的选择能让“资源诅咒”变为“资源福音”。

三、个案描述:赤溪村的“乡村振兴”及其治理

(一)赤溪村概况

赤溪村30多年的扶贫开发可谓是风雨兼程,大体可以区隔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赤溪村进行了10年“输血式”就地帮扶,全国各地纷纷寄来各类扶贫物资,但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开发技术的落后、乡村人才大量流失等原因,村民不能合理利用天然的生态优势来发展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缓慢,发展后劲不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度上大力扶持赤溪村脱贫工作,赤溪村还是在短暂脱贫后很快再度返贫。第二阶段,赤溪村开始经历十年“换血式”整村搬迁。福鼎政府挪地建新村,划地给搬迁户种粮食,搬迁到新地点的用户无需支付其他费用,便可在此地安家落户。但是由于村民们产生因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产生自满的情绪,搬迁扶贫收效甚微。第三阶段,赤溪村通过国家的挂职整村推进帮扶、干部驻村、社会捐助等政策来弥补赤溪村人才结构失衡、发展资金不足等劣势,逐步完善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于此同时,政府大力倡导绿色产业扶贫,建设和培养优秀的三农科技人才队伍,对赤溪村的生态旅游资源条件进行合理规划布局,因地制宜依托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太姥山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村民脱贫成效显著。

(二)赤溪村的治理逻辑

1. 生态旅游助脱贫

赤溪村借助地方政府发布一些惠农政策和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依托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大力发展山地特色农业,以“旅游业为主导,其他相关产业连带拓展发展”的发展模式来充当“抓钱手”,替贫困农民从其他地区到赤溪村来的消费者口袋里抓来更多的钱。如赤溪村通过培育山区特有的

药材、林果、茶叶、蔬菜、畜牧业等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推广防灾抗灾技术。扶持龙头企业,引导农民土地流转并成立专业合作组织等形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因此,产业扶贫脱贫使得村民们在自己家门口就能赚到钱,促进村民们增收,以此带动了村里服务业的发展。

2. 乡村精英返乡促发展

国家对大学生创业实施好的政策,帮助他们解决技术和资金上的困难,所以赤溪村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返乡创业尤其是大学生毕业回乡创业的人员相对增加。主要表现为在利用当地的优质资源开发特色的产业。现今有30位大中专毕业生依托政策的支持回乡创业,探索新时代的“电商扶贫”。乡村人才掌握了前沿的知识、以及相应的技术回乡创业可以带给村民新思想,新技术、新管理方法。从长远来看,政府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就业,带动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持续稳定发展。

3. 社会资本注入促振兴

因为政府对赤溪村扶贫工作的大力宣传以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带动了社会各界对赤溪村的关注与支持,其中有三个较为典型事例:其一是香港沈炳麟先生捐助16万元兴建赤溪小学校舍,改变原来破旧不堪的校舍;其二是内蒙古一家企业捐助150万元扩建560 m²的现代化教学楼,完善了学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三是福建省诚信促进会专程赠送了15台电脑,是学校有了电脑室、多媒体讲堂等。社会慈善要素的注入,为赤溪村教育振兴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从长远来看,政府要加大舆论媒体的宣传来挖掘各种福利资源。

四、扩展分析: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

资源禀赋与政策工具的融合实际上是暗含了政府实现政策目标,实现乡村振兴的多样化方式。通过赤溪村30多年来扶贫发展轨迹,从资源禀赋与政策工具融合的视角能清晰地透视在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

(一)产业扶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生态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农村经济这个子系统,助推乡村振兴,首先要实现产业兴旺。农村自然资源丰富,要着力推进有特色、有优势的

绿色产业,须积极推进“一县一优势、一乡一品牌、一村一特色、一户一对策”的绿色产业比较优势。把生态产业发展成为带动群众增产增收的助推器,探讨出一条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生态产业发展需对农业、工业、服务业进行优化升级,推动产品优质化、绿色化,产业融合化,业态多样化,构建高效生态的新型农业产业体系,让新型农业业态成为农业增效增收的扩张器。在第一产业方面,要深刻考察剖析乡村资源禀赋条件,发展特色和优势农业。赤溪村立足生态、土地资源,着力培育白茶、食用菌、淡水养殖等主导产业,加快推动特色水产、茶叶、水果等优势产业发展。在第二产业方面,依托乡村资源发展特色工业,主要以建设城镇工业园区为抓手,支持主产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赤溪村坚持以工业化理念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先后建成蝴蝶生态园、七彩农场、杜家堡等农业示范园、三创园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在第三产业方面,依托城市的休闲和养生需求,以乡村旅游为契机,发展以休闲农业如共享农庄、“农家乐”等为载体的共享经济。赤溪村以绿色生态为支点,以“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发展理念采用“1+N”的方式来发展旅游服务业,大力发展农家乐、渔家乐、林家乐等休闲旅游项目,逐步走出一条“景美、户富、人和”的发展道路,打造有聚合自然、形态、格调、人文与和谐的最美乡村。在严格保护中把“绿水青山”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优美的良性循环。

(二)精英下沉:反科层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触底实践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但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迁,乡村治理结构和乡村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发挥乡村精英的主导和带动作用,才能维护乡村社会良序发展。乡村精英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乡村精英在村级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取代的,村民自治能否有序、健康的发展取决于乡村精英的主导作用。乡村精英通常是村庄重大事务的主要决策者,极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村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未来发展趋向。

但城镇化的推动导致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农村人力资本结构失衡,农村权威缺少,村民自治实际上沦落为村委会少数人决策,造成农村秩序、基本公共物品供给的缺失,严重制约乡村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村的稳定。所以精英下沉有效弥补了农村基层人力资源的不足,改善了农村的精英结构,有效发挥着推动农村发展的积极作用。精英下沉使农村发展禀赋差距进一步缩小,使社会公正得以兼顾。众所周知,精英下沉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机制。赤溪村的发展过程中实行“驻村干部”制度,王纯华曾任磻溪镇纪委书记,如今又担任福鼎市下派赤溪村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的到来,决定着赤溪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方向,在增强村两委干部积极创新精神的同时也提升了赤溪村整体治理水平。

(三)政策调适:政策的地区适应性机制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速乡村振兴

第一,科学合理的政策工具有利于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在乡村振兴的治理过程中,应合理选择相应的政策,充分发挥政策对乡村振兴治理行动资源要素配置的积极作用,地方政府要依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利用制度杠杆撬动“资源福音”,避免陷入“梅佐乔诺陷阱”的这个泥潭之中。也就是说,外部输入的资金、物资、人力资源短期内能使农村经济发展,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激发农村生产的积极性,短暂发展之后又会再度回归原状,无法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乡村振兴规划中“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目标,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目标,时代不同,要求也随之不同。所以以短期的资本、人力资源投入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政府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选择合理的政策来充分发挥各要素禀赋的积极作用。第二,制定政策的地区适应机制。政策的地区适应机制指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发挥地方政府的自立性和积极性,根据当地农村地区发展的需求做出适当的政策调整。其次制定政策的整合推进机制。政策的整合推进机制指的是当地政府针对农村地区的多元性和复条性特点,以地方政府为主要实施主体,整合各项惠农政策,将政策的实际目标准确地瞄准农村群体,提高政策惠农的效率。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资源禀赋条件与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分析框架,以资源、政策调适为解释变量,以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为被解释变量,通过考察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振兴之路,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要素禀赋条件和政策工具是不可或缺的。资源禀赋条件作为其行动资源,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政策调适作为乡村振兴治理的行动机制,起着重要的保障性作用。进而言之,资源禀赋条件和政策工具的融合分析从多个侧面呈现了乡村振兴治理动力来源、治理逻辑与治理结果。因此,本文在借鉴赫克歇尔、俄林、萨拉蒙等学者观点基础上,通过对赤溪村的考察分析,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场景尤其是乡村振兴中,资源禀赋要素条件、政策工具与乡村振兴治理逻辑的关联研究,使之更加具体和深入。

目前全国多个地区都在推广“中国扶贫第一

村”赤溪村的振兴模式,说明该村发展的模式与项目有效性和适用性。然而,此种振兴模式是创立于地处偏僻但自然资源丰富、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普遍、留守老人数量多的贫困山村。因此,此发展模式决定了其在同种类型的农村地区具有更强的借鉴性和适用性。然而,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地区,潜在的资源禀赋条件、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逻辑、当地特有的人口结构是政策移植地政府学习和决策的重要变量。只有这样,方能构建出符合当地实际的乡村振兴模式。

本文也存在一些研究局限:本文以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为研究对象,只是初步尝试提出理论分析框架和进行实证研究,还有更深入的问题有待研究:第一,在理论分析框架上,本文构建的基于“资源禀赋-政策工具”的乡村振兴治理行动逻辑框架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未来将会用定量分析、对比研究等方法相结合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参考文献:

- [1]李国祥.乡村振兴战略村镇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J]. 中国合作经济,2017(10):19-20.
-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2.
- [3]孔祥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J].农村金融研究,2018(2):9-13.
- [4]温铁军,杨洲,张俊娜.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的实现方式[J].行政管理改革,2018(8):26-32.
- [5]朱启臻.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产业——产业兴旺的一种社会学解释[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3):89-95.
- [6]石卫星.乡村振兴的五个支点[J].人民论坛,2018(23):76-77.
- [7]雷若欣.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与实施路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5):67-71.
- [8]邢成举,罗重谱.乡村振兴:历史源流、当下讨论与实施路径——基于相关文献的综述[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5):8-17.
- [9]林聚任,刘佳,梁亮.乡风文明与当前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以山东省“乡村文明行动”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3):103-110.
- [10]高维.乡土文化教育:乡风文明发展根基[J].教育研究,2018(7):87-89.
- [11]张晓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抓手[J].人民论坛,2017(33):72-74.
- [12]丁胜.乡村振兴战略下的自发秩序与乡村治理[J].东岳论丛,2018,39(6):140-148.
- [13]白丽,赵邦宏.产业化扶贫模式选择与利益联结机制研究——以河北省易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为例[J].河北学刊,2015,35(4):158-162.
- [14]黄承伟,覃志敏.贫困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与产业化扶贫机制创新——基于重庆市农民创业园产业化扶贫案例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34(5):51-55.
- [15]徐志明.我国贫困农户产生的原因与产业化扶贫机制的建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6):711-714.
- [16]钟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6.
- [17]张力小,梁竞.区域资源禀赋对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10,25(8):1237-1247.
- [18]陈林生,李刚.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与区域经济增长[J].财经问题研究,2004(4):63-66.
- [19]陈振明.政策科学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 [20]何雄浪,姜泽林.自然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和计量实证检验[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8(1):134-144.

Resource Endowment, Policy Adjustment and Governance Logic of Rural Rejuvenation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Chixivillage, the First Villag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Wang Yong, Liu Jiaji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was no longer a simple solu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ood and clothing, but a systematic and complex proje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endowment and policy adapt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governanc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xplored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logic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Chixi village, the first villag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The study found that resource endowment and policy instrument theory could rationally explain China's unique practice of "policy test"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source endowment conditions and policy tools had influence on the effects of farmer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ere was still a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source endowment conditions and policy tools. Resource endowment conditions were the basic resources for revitalizing the countryside, and policy adjustmen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afeguarding as a mechanis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ource endowment; policy adjustment; Chixi village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63-10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孙小宇, 郑逸芳, 许佳贤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妇女的社会地位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研究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夫妻收入差异、受教育程度、收入、妇女自我认可程度对其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同时,通过两年的边际效应分析,夫妻差异、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减弱。分样本回归表明,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一定提高,但妇女社会地位仍存在城乡差异。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应整合政府、社区、就业单位、社会舆论、家庭、女性个人等方面资源,形成合力以促进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

关键词: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社会;家庭;个人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18.04.10

妇女问题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问题之一。其中,妇女社会地位问题是妇女问题的核心,是一切妇女问题最集中、最本质的体现,它不仅是妇女问题解决与否的主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1]。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妇女的作用和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多处提及妇女工作,要求“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2]。在现实生活中妇女在政治、经济、家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在健康、教育、社会保障、法律等领域中的权益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提升。但是,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和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3],妇女社会地位状况还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妇女日益增长的需求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4],在现有的社会发展水平下,要满足不同身份妇女的收入、医疗保障、住房、教育

等需求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妇女社会地位的城乡不平衡依旧存在,存在着“城高乡低”、“城多乡少”“城优乡劣”的差距;性别歧视依旧存在,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在就业过程中遭遇过歧视的女性占10.0%,男性仅为4.5%,即使是高层次女性人才,也有19.8%的受访者认为性别给自己的职业发展带来阻碍;女性在社会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发挥和资源占有不平衡^[5],参与决策与管理仍面临阻碍,在领导岗位的占比远远低于男性,在第三期调查数据中,只有2.2%的女性为相关单位的负责人,仅为男性相应比例的一半;女性家务劳动负担依然存在,调查显示72.7%的已婚者认为妻子比丈夫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

基于此,本文聚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妇女的社会地位状况,试图基于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收稿日期:2018-08-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空巢女性老人养老需求与老年福利供给性别策略研究”(14BSH045)

作者简介:孙小宇(1993-),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与社会学、农村社会管理。

本文信息:孙小宇,郑逸芳,许佳贤.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63-72.

Social Survey,简称“CGSS2013”“CGSS2015”)数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丰富妇女社会地位的概念及内涵,拓展妇女社会地位的评价指标,探讨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以及当前妇女社会地位变化,并予以实证检验,并对如何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提出建议,以期相关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是社会分层的三个构成要素,社会地位是指他人对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遵从与敬重^[6],是社会分层中反映社会名望的部分。目前,学者们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内涵界定因研究需要的不同,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主要包含三种解释:其一,妇女地位是指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拥有和控制物质资源、社会资源的能力和程度^[7],如 Dixon, R. B. 认为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是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必定反映资源控制者的实际地位。其二,妇女社会地位就是指女性作为个体或一个社会整体被他人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尊重程度,及其所拥有的生存与发展机会的平等程度^[8]。满林彦认为,妇女的作用、威望以及权威是妇女社会地位的三要素,这三者之间互相制约、辩证统一,共同体现妇女社会地位水平^[9]。其三,妇女社会地位是指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比较社会地位,即妇女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家庭生活各方面与男性的平等程度^[1]。陈再华认为,妇女社会地位的高低是相对于某一特定标准、特定对象、特定的参照物(例如男性)来确定的^[10]。因此,众多学者从性别结构视角出发理解女性的社会地位,以男性群体的社会地位为参考系,以此来比较男性与女性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整体差异^[11-12]。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术界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概念界定大多集中在社会参与、家庭决策方面与男性的平等程度,但是忽略了女性对自身的自我认可程度和自我评价。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妇女自我认可和自我评价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以期拓展学界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概念内涵,丰富妇女社会地位方面的研究。所以,本文认为妇女社会地位是指妇女在参与社会和家庭事务管理过程中与男性的平等程度,以及自我认可、自我评价的程度。

在探究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方面,本文借

鉴许红莉等^[13]、叶文振等^[8]学者的研究框架,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研究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

第一,在社会层面上,叶文振教授认为加快城镇化有利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8];另外,妇女解放运动领袖和妇女研究人员认为妇女要想摆脱家庭的束缚、实现独立自强、提升妇女社会地位就要参与到生产劳动中去^[3]。联合国采用女性入学率、女性就业率、女性在领导岗位上担任重要职务的比例、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例来测度妇女的社会地位。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采用健康、婚姻与孩子、教育、就业和社会平等5大类20个指标来评价妇女的社会地位。冯立天教授指出,妇女的经济地位、劳动地位、教育地位、社会参与、健康地位等6个方面都会对妇女的社会地位状况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14]。因此,本文在研究妇女社会地位中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时不单单考虑妇女的城乡差异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更将妇女的社会平等、社会参与与劳动参与纳入研究范围。基于此,本文拟用政治参与、户口性质、就业状况等三个方面来表征妇女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政治参与程度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政治参与程度越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就越高。

假设2:户口性质与妇女社会地位存在相关关系,非农户口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农业户口妇女的社会地位。

假设3:就业状况与妇女社会地位存在相关关系,目前有工作的妇女其社会地位要高于目前没有工作的妇女。

第二,在家庭层面上,妇女社会地位受母亲受教育程度影响,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女性社会地位^[13];夫妻教育水平差异^[15]和夫妻收入差距^[16]是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还有学者认为家务劳动时间的分配和家庭事务决定权的大小也会体现妇女的社会地位的高低^[3];本文拟用家庭教育背景、家庭负担、夫妻差异来衡量妇女社会地位中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家庭教育背景对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家庭教育程度越高,其妇女的社会地位就越高。

假设5:家庭负担对妇女社会地位有负向影

响,家庭负担越重,妇女社会地位越低。

假设 6:夫妻差异与妇女社会地位存在相关关系,夫妻差异越大,相对弱势的一方将会在生活中处于相对较低的地位。

第三,在个人层面上,2010 年 12 月我国开展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认为,妇女的健康、教育、经济、社会保障、政治、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法律权益和认知、性别观念和态度等 9 个方面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17];丁娟、李文通过进步与落后两个维度和共识与差异 4 个象限考察妇女对社会地位的认知与态度,从而认为性别、城乡、教育、职业、年龄等因素对个体观念和生活方式造成影响,继而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18]。本文拟选用以妇女年龄、教育、收入变量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自我认可和性别意识来表示妇女社会地位中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因此提出了以下假设。

假设 7:人力资本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人力资本越丰富,妇女的社会地位越高。

假设 8:自我认可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自我认可程度越高,妇女社会地位越高。

假设 9:性别意识与妇女社会地位存在相关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3 年和 2015 年的 CGSS,该调查从 2003 年开始,每年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一万多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所以剔除了男性的样本。在删除关键变量的缺失值后,2013 年数据得到有效样本 3 448 个,占女性样本的 60.68%。2015 年数据得到有效样本 3 433 个,占女性样本的 58.84%。样本在城乡分布上比较均衡,2013 年数据中有 57.74%的女性为农业户口,42.26%的女性为城镇户口;样本中有工作的女性占 59.51%。2015 年数据中有 59.66%的女性为农业户口,40.34%的女性为城镇户口;样本中有工作的女性占 56.34%。整体而言,样本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低,2013 年数据中有 70.10%的女性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丈夫的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程度占 64.33%;2015 年数据中有 71.19%的女性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丈夫的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受

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程度占 64.78%。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因变量为妇女社会地位。本研究用阶级认同的等级来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通过数据处理,剔除掉拒绝回答和不知道的情况,等级用 1~10 分的整数来衡量,等级得分 1 分表示最底层,等级由低到高递增,10 分表示最顶层。因此,本文将阶级认同等级为 1~3 分定义为社会地位较低,4~7 分为社会地位中等,8~10 分为社会地位较高。2013—2015 年妇女社会地位变化如表 1 所示,社会地位较低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数减少,但是社会地位中等的人数呈上升趋势。因此表明我国妇女社会地位整体而言正呈现一种上升趋势,社会地位两极分化正在减弱。

表 1 2013 年、2015 年妇女社会地位变化

项目	2013 年	2015 年	变化
社会地位较低	913	835	负向
社会地位中等	2 423	2 523	正向
社会地位较高	112	75	负向

在自变量的选择方面,本文参考前人的研究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主要分为社会层面、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三个层次,并对这三个层面的指标选择进行一定的丰富和拓展。

社会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政治参与、户口性质和目前就业状况三个方面,以表征社会层面因素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

家庭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教育背景、家庭负担、夫妻差异。其中家庭教育背景包括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家庭负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加入对老人赡养负担的考量,即主要分为生育子女的数量和家中老人数量两个方面。夫妻差异也包含两个方面,分别是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和夫妻收入差别。

个人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人力资本、自我认可和性别意识。其中人力资本包括年龄、本人受教育程度、本人 2012 年(2014 年)全年总收入。自我认可在生活幸福感知的基础上考虑同龄人间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和时间跨度上社会经济地位的纵向变化,分为三个方面:生活幸福感知、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和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性别意识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性别分工、性别优势、自主观念、性别歧视和家务分工。上述变量的具体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2013 年	2015 年
被解释变量	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较低 = 1; 社会地位中等 = 2; 社会地位较高 = 3	1.768	1.779
社会层面	政治参与	“上次居委会/村委会选举中是否参加了投票?”否 = 0; 是 = 1	0.451	0.468
	户口性质	农业户口 = 0; 非农业户口 = 1	0.423	0.403
	就业状况	目前没有工作 = 0; 目前有工作 = 1	0.595	0.563
家庭教育背景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2.724	2.775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4.379	4.178
家庭负担	家中老人数量	“您家中有几个老人和您住在一起?”(个)	0.228	0.227
	生育子女数量	“您有几个子女?”(个)	1.785	1.783
夫妻差异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	丈夫的受教育年数 - 女性的受教育年数(年)	1.243	1.159
	夫妻收入差别	丈夫 2012 年(2014 年)全年总收入(元)的对数 - 女性 2012 年(2014 年)全年总收入(元)的对数	1.665	1.550
人力资本	年龄	2013 年(2015 年)时的年龄(岁)	47.591	48.736
	受教育程度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8.126	8.061
	个人收入	2012 年(2014 年)全年的总收入(元)的对数	7.833	7.558
自我认可程度	生活幸福感知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不幸福 = 1;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 2; 幸福 = 3	2.709	2.725
	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	“与同龄人相比,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 = 1; 差不多 = 2; 较高 = 3	1.704	1.715
	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	“与三年前相比,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化”下降了 = 1; 差不多 = 2; 上升了 = 3	2.351	2.260
性别意识	性别分工	“您是否同意‘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不同意 = 1; 无所谓同意不同意 = 2; 同意 = 3	2.351	2.285
	性别优势	“您是否同意‘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不同意 = 1; 无所谓同意不同意 = 2; 同意 = 3	1.984	2.004
	自主观念	“您是否同意‘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不同意 = 1; 无所谓同意不同意 = 2; 同意 = 3	2.161	2.160
	性别歧视	“您是否同意‘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应该先解雇女员工’”不同意 = 1; 无所谓同意不同意 = 2; 同意 = 3	1.410	1.410
	家务分工	“您是否同意‘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不同意 = 1; 无所谓同意不同意 = 2; 同意 = 3	2.615	2.649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 计量模型的选择

在回归分析中,有序概率模型(有序 Probit、有序 Logit 模型)常被用在因变量为有序变量的

情形下。为了探究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本文采用有序 Logit 模型进行研究,模型设定如下:

$$y_i = F(\beta X_i + \epsilon_i) \quad (1)$$

式(1)为不含交互项的回归模型。式(1)中, y_i 为被解释变量,即妇女社会地位; X_i 表示解释变量

(具体见表 2); ϵ_i 为随机扰动项。函数 F 为某非线性函数,其具体形式

$$F(y_i^*) = \begin{cases} 1, y_i^* > \mu_{i-1} \\ 2, \mu_1 < y_i^* < \mu_2 \\ \vdots \\ j, y_i^* > \mu_{j-1} \end{cases} \quad (2)$$

式(2)中, $\mu_1, \mu_2, \dots, \mu_{j-1}$ 为切割点,均为待估参数; y_i^* 是样本妇女*i*潜在真实的社会地位,由于这个值不可观测,为潜变量。该潜变量满足:

$$y_i^* = \beta X_i + \epsilon_i \quad (3)$$

(二)结果分析

通过 Stata12.0 软件进行分析,表 3 列出了对全部有效样本进行估计的结果。从 2013 年和 2015 年两年的估计结果来看,社会层面、家庭层面、个人层面在模型中的显著性状况都较为一致,说明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较强。

表 3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分析

解释变量		2013 年		2015 年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社会层面	政治参与	- 0. 055	0. 082	0. 117	0. 086
	户口性质	0. 060	0. 107	0. 185 [*]	0. 112
	就业状况	- 0. 227 ^{**}	0. 100	- 0. 072	0. 099
家庭层面	家庭教育背景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0. 009	0. 014	0. 012	0. 016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0. 008	0. 012	0. 004	0. 013
家庭负担	家中老人数量	- 0. 140 [*]	0. 074	0. 126	0. 082
	生育子女数量	- 0. 038	0. 047	0. 005	0. 047
	夫妻差异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	0. 066 ^{***}	0. 014	0. 044 ^{***}	0. 015
	夫妻收入差别	0. 082 ^{***}	0. 020	0. 047 ^{***}	0. 015
人力资本	年龄	0. 001	0. 005	0. 004	0. 004
	受教育程度	0. 067 ^{***}	0. 015	0. 064 ^{***}	0. 016
	个人收入	0. 103 ^{***}	0. 022	0. 053 ^{***}	0. 018
	自我认可程度				
	生活幸福感知	0. 389 ^{***}	0. 068	0. 581 ^{***}	0. 069
	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	1. 174 ^{***}	0. 080	1. 183 ^{***}	0. 083
	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	0. 350 ^{***}	0. 067	0. 338 ^{***}	0. 070
性别意识	性别分工	0. 085	0. 053	0. 080	0. 055
	性别优势	- 0. 008	0. 050	0. 013	0. 054
	自主观念	- 0. 064	0. 049	- 0. 037	0. 052
	性别歧视	- 0. 005	0. 061	0. 155 ^{**}	0. 064
	家务分工	0. 179 ^{***}	0. 058	0. 060	0. 063
	/cut1	4. 618 ^{***}	0. 453	4. 941 ^{***}	0. 438
	/cut2	9. 652 ^{***}	0. 485	10. 556 ^{***}	0. 482

注: *、** 和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水平。

1. 社会层面、家庭层面、个人层面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

根据表 3 显示的回归结果,并结合上文所作出假设,本文从社会、家庭、个人层面分别阐述其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

(1)社会层面。在 2013 年数据中,就业状况对妇女社会地位有负相关关系,且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是在 2015 年数据中,就业状况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不显著,这就说明,就业状况

已经不再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另外,户口性质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但是在 2013 年的回归分析中,户口性质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后一时期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

(2)家庭层面。在家庭层面上,家庭教育背景对妇女社会地位没有显著的影响,母亲的受教育

程度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不显著。在家庭负担中,2013年变量家中老人数量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中老人数量越多,妇女所要承担的家庭照料负担、家庭赡养负担就会加重,其社会地位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生育子女数量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不显著。相反,2015年家中老人数量与生育子女数量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均不显著。由此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负担已经不再是阻碍妇女社会地位重要因素。在夫妻差异中,2013年和2015年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和夫妻收入差别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性的影响。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和收入差别是通过丈夫的受教育年限(或2012、2014年全年总收入对数)-女性的受教育年限(或2012、2014年全年总收入对数)来衡量,其回归结果表示为夫妻间的受教育差别或收入差别越大,妇女的社会地位就越高。这一结果似乎有悖常理,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大多数人受男权文化的影响,男性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或较高的收入,妇女往往对男性有一定的依附关系,其他人对女性的态度及看法和女性本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往往受男性的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影响,其社会地位也会随着男性地位的提高而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妇女自我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是女性在男权文化下的一种自我满足。

(3)个人层面。在个人层面上,2013年和2015年人力资本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较为显著,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就越高;同样妇女的收入越多,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就越高。年龄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不显著。

2013年和2015年妇女的自我认可对其社会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活幸福感知、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和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都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妇女对现在生活的感知越幸福,其社会地位就越高;“与同龄人相比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就越高;“与三年前相比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反映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妇女的性别意识与其社会地位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在性别意识上,2013年性别分工、性别优势、自主观念和性别歧视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不显著。家务分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女性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对“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

务”这种说法越同意,妇女的社会地位就越高;但2015年家务分工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不显著,由此表明传统的性别思想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减弱。2015年性别歧视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并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是持这种观点的群体为女性管理者,其性别歧视意识仍然存在,在经济不景气时,出于理性的考虑会先解雇女性,但是这一部分群体的整体社会地位较高。其次,不赞同“经济不景气时先解雇女员工”的群体本身在工作中可能遭遇不公正的待遇,其拥有较强的性别意识,认为自身社会地位较低,因此造成了回归结果的正向影响。

2. 不同时期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分析

有序Logit模型是概率模型,其系数大小不能反映该因素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程度的大小。因此,为考察2013年和2015年不同因素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程度的大小和变化,本文计算了妇女社会地位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详见表4。

纵观2013年和2015年不同因素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程度的大小和变化,夫妻差异、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减弱。

具体来说,在社会层面上,2013年就业状况与妇女社会地位呈负相关关系,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在2015年中就业状况变量不显著。这一结果与上文回归结果一致,由此表明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另外,户口性质变量的显著性程度同样也与表3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在家庭层面上,边际效应估计结果与回归结果一致。家庭教育背景和家庭负担中的生育子女数量对妇女社会地位均无显著影响;家中老人数量只对2013年妇女的社会地位影响显著,对2015年妇女的社会地位影响不显著。在两年的数据分析中,夫妻差异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和夫妻收入差异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是,比较其影响程度,2015年的影响程度明显小于2013年的影响程度,由此说明夫妻差异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正在减弱。

在个人层面上,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具体的影响程度大小上,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的影响程度较2013年有所下

降。自我认可程度与妇女社会地位呈正相关关系,生活幸福感知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程度增加,相反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和纵向变化的影响程度减弱。由此表明妇女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感知更多地倾向于自身生活幸福感的提高,而不仅仅凭借自身的社会经济水平来衡量自身的社会地位。另外,性别意识与上文回归分析结果一致。

表 4 不同时期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

解释变量		2013 年			2015 年		
一级变量名称	二级变量名称	社会地位 较低	社会地位 中等	社会地位 较高	社会地位 较低	社会地位 中等	社会地位 较高
社会层面	政治参与	0.009	-0.007	-0.002	-0.018	0.015	0.002
	户口性质	-0.010	0.008	0.002	-0.028*	0.024*	0.004*
	就业状况	0.037**	-0.030**	-0.007**	0.011	-0.009	-0.001
家庭教育背景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0.001	0.001	0.000	-0.002	0.002	0.000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0.000
家庭负担	家中老人数量	0.023*	-0.019*	-0.004*	-0.019	0.016	0.003
	生育子女数量	0.006	-0.005	-0.001	-0.001	0.001	0.000
夫妻差异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	-0.011***	0.009***	0.002***	-0.007***	0.006***	0.001***
	夫妻收入差别	-0.013***	0.011***	0.002***	-0.007***	0.006***	0.001***
人力资本	年龄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0
	受教育程度	-0.011***	0.009***	0.002***	-0.010***	0.008***	0.001***
	个人收入	-0.017***	0.014***	0.003***	-0.008***	0.007***	0.001***
自我认可程度	生活幸福感知	-0.063***	0.051***	0.012***	-0.088***	0.076***	0.012***
	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	-0.191***	0.155***	0.036***	-0.179***	0.155***	0.025***
	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	-0.057***	0.046***	0.011***	-0.051***	0.044***	0.007***
性别意识	性别分工	-0.014	0.011	0.003	-0.012	0.010	0.002
	性别优势	0.001	-0.001	-0.000	-0.002	0.002	0.000
	自主观念	0.010	-0.008	-0.002	0.006	-0.005	-0.001
	性别歧视	0.001	-0.001	-0.000	-0.023**	0.020**	0.003**
	家务分工	-0.029***	0.024***	0.005***	-0.009	0.008	0.001

注: *、** 和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水平。

3.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

2015 年的实证分析中,户口性质对妇女社会地位具有显著影响,妇女社会地位存在城乡间的差异。因此,本文根据户口性质(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分成农村样本和城镇样本进行分样本回归,以分析妇女地位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通过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进行分析,2013 年夫妻收入差别、女性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妇女的自我认可程度和妇女持有的性别意识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2015 年仅妇女的自我认可程度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这也说明,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正在逐步提高。

在社会层面上,2013 年和 2015 年政治参与对城镇和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均没有显著影响。2013 年就业状况对农村妇女影响显著,对城镇妇女影响不显著。2015 年就业状况对农村和城镇

妇女均没有显著影响,与上文结论一致,由此表明我国农村妇女地位不断提高。

在家庭层面上,2013 年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但 2015 年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均没有显著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农村教育水平的提升,城乡教育差异减弱,妇女教育水平的提升主要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而不是家庭教育获得。家中老人数量对两年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的是,2013 年其对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有负相关关系,2015 年其对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有正相关关系,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多,农村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显现,社会地位提高。生育子女数量对两年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在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方面,其两年都对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对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没

有显著影响,以此来说明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对农村妇女的影响要大于对城镇农村妇女的影响,因此要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2013 年夫妻收入差异对农村和城镇都有正相关关系,但 2015 年夫妻收入差别仅对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正相关关系,因此夫妻收入差距依然是影响城镇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之一。

在个人层面上,年龄在 2013 年和 2015 年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没有显著影响。2013 年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但 2015 年其只对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有影响,由此表明现阶段我国应该逐步提高农村妇女的受教育水平,缩小农村夫妻间的教育程度差别,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2013 年妇女个人收入对城镇和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有正相关关系,但 2015 年妇女个人收入对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我国农村正在改变以经济收入决定家庭地位的现状。

在妇女的自我认可程度上,纵观 2013 年、

2015 年数据,生活幸福感知、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和社会经济地位变化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

在妇女所持有的性别意识上,2013 年变量自主观念对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负相关关系,城镇妇女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观念认同越高,其社会地位越低。家务分工对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影响显著,这表明农村妇女被繁重的家务所束缚,均等的分摊家务有利于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有利于农村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2015 年性别优势对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负相关关系,对“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观点越认同,其社会地位就越低;性别歧视对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正相关关系,其可能的原因与上文一致。因此,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要积极提高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摆脱“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传统观念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错误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发挥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作用。

表 5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

解释变量		2013 年		2015 年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农村样本	城镇样本	农村样本	城镇样本
社会层面	政治参与	- 0. 141	0. 105	0. 063	0. 243
	就业状况	- 0. 266 **	- 0. 236	0. 054	- 0. 322
家庭教育背景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0. 034 *	- 0. 021	0. 010	0. 029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 0. 010	0. 031 *	0. 011	- 0. 003
家庭负担	家中老人数量	- 0. 205 **	0. 000	0. 163 *	0. 004
	生育子女数量	- 0. 068	0. 017	- 0. 003	0. 057
夫妻差异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	0. 080 ***	0. 041	0. 045 ***	0. 044
	夫妻收入差别	0. 068 ***	0. 118 ***	0. 027	0. 091 ***
人力资本	年龄	0. 006	- 0. 008	0. 005	- 0. 001
	受教育程度	0. 082 ***	0. 046 *	0. 076 ***	0. 041
	个人收入	0. 090 ***	0. 153 ***	0. 033	0. 101 ***
自我认可程度	生活幸福感知	0. 357 ***	0. 460 ***	0. 514 ***	0. 753 ***
	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	1. 118 ***	1. 282 ***	1. 116 ***	1. 406 ***
	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	0. 343 ***	0. 379 ***	0. 206 **	0. 637 ***
性别意识	性别分工	0. 083	0. 094	0. 078	0. 095
	性别优势	- 0. 018	0. 015	0. 091	- 0. 170 *
	自主观念	0. 045	- 0. 224 ***	- 0. 010	- 0. 091
	性别歧视	- 0. 101	0. 157	0. 115	0. 259 **
	家务分工	0. 241 ***	0. 049	0. 029	0. 144
/cut1		4. 706 ***	4. 529 ***	4. 496 ***	5. 985 ***
/cut2		9. 754 ***	9. 658 ***	9. 573 ***	12. 510 ***
样本量		1 991	1 457	2 048	1 385

注: *、** 和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水平。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CGSS2013 和 CGSS2015 数据,从社会层面、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考察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夫妻收入差别、受教育程度、收入、自我认可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夫妻教育程度差别越大,妇女社会地位越高;夫妻收入差别越大,妇女社会地位越高;妇女受教育程度、收入越高,妇女社会地位越高;妇女自我认可程度越高,社会地位越高。同时,本研究通过对女性社会地位边际效应分析以及城乡差异分析,也证实了以上的观点,并且研究表明,妇女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

因此,为了改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妇女社会地位,应该从政府、社区、就业单位、社会舆论、家庭和女性个人等6个层面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在政府层面上,立法部门要完善立法和政策建设,审视清理和修订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盲点的内容;加强普法,使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加大执法力度,打击侵犯妇女权利的行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教育部门应坚持教育公平的原则,将公共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和农村地区倾斜。同时政府部门应积极扶持女性自主创业,为女性创业提供政策、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资助和扶持^[19];推行女性继续教育制度,使失业妇女再就业。另外,重视妇联组织和公益机构对维护妇女权益的作用,集中整合政府、妇联组织和公益机构的资源,统筹城乡,建立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合作联动的妇女事业支持网络体系^[3]。

在社区层面上,开拓女性就业的多元化渠道,积极开发社区公益性岗位和发展社区小企业,为社区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街道和社区居委会要充分发挥社区功能,发展公共服务事业,完善社区幼儿园、医院等设施,促进家务社会化,以缓

解职场压力和减轻家务负担。

在就业单位层面上,各类用人单位要落实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的相关政策,保障男女同工同酬,缩小男女收入差距。另外,提高女性在用人单位决策和管理层的比例,确保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保障。

在社会舆论层面上,首先大众传媒管理者要将性别观点纳入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中,使大众传媒工作者破除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树立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其次,大众传媒要向全社会广泛深入宣传先进的性别意识,引导人们树立两性平等的意识,营造一种“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最后,大众传媒要广泛听取妇女的多种声音,形成有社会性别视角的舆论环境和舆论监督^[20]。

在家庭层面上,转变“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倡导“男女平等、夫妻比翼、分享家务、共同发展”的理念,破除旧的家庭分工,均等地分摊家务,使妇女摆脱繁重的家务负担,从而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提高女性社会竞争力。

在女性个人层面上,一方面妇女应该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增强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以提高其经济收入,缩小夫妻间的受教育程度差别和夫妻间的收入差别。另一方面,妇女应该提高自我的认可程度和端正自己的性别意识。男权文化不仅不合理地降低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而且还让处于不平等社会地位中的女性处于自我满足状态^[8]。因此,女性必须从自身做起,提高自我的认可程度和自信心,端正自己的社会性别意识,通过不断学习以充实和提高自我,真正从思想上消除以男权为核心的传统性别文化,摆脱自我满足状态,不断增强自身的适应力和竞争力。

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许多变量仅仅是从问卷中选用的代表变量,没有采用更加精准的测量方法。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将对变量的适用性和测量的精确性方面加以提高。

参考文献:

- [1] 韦惠兰,杨琰.妇女地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1999(2):97-103.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 李超海.家务劳动时间、家务决策权与妇女社会地位关系探讨——以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29-135.
[4] 王金玲.转型与发展——福建妇女社会地位研究

- 2000—2010[M].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
- [5]山西行政学院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组,冯锦彩,刘宁.我国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特点及应对思路——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山西省数据为蓝本[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1):86-90.
- [6]Renzetti C M, Curran D J. Needham Heights: Allyn and Bacon [J]. Living Sociology, 2000:197.
- [7]Dixon-Mueller R B. Rural women at work: Strategies for development in South Asia[M]. Routledge, 2013.
- [8]叶文振,刘建华,杜鹃,等.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J]. 人口学刊,2003(5):22-28.
- [9]满林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现状研究[D].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6.
- [10]陈再华.妇女地位综合评价指标探讨[J]. 中国人口科学,1993(6):39-44+51.
- [11]颜士梅.台湾妇女社会地位的现状及其成因[J]. 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58-63.
- [12]吴帆.相对资源禀赋结构中的女性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J]. 学术研究,2014(1):42-49.
- [13]许红莉,吴锦峰.女性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湖北地区为例[J]. 现代商贸工业,2012,24(17):94-96.
- [14]冯立天,陈再华.北京城市妇女地位调查研究[J]. 人口与经济,1994(1):29-41.
- [15]沈安安.家庭文化模式对妇女地位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1994(4):51-58.
- [16]顾鉴塘.北京市城区在业妇女经济收入研究[J]. 人口与经济,1994(5):44-51.
- [17]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 妇女研究论丛,2011(6):5-15.
- [18]丁娟,李文.关于妇女社会地位认知与态度基本状况的分析与思考[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6):7-17.
- [19]徐晓琴.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提升的对策——以忻州为例[J]. 理论视野,2015(10):82-84.
- [20]陈秀云.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中国的实践与探索[J]. 妇女研究论丛,2005(S1):92-95.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omen's Social Statu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 2013,2015

Sun Xiaoyu, Zheng Yifang, Xu Jiaxi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Women's social status is not on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igns of social change, but also a crucial measurement of progress in social civilization. By using the CGSS2013 and CGSS2015,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from three levels: the social, family and individual.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education level, marital income level, education level, income, and women's self-recognition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social status. Meanwhile, the influence of couples differences, human capital,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women's social status has been weakened through two years of data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regression of urban and rural samples, the social status of rural and urban women has been improved, but there lies rural-urban difference in women's social status. Therefore, government, community, employment, public opinion, family, and individual resources should be integrated, so as to form a concerted effort to promote women's social status.

Key words: women's social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society; family; individual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73-06

全面二孩政策下高校女教师“产假式缺编”治理

——以精准治理分析的视角

刘佳佳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产假式缺编”是各级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都应重视的问题,不仅体现了政府精准治理的趋势,也体现了企业、个人在问题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无论是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产假式缺编”的现实压力,抑或是“产假式缺编”的当前困境,都反映出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高校以及个人等在精准治理理念、治理机制和治理主体上的短板与缺位。全面二孩政策作为战略性顶层设计的确立,是国家科学的把握人口发展规律,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需要创新理念,完善治理机制,促进多元主体共治,推进解决“产假式缺编”治理的思路与方法创新。

关键词:二孩政策;高校;产假式缺编;精准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11

一、问题的提出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女性从业者占比高的单位将受到挑战,会出现女性扎堆生二孩的现象。在“扎堆生育”的现实情况下,一方面要维护女职工的生育权,另一方面要保障单位的正常工作运转,使得不少单位出现了“产假式缺编”的问题。“产假式缺编”是女职工休产假而出现的缺编,简单来说就是职工由于休产假,短时间内的在编不在岗的现象。^[1]扎堆生育,扎堆休产假,给用人单位造成了“用人荒”,单位自身无法解决,外聘人员又将面临着安置问题,“产假式缺编”人数越多,越容易造成用人难题。但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全面二孩政策是我国的基本政策,不仅关乎我国经济发展,而且深刻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国家放开二孩政策,以政策的形式来保障妇女的生育权。同时推进公办学校的建设,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提

高教育的公共服务能力。^[2]除此之外,各地纷纷延长产假来保护妇女权益。政策支持导致女性扎堆生育二孩的情况频发,由此女性职工占比高单位所面临的“产假式缺编”治理越发困难。

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给经济、社会、家庭带来了多重的压力。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难、城市建设青年劳动力不足问题以及独生子女教育难等问题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明确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央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3]显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以及顶层设计的政策文本中,生育政策的重要性历来被高度重视,对于推进健康中国 and 确保中国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具有特殊战略意义。对于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而言,要推进全面二孩政策,开创人口

收稿日期:2018-04-24

基金项目:移动互联网时代辅导员资助育人工作探析(JAS170656)

作者简介:刘佳佳(1994-)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治理。

本文信息:刘佳佳.全面二孩政策下高校女教师“产假式缺编”治理——以精准治理分析的视角[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73-78.

与计划生育工作新局面,就不能不聚焦“产假式缺编”治理的问题。

二、分析框架:精准治理理论的分析与运用

治理是一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民众或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它是调和公共事务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是由具有强制性、服从性、正式性的规章制度和符合公共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构成,^[4]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4]。社会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共治,以政府主体为政治主导,第三部门以及公民等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活动^[5]。然而,在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政府的精准化治理成为大势所趋。^[3]精准治理是以全面精准的个体化信息集成为治理基础,以科学严谨的信息挖掘分析为治理前提,以科学合理的政策工具为治理手段,推进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新再造过程。^[6]精准治理理念已成为各国政府管理的一种主要方式,并逐步应用于政府治理的各个领域。

“产假式缺编”治理作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协调、不均衡以及编制缺乏灵活性的结果。“产假式缺编”在治理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政府主动性不够导致的治理效率底下的问题,还包括政府无法精准识别不同地区的差异性,进行针对性治理的问题,同时还包括高校管理政策不合理等原因。因

此,“产假式缺编”治理,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精准化的治理模式来提升政府执行力,同时发挥基层政府和高校的积极性,达到解决难题的治理效果。

“产假式缺编”治理作为一项长期工程需要精准化治理逻辑结构(见图 1),包括治理理念、治理机制以及治理主体。精准化的治理理念,合理有序的治理机制,多样化的治理主体,三者的相互协作才能发挥治理的最大效用。政府作为治理主体,若在整个“产假式缺编”治理过程中始终是治理行为的主动发起者,治理效果将大大提升,若政府在“产假式缺编”治理过程中主动性不足会造成回应滞后,无法真正做到精准的主动治理,治理效果将大打折扣。换言之,精准治理是“产假式缺编”治理的前提条件,政府只有具备主动性并实施执行才能解决缺编问题,避免“产假式缺编”带来的不利局面。

解决“产假式缺编”,首先要先精准识别地区差异,否则治理就无从下手。有学者认为,城乡、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导致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和总体生育率水平差异明显,因而各地在执行全面二孩政策过程中需要的配套政策措施也会有差异性。而精准治理能够有效发挥各级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形成相互制约、相互协作的治理整体,能够准确地识别不同地区的“产假式缺编”治理问题,并做到对症下药。全面二孩政策出台,需要各级政府之间相互配合实施,同时也需要各个部门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来保障国家政策的有序开展。对于“产假式缺编”治理,则更加需要各级地方政府的协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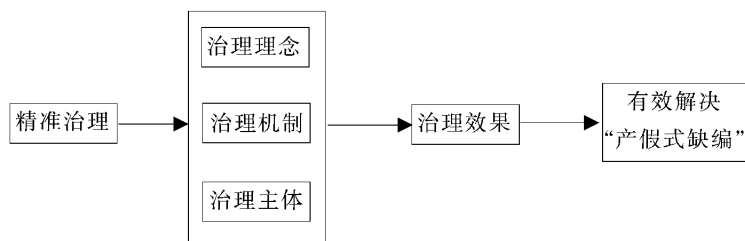


图 1 “产假式缺编”的精准治理逻辑结构

三、案例导入:F 省 Z 市 P 学院“产假式缺编”及其治理

(一)P 学院概况

F 省 Z 市 P 学院是当地唯一一所本科院校,

是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由 F 省政府领导和管理,实行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办学体制。P 学院现有在编教师 1 127 人,其中女教师大概有 870 人,女教师占全部教师的比例大约为 77%,而且很多二级学院女教师生育二孩

的比例几乎达到了 90%，除了年龄已经超过育龄期的，凡是在育龄期的女职工基本上都要生二胎！据不完全统计，全校大概有 70% 女教师准备生二胎。

（二）P 学院“产假式缺编”的影响

根据表 1，产假式缺编对政府的影响为 18.2%，对政府的影响分为 2 个方面，对编制方面的影响

比较大。首先“产假式缺编”缺的是教师，这说明学校的人员编制不合理，政府部门需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来科学的核定编制。其次是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日趋增长，各个高校都想通过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产假式缺编”会造成师资结构不合理，影响高校教学水平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表 1 产假式缺编对政府、学校、个人方面的影响

影响的方面	影响的现状	影响所占百分比/%	
政府方面	教师编制	9.3	18.2
	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8.9	
学校方面	师资不足	9.5	58.7
	怀孕教师压力大	9.1	
	在岗教师教学任务加重	11.5	
	教学水平受到影响	9.5	
	男女教师性别比例不合理	10.0	
	中层管理者减少	9.1	
个人方面	影响女教师的晋升和职业生涯规划	12.1	23.1
	女教师承受家庭与学校的双重压力	11.0	

产假式缺编对学校的影响高达 58.7%，对学校的影响分为 6 个方面，在岗教师教学任务加重这个方面的影响最大。“产假式缺编”缺的是教师，在教师人员不足的情况下，首先第一个解决措施就是在岗教师分担教学任务，完成教学计划，不能耽误学生的课程，所以在岗教师的教学任务加重，教学压力变大。其次是男女教师性别比例不合理，现在学校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各个高校，女性教师远远多于男性教师，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教师扎堆生育，扎堆休产假会给学校带来很大的影响。“产假式缺编”，虽然是临时性的在编不在岗的情况，但是高校以专业化来划分，如果在一段时间没有相关专业的教师来给学生上课，会影响教学水平，到时二孩女教师重回岗位，压力也会变大。然后生育二孩的女教师，在高校已经有相当长的工作年限，很多已经晋升到中层管理者的职位，但是因为要生二孩，很多女教师放弃了晋升的机会，使得学校的中层管理者减少。最后，“产假式缺编”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师资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影响高校教学水平的提高。

由表 1 统计数据可知，产假式缺编对个人的

影响为 23.1%，女教师休产假会影响个人的晋升和考核，因为休产假会耽误教学任务，会影响一些参与项目的进度等，从这方面看女教师生育二孩，机会成本会减少。因为高校女教师的晋升和职业生涯规划的途径主要是靠更高学位的攻读和参与更多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不然一直徘徊在低职称上的工资收入不高和心理落差加大都会加重其对自己职业发展前景的无望和无助。^[7]所以，选择生育二孩可能要放弃一次晋升的机会，可能这个机会一辈子都不会再有；选择生育二孩会减少学术科研和交流的时间，甚至可能会影响育后相关职称的评定。另一方面，女教师承受家庭与学校的双重压力，学校的压力来自教学任务，家庭的压力来自需要照顾刚出生的孩子。教学任务往往与全身心照顾刚出生婴儿之间不能做到两全其美，这是每个高校的女教师都将面临的难题。

（三）P 学院“产假式缺编”的原因分析

从政府治理的角度，解决“产假式缺编”是当代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具有战略性、长远性和根本性，因此各级政府需要加大投入力度解决问题。然而，在当前中国政府治理视域中，全

面二孩政策往往从国家战略高度被人们认识,而引发的“产假式缺编”问题却易被各级政府所忽视。对于“产假式缺编”难题,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未作出积极响应,仅靠高校难有成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前,未能事先评估此次政策变动给教育部门、各高校主体带来何种影响,并积极出台相应的措施。对于全面二孩政策所带来的“产假式缺编”处于较为消极的应对状态,未有整体的、有序的应对措施。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高校的师资越来越紧缺,许多高校向教育行政部门反映过此类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明确有效的回应。编制总量核定,教育行政部门没有办法给学校新的教师编制,不能根据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的实际情况,进行人员的增加或者减少,合理地调整编制。同时,人社部门统筹教师招聘,不能科学合理的评价教师的专业素养,招聘的教师素质和各方面的专业技能良莠不齐,有些达不到高校的用人标准。此类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产假式缺编”治理更无从谈起。

从学校治理的角度,首先P学院管理者没有制定完善的报备制度,未能摸清本校想要生育二孩教师的数量,在不能完全摸清想要生育二孩教师数量的前提下,就无法根据各个学院实际生育二孩的情况来合理地调控教学任务。其次,缺乏与其他院校合作。P学院是P市唯一一所本科院校,除了M职业技术学院,附近没有其他高校。如果P学院“产假式缺编”严重的情况下,从其他相关院校调教师过来的几率几乎为零。同时P学院也没有与其他师范类的高校进行合作,也很难通过优秀毕业生实习顶岗来解决临时性的缺编问题。

(四)P学院“产假式缺编”治理逻辑

1. 政府成立人才储备库

编制总量核定的情况下,政府的相关部门购买社会服务,了解退休师资和待岗师资的基本情况以及人员数量,建立档案,将有代课意愿的高校教师纳入人才库。让这些“代课”教师平时可以到学校听课、学习。如果某个高校急需教师,随时可以到代课教师中心去寻找,并由所需教师的高校和教育部门对拟选定的教师进行相关专业知识和教学技巧方面的考核,择优上岗。同时地方政府部门加强财政支出,解决聘用代课教师的费用,帮

助学校度过难关。

2. 高校摸清女教师生育意愿,引导“错峰生育”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P学院对在校女教师的生育意愿进行摸底调查,统计“二胎”意愿的女教师的数量,了解女教师的生育计划。调整教学计划,安排相应的教师顶岗,做好提前预备措施。同时,学校的工会组织合理安排时间和二孩女教师进行沟通交流,根据女教师的家庭、年龄、生育意愿、身体状况等综合因素,再结合学校的具体教学计划,诚恳的与女教师之间达成生育共识,合理引导符合生育条件的女职工进行“错峰生育”。

3. 调整招聘计划,扩大男教师的招聘比例

P学院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调,性别结构化问题严重,女教师占全部教师的50%以上,因此“产假式缺编”治理显得更为迫切。P学院管理者根据学校的现实情况重新制定招聘计划,加大男性教师招聘比例,在招聘过程中男性教师具有优先录用的优势。P学院只有在编制的范围内以合理均衡的男女比例招聘教师,“产假式缺编”治理才能凸显成效。

四、扩展分析:高校女教师“产假式缺编”的精准治理路径

(一)精准治理理念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之后再次将社会治理提档升级,这也预示着中国将全面进入精准治理时代。精准治理与一般治理相比,更注重治理的目标、治理对象、治理路径。“产假式缺编”治理中运用精准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明确的解决学校人员不足问题,更能够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因此,在“产假式缺编”治理实践中,一定要深入把握“精准”二字的要义,树立精准治理的理念,通过精准执行全面二孩政策、精准识别二孩对象、精准实施解决措施路径等来达到治理效果。

(二)精准治理机制:政策支持+统筹考虑

中央政府要从政策的顶层设计出发,出台相关政策制度,建立合理的教育体制机制。首先需

要消除性别歧视,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使得男女性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职业等领域进行公平的竞争。同时要消除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鼓励女性从事其他行业;加强社会对男性教师的认同,吸引优秀男性从事教育行业。其次,中央政府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保障教师职业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声望,提高教师的各项福利待遇。教师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提高,教师岗位的内在吸引力增强,使教师职业相比于其他职业更加具有竞争力,吸引更多优秀男性从事教师职业。最后,高考制度上可以制定相应的鼓励性政策,师范院校改革招生方案,提高师范各专业男生录取的比例。

省级政府要发挥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自主性,精准核算各个学校编制情况,根据学校的现状补足学校编制数或者增加流动编制,适当地配置存量师资。全面二孩政策的持续推进,“产假式缺编”问题将持续存在,解决该问题迫在眉睫。从当前教职工编制管理的权限划分来看,与编制管理部门、人事管理部门、财政部门等相比,教育行政部门的话语权较弱。^[8]从当前三个部门的职责分布来看,缺乏配合与协作,不利于教育行政部门对当地“产假式缺编”治理的深入推进与管理。因此各省级编制管理部门、人事管理部门、财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合作,全面精准的收集学校缺编信息,科学严谨的分析缺编原因,针对性地出台政策制度,共同应对当前的难题。

县级政府从政策执行角度来说,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树立服务意识,转变传统的管理模式,转变政府职能,重视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产假式缺编”难题,并积极主动响应。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发挥“领头羊”的作用,统一制定各项政策制度,协调各项措施的实施与效果监控,及时对各学校的缺编治理进行指导,与此同时要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在补充学校教师编制数的同时,也要多渠道储备师资,例如建立人才储备库,将有代课意愿的高校退休教师纳入人才库,学校在需要时可以从聘用合适的教师代课。

(三)精准治理主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产假式缺编”治理

1. 充分发挥政府对“产假式缺编”治理的主导

作用

“产假式缺编”治理涉及教育、人社、学校等多个部门,各部门必须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才能做到精准识别有生“二胎”意愿的女教师,精准实施治理措施,精准管理“二胎”女教师。因此,政府作为“产假式缺编”治理的主体,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应当在治理模式、治理过程和政策设计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对制约和影响“产假式缺编”治理的关键问题要及时给予支持,提出解决思路 and 对策。

2. 充分发挥学校在解决“产假式缺编”难题中的重要作用

学校管理者要制定完善的报备制度,定期对女教师的生育意愿进行摸底调查,在充分摸清女教师生育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女教师调整生育计划。

3. 有生育意愿的女教师应站在学校和学生的立场,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来调整生育计划,而不是盲目的随波逐流

可以说,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产假式缺编”治理必须转变治理理念和政府定位,走政府主导下的学校以及公民个人合作互补、各尽其责、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

五、结论与展望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给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正面效应,但伴随而来的“产假式缺编”问题突出。本文从精准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产假式缺编”治理逻辑分析框架,通过对P学院的调查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产假式缺编”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综合性工程,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政治主导作用,政府的主动治理是解决“产假式缺编”的前提条件,地方各级基层政府和其他组织的配合协作是“产假式缺编”治理的基础,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进而言之,精准治理从多个侧面呈现了“产假式缺编”治理的关键要素和执行要素。

本文也存在一些研究局限,本文以P学院为研究对象,只是初步尝试提出理论分析框架并进行调查研究,还有更深入的问题有待研究。在理论分析框架上,本文构建的精准治理的逻辑框架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未来将会用定量分析、对比研究等方法相结合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参考文献:

- [1]李清.“产假式”缺编,缺的不是女教师而是权力意识[J].中国教工,2015(12):31.
- [2]李群.二胎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J].经营管理者,2017(1):101.
-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1.
- [5]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3):11-17.
- [6]李大宇,章昌平,许鹿.精准治理:中国场景下的政府治理范式转换[J].公共管理学报,2017,14(1):6-8.
- [7]叶文振.生育新政:高校女教师的挑战与应对[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1):2-3.
- [8]郝保伟,鱼霞.从现状透视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管理的问题与政策走向[J].教师教育研究,2013(6):79-84.

To Control the “Maternity-Style Shortage” of Female University Teachers under the Two-Child Policy: Perspective of a Precise Management

Liu Jiaji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maternity-style shortage” is an issue that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by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groups and individuals at all levels. It reflects not only the trend of precise government governance, but also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in the problem. Whether it is the actual pressure of the “maternity-like deficiency” brought about by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or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of “maternity-style shortage”, All of them reflect the shortcomings and absence of precise governance concept,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subject of governments, universities and individuals at all levels for a long time.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is established as a strategic top-level design. It is a major move taken by the state to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law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from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ideas, improve governance mechanism, promote the co-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ideas and method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aternity-style shortage”.

Key words: two-child policy; university; maternity-style shortage; precise governance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79-05

古代孝文化传播途径研究

苏喜娥, 刘荣贵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要:千百年来孝文化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古代孝道不仅是修身治家之本,更是治国兴邦之道。孝文化得以发扬传播,与统治者以孝治国分不开。政府将孝文化与国家制度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和教育相结合,家国一体推行孝道。

关键词:古代孝道;孝文化;传播途径

中图分类号:D8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18.04.12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初期仅限于调整父母与子女之间尊祖、敬亲、养亲的家庭伦理。西周时期,被赋予新的含义,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先秦时期,“孝”扩展到宗族、社会、国家,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准则,《孝经》标志着“孝”文化的形成。西汉开始“以孝治天下”,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孝”的朝代。魏晋南北朝“孝道”深化,成为统治国家的权术。唐宋时期,移“孝”于“忠”,“孝道”进一步政治化、法制化。元明清时期,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君主独裁,父权专制,族权膨胀,愚孝泛滥,孝道走向极致。古代孝道不仅是修身治家之本,更是治国兴邦之道,孝文化得以发扬传播,与统治者以孝治国分不开。

一、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维护孝道

在古代,孝是帝王治国之道,统治者以孝治天下,将孝行与家族、国家和天下相联结,作为国策予以推广。

(一)引孝入律

为了使孝伦理得到顺利推行,统治者将“孝”的伦理思想渗透到刑律之中,运用强制性手段,制定了大量惩治不孝、褒奖孝行的法律条文,以此强

化孝道。

据章太炎考证,引孝入律早在夏代就已显现,《孝经·五刑章》中“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即为夏法^[1],商朝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文字记载不孝罪的朝代,西周明确将“元恶大憝”与不孝不友对举。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作为“忠孝仁义”的集大成者,把不孝称之为“大乱之道”,为“八刑”之首。秦始皇对不孝者严刑峻法,规定不孝罪可处死、可断足、可终身流放或黥城旦舂。汉沿袭秦律,魏晋《北齐律》首次确立“重罪十条”,不孝被列入“十恶”范畴。隋朝《开皇律》把“重罪十条”改为“十恶”,除“恶逆”罪之外,“不孝”是侵犯家庭成员犯罪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唐律》中明确了不孝罪的形态:诅詈祖父母或父母、不举祖父母丧或父母丧、别籍异财、状告期亲尊长、子孙违反教令、私和尊长人命等,宋、元、明、清一一沿袭。对犯罪高龄老人,历代法令还予以特权。唐律规定“若尊长殴卑幼”,受害者如为一般人,刑减一等;如本族近亲,则刑减二等。宋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者,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者,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九十以上者,虽有死罪,不加刑。”

在制定实施惩罚“不孝”法令条文的同时,统治阶级也制定了大量鼓励孝行的具体规定。从北魏到清末,都沿用“存留养亲”制度,子孙即便犯十恶不赦之罪,为了给老人养老送终,可缓刑、换刑

收稿日期:2018-05-22

作者简介:苏喜娥(1973-),女,副教授,研究方向:新闻与传媒。

本文信息:苏喜娥,刘荣贵.古代孝文化传播途径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79-83.

或免刑。历朝都有养老尊老制度,周朝规定“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汉代法律规定年满70岁以上的老人,朝廷赐以鸠杖,可走官道,可自由出入官府,做小本生意不纳税。魏晋南北朝沿袭传统,设置国家养老机构、赈济生活用品、减免老人家庭赋税徭役。官府以天子之名对高龄老人生活上以示特别关照外,还会授予荣誉官衔或爵位等荣誉封衔。唐代凡60岁以上的老人,按照年龄男性分别授予县丞、县令、州长史、上佐、刺史等官职,女性则授予县君、郡君、郡夫人等贵妇称号,在精神上以示特殊尊崇。

不孝罪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4000多年,与其他罪行相比,对不孝罪的处罚多采取加重原则。官府审理案件时,多是先区分尊卑上下、长幼亲疏,然后才听是非缘由。法律作为“孝道”最有力的制度保障,有效地保障了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安定,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大大促进了民间社会尊老孝亲之风的盛行。

(二)以孝选官

远古传说大舜至孝而被启用,可视为举孝选官的萌芽。“孝悌”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历代君王都热衷举孝选官,把儒孝伦理引入国家人事制度,以孝悌品行选拔和罢黜官吏。

春秋战国时期“孝”就被列为荐举人才的条件,以“孝悌”选拔官吏始于汉文帝,开举孝选官制度的先河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汉武帝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仕联系起来。西汉晚期,孝、廉合并通称“举孝廉”,成为汉代选拔官吏和任用升迁的清流正途,“以孝选官”蔚然成风。据统计,汉代通过举孝廉而做官的人占到官吏总数的六成以上^[2]。西汉时期察举孝廉考核比较严格,吏治也较清明;东汉中期之后,考核松弛,察举不实,有不少滥竽充数者,竟闹出了察孝廉父别居的大笑话。魏晋继承汉代“举孝廉”制度,朝廷增加了策试环节。

隋唐科举考试兴起,以孝悌廉让科和孝悌力田科步入仕途者比比皆是,与其他科目相比,孝悌科目考试内容和难度都大大降低,“精通一经”或“熟读一经”即可。开元年间,唐玄宗发现孝悌力田科考试时有人擅自提高标准,当即下诏纠正,自此孝廉、孝悌力田被列入常设考试科目。宋承唐制,“孝”达到最高境界,“忠”成为孝文化的核心,

“孝”亦成为实现“忠”的必要手段。明代朱元璋把孝看作“风化之本”“帝王之先务”,举荐、科举皆要考察孝道,洪武六年诏令天下“罢科举”,以“孝廉”“孝悌力田”科目推荐查举,以孝选官再次成为选官第一正途。清代为了弘扬孝道,把汉代的“孝廉”和“贤良方正”合并,设“孝廉方正科”。

因孝可“入”仕,反之也会“出”仕,“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任职期间,官员冒荣居仕、委亲之官皆要受到处罚。

纵观历朝历代人才选拔,尽管标准不尽相同,但孝悌一直被视为重要条件,《二十五史》中因“称孝”而进身、名世的官吏、学者、乡绅不胜枚举。“孝悌”成为普通百姓步入仕途潜在的政治资源,成为士子步入仕途的有效捷径,成为官场擢职升迁的阶梯,社会上亦形成了“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舆论和风尚。

(三)以孝齐家

家庭稳则国家稳,古代齐家治家离不开一个“孝”字,在亲亲尊尊思想的指导下,维护家族内部亲疏、尊卑、长幼、男女之序是家法族规的基本宗旨。作为乡土民间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以孝为先”是历代家法族规的首要内容和家族成员共同遵循的至理。宋代《临安钱氏谱例》规定“凡宗族当次第,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子孝父慈,兄友弟恭,礼亦如一。背者以不孝、不悌论”。元代民间族规范本“江南第一家”《郑氏家规》明确规定“子孙为学,须以孝义为先,……此实守家第一法”。

家法、族规对“不孝”子孙也拥有绝对惩治权,《江西临川孔氏支谱家规条例》规定“诛不孝。……一经父母喊出,族长察出,重责革籍,犯忤逆,处死”。对宗族内老人家法族规特别强调养济,道光广东黄氏族规规定“鳏寡孤独废疾委系穷而无告者临时酌议存恤”。

作为调节家族内部关系强制性规范,家法、族规亦高于国法,只有家法族规解决不了时方送交官府。官员在处理家庭、家族内部纠纷时,多参照长者意见,《宋史·何承天传》载“父母求免,皆免之,父母欲杀,皆许之”,对于擅自越诉者则判诬枉之罪。

古代以孝齐家,不仅养育了立家孝子,还为国家培养了良民忠臣,家法族规以国法为后盾,成为家族伦理纲常坚定的民间守护者,敬祖宗、孝父母、禁止犯尊长,弥补了国法种种疏漏与鞭长莫及之地的法律空白,确保了家族内部秩序的稳定。

二、与道德建设相结合,倡导孝道

“人有百行首重孝,孝字本是百行源”。古代“孝”被视为诸德之本、百善之先、人伦之首,是道德的源头和行善的起点。

(一)以孝引领

“天子孝,安国家,定社稷。”历代统治者深知其中利害,把孝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率先做出表率,以“孝行”“孝言”示范,感化百姓,以维护自身统治。亲自示范是历代帝王通常做法,“三代之英”周文王姬昌每天早、中、晚三次探望问安父亲的故事,可谓“至孝”;汉文帝刘恒以“仁孝闻于天下”入选“二十四孝”;郑庄公摒弃前嫌掘地见母,孝名广为流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自称“孝子”皇帝,颁布市井乡里巡夜更夫呼号“孝顺父母,尊敬长辈。”

为了表明对孝道的推崇,历代皇帝亲自讲授或注释《孝经》,在历代皇帝注释的书籍中,《孝经》居首,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

生前行之以孝,死后名之以孝。谥号原本是为了避讳死者的名号,但是到了汉惠帝,为了体现其“以孝治天下”的国策,谥号为“孝惠皇帝”,自此以后,在谥号前加“孝”字,就成了汉代皇帝的惯例,当然也是历代帝王的偏好。唐代历时289年21位皇帝,谥号前皆有“孝”字;宋朝先后17位皇帝,谥号中都有“孝”字;元朝虽由蒙古人建立,除元世祖忽必烈外,其他皇帝谥号均有“孝”字;明朝17位皇帝12人谥号中有“孝”字;清朝12位皇帝中除溥仪外,11位皇帝以“孝”字为谥。除帝王外,后妃谥号中也往往会出现“孝”字,尤以明清最为频繁,16位生前被正式册封的皇后,14位谥号以“孝”字开头^[3]。皇家陵墓以“孝”著称的有北魏孝武帝的孝陵、明代朱元璋的孝陵和清朝顺治帝的孝陵。“上老老而民兴孝”,帝王如此看重孝道,修身立德,以己身之孝行为万民做出典范,臣民自然会敬重信赖在心,潜移默化中将孝发扬光大。

(二)依孝旌表

尊老敬老是历代统治者施政的重要内容,为提倡孝道历朝历代大兴旌表之举。

自秦朝以后,历代朝廷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旌表类别很多,有尽心侍奉类、勇救父母

类、万里寻亲类、归葬家乡类、庐于墓侧类、为亲复仇类、毁身行孝类,等等;旌表数量众多,据统计《新唐书·孝友传》中,因“事亲居丧孝著至行者”受旌表者153人,因“数世同居”孝悌和睦被旌表者36家,因割骨疗疾者28人,因其他各类孝行被旌表的不胜枚举。被旌表者有官员,但多数为普通百姓,元代明确对有官职及科目出身的人则不予旌表。旌表分中央、地方两级,中央往往以皇帝颁下诏书的形式予以旌表,地方级别的旌表由县、州、郡等各级行政机构进行。旌表方式有赐“光荣匾”、建“上位”牌坊、竖“纪念碑”、立“纪念祠”、竖阙、布告天下、为孝子居住地改换“名”等,“使民有所观感”“荣宠家国”。旌表孝子的匾额现存以清朝最多;旌表孝行的牌坊多建在闹市或被竞标者的宅前,有专坊和总坊;古代孝女立“节孝碑”,孝男立“孝子碑”;纪念祠则有忠孝祠、忠义祠、节孝祠等。古代因“孝”帝王赐名者很多,南朝孝武帝刘骏,赐名孝名远播的安陆东境新县为“孝昌”,庄宗李存勖因孝昌之“昌”字犯其祖父名讳,改为“孝感”。四川孝水县因东汉孝子姜诗得名,浙江绍兴孝女江则因汉朝孝女曹娥得名。除精神上予以旌表外,还予以物质奖励,“蠲其课调”、“除其徭役”。

由于旌表孝悌多是由天子直接赐予的一种崇高政治荣誉,一旦被朝廷旌表,可谓“一人笃孝天下尊”,名利双收,因此民间形成了浓厚孝文化氛围。孝成为古代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民间的孝行榜样在中国孝文化的沿传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持续不断地旌表教化使孝文化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三、与教育相结合,推行孝道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者。”古代孝悌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还是作为一项社会规范,或者说个人修为。在孝的教育上,学校、家庭可以说与社会大力倡导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一)家庭传播

对于个人来说,孝是道德修养的基础和学礼立身的起点。对于家庭来说,孝是家庭幸福和睦的基础和良好家风传承的基石。

作为家庭成员劝诫性规范,历代家训、家范、家诫、家仪、家教与家书,皆言孝悌,清圣祖《庭训格言》指出“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其可谓真孝者矣”。宋人赵鼎《家训笔录》指

出“闺门之内,以孝友为先务”。清代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写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而家道隆昌”。古代家庭认为孝悌是女子必备之德,著名的“闺阁女四书”都有专论,《女诫》专设一章“敬顺”,《女孝经》是后代女子必读之书,《女论语》详述了古代女子的言行举止和持家处世事理的明细,《内训》二十篇,“事父母章”、“事舅姑章”开篇皆言说孝道。明朝女子接受《孝经》教育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明清出现了大量通俗易懂的女性教化文集,《女小儿经》《女儿经》等。

孝作为一条无形的纽带,使得家庭或家族长幼有序,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把家族所有成员有序、有效地联结在一起,使家族繁衍不息,继先人之志,弘先人之业。

(二) 学校传播

孝悌是古代学校教育进行伦理道德教化的首要内容,贯穿学校教育始终。蒙学阶段,专门的教材有《孝经》《二十四孝图》《劝孝歌》《劝孝亲恩篇》《文昌帝君元旦劝孝文》,还有一些记载孝行故事并以孝子传或孝子图命名的书籍,至六朝出现了十余种,但是后来多数散佚了^[4]。其他一些重要的蒙学教材如《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增广贤文》《老学究语》《幼学诗》等,蕴含了大量孝悌内容。孝悌甚至作为是否可以入学的重要条件,《宋辑稿·崇儒二·郡县学》载:“大观新格……诸小学,八岁以上听入,若在家在公有违犯,若不孝不悌,不在入学之限”。入了县学、太学,学生要学习儒家经典,学习圣人的孝德,深刻地体会孝的内涵与其价值所在。西周时期国学教育中“三德”之一曰“孝德”,乡学教育中有“七教”“六行”。自汉代始,各级各类学校都开讲《孝经》,《孝经》是必考科目,学生要学习儒家经典,学习圣人的孝德,深刻地体会孝的内涵与其价值所在。

四、与文化建设相结合,宣扬孝道

孝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为了统治政权的需要,统治者不断开拓孝的内涵,以官方舆论为引导,讲孝论孝,推动民间孝道教化,以加强意识形态的掌控。

(一) 典籍论孝

古代孝文化经典书目众多,先秦时期《孝经》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后代出现了很多仿照《孝经》

体例的书籍,如隋代《酒孝经》,唐代的《女孝经》,宋代的《正顺孝经》《元道孝经》《酒孝经》《武孝经》,魏晋南北朝的《大农孝经》《临戎孝经》等。

“孝道”还散见于一些著作中,涵盖了经、史、子、集。“经”书中儒家论述“孝道”较多,《易经》中《萃》《豫》《蛊》《家人》专述孝道,《论语》中《学而》《为政》《里仁》专论孝理,《孟子》中《离娄上》《离娄下》从正反两面诠释孝道,《诗经》中《蓼莪》《文王之什》《生民之什》吟唱孝道。“史”书中,唐以前论说孝道不成系统,语句非常零散,唐以后,自《晋书》开始,《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全后汉文》等,均专门列出孝友传、孝义传、孝行传、孝感传、孝义列传、孝义等,用来记录孝行故事或论说孝道。这些传记往往在序言里阐明孝道的地位,强调孝德的重要性。先秦始,历代诸子论孝,各有不同见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李密的《陈情表》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孝论名篇。中国古典文献集部作者的孝道观念多是继承儒家孝道观,几乎都是对儒家以“侍亲、忠君爱国、显亲”三大内容为核心的孝道观的解说和弘扬,融合在诗、词、曲、赋之中,如唐代孟郊的《游子吟》、清代黄景仁的《别老母》都是著名的思亲诗作。

(二) 艺术说孝

民间孝已经相沿成俗,出现了大批说孝讲孝的歌词、俗文,如赵普《王氏孝义歌》,邵雍《孝父母三十二章》《孝悌歌十章》,万衣《赠柳泗澜孝子歌》,真德秀《泉州劝孝文》等;百姓中流传着大量以简单故事、歌谣、图画为主的书籍,有《二十四孝》《劝孝歌》《百孝经》《柳枝词思儿曲》等。各种地方戏街头巷尾演绎孝道,百姓喜闻乐见,宋杂剧中《琵琶记》成就最高,元杂剧中盛行南北的“孝子剧”有二十种之多,明代杂剧创作衰微,但“孝子剧”创作却并未消退,直至清代,依旧有十九种^[5]。不论是宋金杂剧、元杂剧、明清传奇还是地方戏,乃至京剧,孝子剧一直未曾断流过,把孝道推向了普遍化、大众化。

孝道故事亦是墓葬艺术装饰的常用题材,以孝道故事刻石在汉墓石刻中已有发现。从后汉至六朝,孝子传图墓刻数量可观,多与葬礼相关,种类多种多样,有石祠、石室、石棺、石棺床、漆棺、漆篋、漆盘以及屏风等,“孝子图”是宋代墓葬中最突出的图像。

(三) 礼仪传孝

古代孝与礼密切相连,孝是礼的文化内涵,礼是孝的外在表现与保证“孝”得以传播的重要媒介。《论语》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孝经》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置其严”。

古代小辈对长辈的礼仪有很多,为人子者,居、坐、行、立、食、祭、听、祝都要遵守相关的礼节规范,“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食飧不为概,祭祀不为尸,听于无声,视于无影,不登高,不临深,不敬誉,不苟笑”(《礼记·曲礼》)。日常有“生居礼”,子女侍奉父母要朝夕问安,父母老了、病了,子女要为父母端屎端尿。侍奉公婆礼中,儿媳晨起要问安伺候洗漱,晚上要行“奉席”之礼,服伺老人就寝后许退方可归己室;公婆行事儿媳要左右护侍,公婆饮食儿媳要尊“佐馅之礼”。穿着也有讲究,“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缁;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礼记·深衣》)。

古有禁酒令,庶民群聚饮酒的机会不多,但是却设有“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载:“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悌。”以此序长幼,别贵贱,推广孝悌、尊贤、敬长、养老的

道德风尚。

古礼中最能体现孝道典型意义的是丧祭之礼,仅《礼记》中就有《丧服小记》《丧大记》《祭法》《祭仪》《祭统》《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专篇。父母离世,须守丧三年,守丧期间,要“倚庐,食粥,寝苫,枕块”,谢绝一切人事、官职,不得婚配生子,“柴毁骨立”者被誉为大孝子。古代祭祀祖先有“五祀”,也叫“五享”,春天行“杓”祭,夏天行“稊”祭,秋天行“尝”祭,冬天行“蒸”祭,腊月行腊祭。夏季伏日也要祭祀,和腊祭合称“伏腊”。敬仰先祖,节气奉新鲜果蔬“荐新”之祭,如农历六月六“尝新麦面”之祭;体恤先祖,农历十月一日寒冬来临送寒衣;缅怀先祖,春节迎先祖神灵回家,清明节扫墓。礼文化与孝文化的融合,使得孝得以广泛践行。

数千年来,孝文化生生不息,给中华民族注入了不竭的生命活力,成为有别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标志。孝文化之所以对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得益于政府不断晓谕孝道、传布孝行、推行孝道。政府一方面从正面加强引导,注重孝道训教、推行尊老国策,诱之以高官、封之以爵位、奖之以实利;另一方从又反面重刑惩治,渗之以刑律,惩之以家法,使“孝”成为齐家之本,兴邦之道。

参考文献:

- [1]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4.
[2]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7.
[3]李伟,王文,郑蒙.以孝树人:孝与古代教育[M].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225.

- [4]黑田彰.孝子传图概论[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2):118.
[5]任孝温.古代“孝子剧”漫谈[J].古典文学知识,2003(4):124.

Research on the Transmission Way of Ancient Filial Piety Culture

Su Xi'e, Liu Ronggui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has surviv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has become a spiritual forc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cient filial piety is not only the basis for self-cultivation, but also the way to govern and rejuvenate the country. The reason for the spread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is related to the ruler's use of filial piety. The government combines filial piety culture with nat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 mor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carry out filial piety together.

Key words: ancient; filial piety culture; transmission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84-07

在新形势下河北会展产业“短板”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安晓波¹, 张贺成²

(1. 石家庄铁道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2. 河北省商务厅 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处, 河北 石家庄 050057)

摘 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为京津冀会展业协同发展带来新机遇。然而,河北省会展业发展落后,难以跟随中国会展业发展的步伐,需要“找差距、补短板”。从会展产业政策、展馆建设、企业发展、展会提升创新等4个会展产业关键要素入手,调查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从会展服务产业发展,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属性,从京津冀会展产业发展格局来研究河北省会展产业发展的对策,从4个方面研究具体方法,促使河北省政府和业界尽快提升河北会展产业发展,缩短与京津的差距。

关键词:会展新形势;河北会展产业;短板因素分析;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71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18.04.13

一、河北会展产业现状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贯彻落实,为中国会展产业发展提供新动力,产生新变化,会展呈现新形势。会展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载体,是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有效途径。雄安新区的设立和规划建设,将为京津冀会展的协调发展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将为京津冀城市会展确立新的发展定位,雄安新区将成为未来会展产业发展新高地。近年来中国会展业数量、规模正以每年20%的平均速度递增,特别是各地确定新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理念等等,为中国会展从速度增长转换到高质量的发展带来新的动能。

在新的形势下,会展更为中国政府和产业经济所关注。然而,中国会展发展呈现出展览业“南高北低”的局面,出现南北差距在日益加大的不平衡现状。20年前同一平台的“北上广”,如今已不在同一层面。2016年京津冀会展总量与全

国数字比较(见表1),显示京津冀会展已经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但是,从三大板块经济区域的经济体量比较,均在8万亿元以上,相互之间的差距比较小;从产业经济与展会的服务匹配上分析,京津冀会展与“长三角”、“珠三角”之间不应出现较大差距,这与当前产业经济的需求很不对称。

在京津冀会展板块中,河北省会展数据更不理想。资料显示,2017年全国2 041个2万m²以上展会中,河北省只有29个,占全国总数量1.4%^[1]。2017年全国举办展览面积100万m²以上的省、直辖市,河北开展170万m²,列全国17位。而城市间比较,河北没有一个城市进入^[1]。对2016年河北主要城市会展指数与全国会展综合指数排名比较:在全国29个二线会展城市中,石家庄市排名最后一个位置,在全国146个三线城市排名中,廊坊、唐山、沧州、邯郸、邢台、秦皇岛、保定、衡水、张家口在会展城市总排名中分别为39、65、82、89、105、114、122、130、135名^[2]。

收稿日期:2018-01-01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联重点项目(201701103)

作者简介:安晓波(1964-),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会展活动。

本文信息:安晓波,张贺成. 在新形势下河北会展产业“短板”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84-90.

2016 年京津冀重要展览城市展览数据表显示更为明显(见表 2)。河北不仅与全国会展重点省市的差距很大,再与京津比较,北京优势极为明显,天津也具有一定的实力,而河北省城市无论是会展企业、场馆建设,还是在会展人才培养与储备方面都与京、津两市差距较大^[3]。河北会展排名与河北在全国的经济总量排名极不相称,与河北省第一、二、三产业的关联行业的发展业绩不相称,河北的会展发展形成了产业的“洼地”;河北会展产业与全省经济产业的发展相比较呈现出“短板”,与全国会展相比较“短板”更加明显。会展业内流传描述河北现状的一段话:“河北有很多馆,没一个好用的,河北有很多展,没一个叫响的,河北有很多规划,没一个落实的。”

表 1 2016 中国重要会展经济区比较

经济区	展览面积 20 万 m ² 以上展会	展览面积 10 万 m ² 以上展会	各行业排名 展览会 TOP3	展馆发展 指数	会展指数
长三角	12	40	118	227.11	141.89
珠三角	11	33	84	106.53	76.49
京津冀	2	12	40	99.1	60.60

表 2 京津冀重要会展城市比较

指标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廊坊	唐山	邯郸	沧州	邢台	秦皇岛
展馆指数	51.95	14.94	7.10	3.89	2.55	2.32	5.80	1.86	2.13
展会指数	34.41	22.89	3.26	6.40	2.57	1.40	0	0.74	0.13
会展指数	29.33	14.83	4.15	4.07	1.87	1.24	1.39	0.81	0.57

注:部分数据来源《中外会展业动态评估研究报告 2016》。

河北城市会展在展馆、展会数量、展览面积 3 个指标数据上都处在落后位置(见图 1)。数字背后反映出河北在会展的关键要素上没有真正作为。中国会展产业发展必须具备最基本的 4 个要素:政策要素、展馆要素、展会要素和展览企业人才要素。政策要素(城市发展及产业经济政策和会展政策),政策是城市经济和产业发展之导向,是展会举办、运营、持续发展之本,是决定性因素。展馆是展会举办之地,是最基本的条件和保障。

企业是展会的运营者和操控者,是展会的活力。展会是主体,是成果。没有政策,展会举办艰难,也不会有更完善的企业,展馆的存在意义就打折,没有展馆就无法举办高质量大规模展会,成果不会显著,没有高水平人才,企业平庸,没有政策,展会和高级人才也不会聚集。所以,四者相互关联,彼此促进,缺一不可。而河北省的会展之所以落后,在这 4 方面都有严重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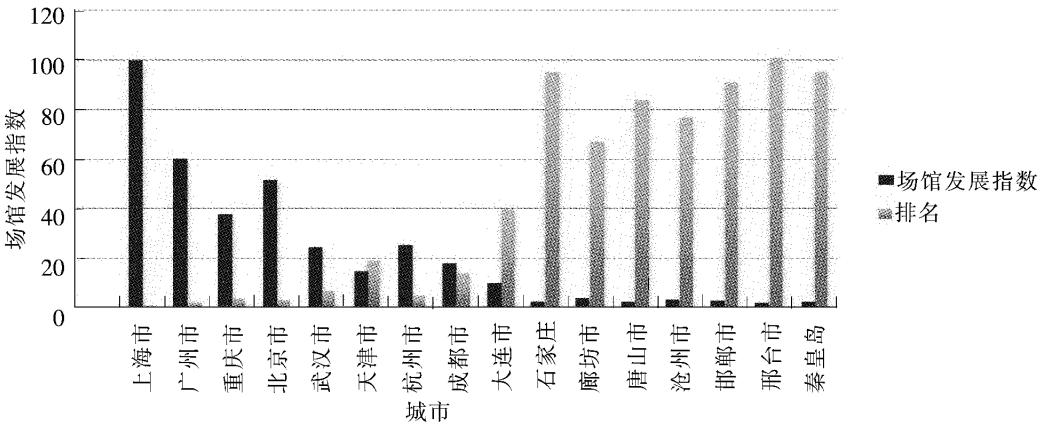


图 1 河北省会展重点城市与国内会展城市展馆数据比较

二、河北会展产业“短板”因素

(一)政策要素现“短板”

政策要素包含政策、法规、资金支持、发展规划等。河北省自2007年至2018年期间共出台6项会展政策:出台了2个规划、2个指导意见和2个办法,各地市相继出台了6项政策。倘若这些政策和措施能够得到贯彻和实施,河北会展状况会得到改观。因为政策笼统,不确切,不易执行,各地管理办法少。所以,产生今天会展的“洼地”现象。产业政策与展会的关联度比较弱。政策支持下行业的发展信息、成果信息及行业各类交流信息是在展会中实现的,产业政策出台应有意识支持展会平台的搭建,让展会服务功能起到行业发展的引领作用。但是,河北省的产业政策中这种意识很弱,2016年之前,河北的新兴行业展会几乎为零,产业类展会占全省整体展会比例也极低,产业+会展带动城市会展的意识还处于启蒙期。

良好的政策指导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增强会展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关乎会展企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河北省缺乏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的相关具体政策和措施。在政策资金支持下,河北省无会展基金支持。石家庄市提出建设会展城市之后,拿出500万元资金^[4],2016年廊坊300万元资金、唐山300万元资金开始支持会展。但是,与其他省市相比还远远不够。郑州专项资金1500万元。然而,政府举办的7个省部级展会都有资金支持,各展会政府出资1000~3000万元不等,28个厅局级展会中,政府出资一般不低于500万元。98个河北省1万m²以上的展会中有24个县域展会,占比达到24.5%,近70%以上为政府主导,资金来源以银行信贷和政府投资作为主体^[5]。这些展会很多资金用于招待、人员、展位补贴、展会消耗等方面,但这些展会的实际效果如何,至今没有一个展会统计出展会直接收益和展会经济效益。

营商环境的打造,根本在政策和体制机制,河北省会展管理机制存在重叠问题,这就很难有同样的政策来执行和统一监督落实。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够,就导致了会展市场的无序性,市场化环境

难以形成,导致管理失衡、恶性竞争、虚假统计、数据推测等市场化混乱现象。而政府的某些方面“管理”对会展企业资金使用产生更大的消耗。据调查,在城管、公安、交通等多部门的收费问题上,在综合费用和服务问题上都缺少特殊政策支持,减免力度没有,难以支撑企业再投入发展。

会展政策是展会的依托,政策的缺少将导致行业会展的流失。会展政策对城市会展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起到引领作用。河北长期缺少行之有效的展会支持政策,更缺少会展顶层设计的落实,也缺少会展发展中务实的策略设计及可行的方法,更缺少河北会展发展的专业智囊机构的辅助。2017年中国城市竞争力前10位的城市都是会展业较发达城市。

(二)展馆要素现“短板”

展馆是展会活动举办地的保障,也是城市经济成熟度的表现,展馆的属性是公共的,也具有公益性。展馆投资大,收益小,展馆建设和经营始终禁锢着政府的手脚。但是,如果没有展馆,展会的规模、品质、影响力、效益以及城市声誉都会受到影响^[6]。

河北省现代化展馆建设严重滞后,尚没有一家10万m²以上的大型现代化展馆,无法举办室内面积5万m²以上大型现代会展活动。全省室内展馆面积位列全国第12位。目前现代化展馆中,河北省根本无力承接国内大型展会(见表3)。因而,两年一届的中国电梯协会在廊坊举办了三届后,移师南方。一年两届的中国垂钓渔具博览会在廊坊举办16届之后,移师天津。展馆配套设施落伍或缺失,现代展馆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务技术没有设置。2017年展馆能够提供展会运用现代技术和科技手段管理展会的,全省几乎没有。

省会石家庄是目前全国唯一没有经贸类专业展馆的省会城市,展馆面积列全国省会城市倒数第3位。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心,与京津两个大都市融合发展构建“京津石三角形”^[7]。石家庄没有现代化展览中心,在现代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上的缺失,也是产业经济不繁荣的表现。

表 3 2016 年河北省会展业综合情况表

序号	设区市	专业场馆 数量	建筑面积/ m ²	室内可供展览 面积/m ²	办展数量/ 场	办展面积/ m ²	室内展览面积 1 万 m ² 以上展览数量/场	会展管理 机构
1	石家庄	2	1.6	1.2	80	48.43	14	有
2	唐山	3	6.45	4.35	41	37.7	26	有
3	廊坊	3	10	6.3	78	105.34	50	有
4	沧州	1	6.6	1.8	34	25.9	9	有
5	邯郸	1	3.8	2	18	17.6	10	有
6	秦皇岛	0	0	0	2	1.8	1	无
7	保定	0	0	0	1	1	1	无
8	衡水	1	1.96	1.06	10	13.6	8	无
9	邢台	1	4.5	4.2	6	15	5	有
10	承德	0	0	0	5	5.1	2	有
11	张家口	1	8.4	5.36	4	2.4	0	无
12	辛集	0	0	0	2	2	2	无
合计		12	39.91	24.27	281	275.87	128	

（三）展会要素现“短板”

展会是产业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的信息平台。近年来在会展平台上，全球最新的商业理念、最新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最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和最全的贸易网络得以充分展现，会展带给世界城市更多的发展商机。

然而，河北省展览数量比较多，展览规模小，没有享誉全国的展会。从展会数据排列上可以显示出河北的状况：省会城市石家庄，展会发展指数 3.26，全国排名第 48 位^[8]。廊坊市列入三线会展城市，展会发展指数 6.40，全国排名第 30 位。唐山市展会发展指数 2.57，全国排名第 54 位，河北其他城市数据就更不理想了。

展会是产业发展获取更多资源的快捷有效途径，是对地域产业和企业的品牌再认证机会。以上数据显示出展会与河北区域经济产业的信息不对称性。河北是经济大省，在第一、二产业中资源相对齐备，产品贸易和产品、技术信息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展会举办的规模和影响力很小。分析梳理 2016 年河北省举办的 281 个展会，生活消费类展会占据较高的数据，能够与产业经济对口的展会少，产业型展会明显不足，反映出河北的展会服务性质对区域产业发展的贡献值很小。河北

展会更多地成为国内外企业来冀推销产品，营销自身品牌的机会。

政府主办的展会存在诸多问题。政府办展的通病、软肋暴露无遗，投资大，强拉企业参展，实际效益低，参展企业收益不成正比。中央、国务院批复保留的 8 个展会，实际效果与其他省市同类型展会相比，差距很大，不可细数。比如正定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从创办至今发展不足，在产业经济促进方面，严重落伍，展会急需改造。省委、省政府批复保留的 28 个展会中，真正能够带动产业发展的展会，现有资料无参展企业收益信息，但对展会调查，比较满意和一般满意度的占五成。这样开办展会与参展商和客户的期望值相差很大，企业收益率也在降低。导致净现值低，展会的发展周期就会缩短，产业展会生命完结，产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展会服务产业的作用根本没有体现出来。河北展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存在恶性竞争现象，部分政府展会的“市场化”，存在“勾肩搭背”、钱权交易现象，政府强势附加条件使得企业难以恪守商业伦理，严重破坏会展营商环境建设。另外，在市场化竞争中，企业展览业务缺乏特色，专业人员业务特点不明显，政府展会或协会展会在招标时，无法判断、满意选择，造成主办单位不断更换会展企业，使得政府主办的展会和协会的展会缺乏展会的延续性，缺乏展会的创新性，使得展会的品质

大打折扣,这也影响到展会的升级换代和品牌的树立,也是河北难以培育知名展会的因素之一。

(四)会展企业要素现“短板”

企业要素包含着人才要素、管理要素、资源要素、资金要素。河北省由于比邻北京和天津,受环境因素影响,在以上各个方面都绝对匮乏,严重影响到河北会展产业的发展。

在企业经营管理上,缺乏睿智型、综合知识型会展高级管理人才,缺乏会展专业技术人才,在谋划服务河北产业发展的展会时缺少智慧,在引进展会中缺乏谋略,会展资本运作缺失方法,严重阻碍河北会展企业快速发展。当政府开始将展会推向市场时,市场出现空位,很多展会的实际承接企业多是北京企业,河北会展企业的市场承接能力很不适应,企业自身实力不及,失去发展商机。2016年在河北举办的几个国际型和国家级展会,均为省外企业承办,连展馆服务都是外地企业。

在企业商业资源上,更多的企业瞄准的是政府资源,希望政府展会能分自己一杯羹,而不是针对产业的发展,创意展会,或者引进展会、嫁接展会,从服务产业的角度来获取展会资源。创办展会需要资金的投入,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展会需要三年的培育期,作为河北的中小会展企业,根本就没有实力来创办新兴创新型展会,政府也没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给予支持。

河北县域经济发展较为活跃,存在展会资源,也存在产升级和展会树品牌的机会,苦于缺乏专业结构知识拓展,无法深挖资源。河北省绝大多数会展企业习惯于传统展览套路,习惯于去执行和接受任务,创造性服务和创意创新性活动能力差。如此企业发展现状,何以能跟上中国会展发展的步伐。

在会展企业专业人才上,河北省会展从管理、谋划、设计到运营、实操、搭建等多方面高端人才匮乏和缺失。河北省从事会展业的相关人员众多,但基本没有专业科班出身,从业者眼界低,视野窄,不仅缺乏系统的会展理论学习,还缺乏办展经验;而具备策划能力或创意能力的高端会展专业人才凤毛麟角,精通展览设计、会展组织策划、了解国际惯例、富于实际操作能力的高端人才更是十分匮乏。

在会展教育人才培养上,河北省起步早,有规模,但受环境影响,持续性较差,至2015年之后,

徘徊不前,并缺少会展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培养的专业院校。截至2017年6月,全国60所院校设立77个会展硕士点,河北省空白。由于河北省会展软硬环境都很差,会展业务量不大,办展机会相对少,工资低。河北省高校培养出的优秀会展后备人才纷纷弃河北,投奔京、上、广、深、杭等会展城市,河北会展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后备高端精英人才储备断绝,严重制约了河北省会展产业向高水平发展。

河北省会展高端人才引进上缺少相关政策、措施、办法和专项资金支持,高端人才使用和储备人才保障措施空白,缺少会展专项科研基金。再看近年快速发展的会展城市杭州,在引进符合本市需求的高层次会展业人才,所产生的住房补贴、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等费用,会展企业可列入成本核算。不仅如此,高层次会展业人才户籍迁入、子女入学也可享受优惠^[9]。因而,杭州有高层次会展业人才保证,G20峰会等一些高端有国际影响力的会展活动,敢于承接。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为京津冀会展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会展格局面临重组,会展国际化层次将提升。河北会展已经被“绑架”在国际会展运营的轨道上,面对北京展会外溢,国家雄安新区建设这一历史良机,河北会展应破除传统制约,以创新意识迎接挑战,在分析造成河北会展短板因素的基础上,研究对策措施,助推河北省会展产业经济逐步走在国内前列。

三、补齐“短板”的对策

(一)明晰会展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

产业发展思想上,需明晰会展产业作为高端服务业的定位,以“产业+会展带动城市会展,带动城市全面发展”为产业发展观念,从京津冀产业整体发展来构建河北会展策略,从京津冀会展整体变革,布局河北会展产业发展“会展集聚区和特色会展城市带”格局,如:在推动京津冀制造业从梯度发展向协作发展的转变中^[10],在“一核、四区、多集群”的产业差异化发展新格局中,“抓机遇,促展会”。从着眼未来发展,努力打造以雄安新区为核心,连线石家庄的会展产业的京津冀会展集聚区,积极完善京北河北特色城市会展产业带。

(二)建立统一的综合管理领导机构

产业政策和管理机制上,需要更为实际的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综合管理领导机构,只有统一机构,才有能力管理全省会展行业发展,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制定河北省会展业发展促进条例,制定全省会展业发展规划,对接京津冀产业发展。应切实加强对会展业的宏观引导,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浓厚的发展氛围,逐步将会展业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迹。会展政策与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经济政策的信息对接,是区域会展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政府应当积极给予鼓励政策或具体措施,支持有能力的专业展览公司开展产业性贸易展会。

(三)建立研究机构,发挥智库作用

注重产业+会展带动城市发展研究,聚集省内外人才,建立省级会展产业研究机构,发挥智库作用,研究制定河北会展业发展规划,研究提升河北会展水平的措施办法,梳理河北省产业结构,从产业顶层策划创意新展会,改造和提升现有展会,研究政府的政策需要,针对产业的发展和整体区域经济的发展,帮助企业创办新兴创新型展会,并可延伸后期产业合作。

从现阶段河北会展发展现状分析,河北需要有一个国际高端展会作支撑,带动整体会展产业链的发展,聚集河北会展的人气和精力,才能有意识地通过实际操作,推动会展产业大步伐迈进,在国际化规则下,飞跃快速运转,也能有效地制定和落实管理机制,促进市场化健康发展。但是,创意大型、高端展会不是企业能够做到的,需要顶层决策。因而,会展产业发展研究机构作为政府助手,应积极出谋划策,拿出务实的方略、完整的计划,辅助政府抉择,通过睿智策划,拥有国际级展会,使河北城市跨入国际型交流城市行列。

(四)积极推进展馆建设

积极推进展馆建设,河北省必须特别重视会

展场馆建设及高科技智能化配套设施建设,为展会提供优质服务 and 准确的信息数据。要以世界目光、国际标准来谋划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各类行业对大型展馆的需求,在服从于非首都功能,服务于高端的制造业和高端的服务业为引领的雄安新区周边,利用河北的土地创建会展聚集区最为合理,从会展区位上可以有效支撑京津冀三方对大型展览的需求。

积极谋划建设展览产业配套服务体系,完善和提升展览辅助设施加工的档次,在展馆有效距离内建设展品生产加工基地,以环评达标为准则,积极建设多个河北会展产业特色小镇,为京津冀会展提供相应服务配套设施产品和相关产业服务。

(五)积极提升企业能力

应将单纯展会补贴,转向优秀企业奖励资金。把资金由“养会”转为“养企业”、“养人”,政府应积极支持产业人才培养,资助社团组织开设职业培训,会展训练营,强化会展企业队伍素质,提升员工专业素养,开展职业技能大赛,树立优秀员工形象,培育未来行业顶级骨干。

应规范展会,以标准约束企业,逼迫企业达标,达标者可参加相关评审。通过制度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措施,在展会的准入、备案、报馆、登录、开馆、总结等方面实施严格的审核监管,以规范、标准、条律、监控来提升企业,从展会的有型塑造来逼迫企业增强软实力,逼迫企业员工结合业界专业培训,熟练内功,有效提升会展企业的专业能力。

总之,河北省会展产业发展,需要认真找差距,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补短板,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和督查机制,才能有效提升河北会展产业实力,才能实现发展目标,完成规划产业布局,实现京津冀会展产业聚集区,构建完整的河北会展产业结构链。

参考文献:

- [1]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信息中心,贸易投资促进部贸促会.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2017[EB/OL].(2018-01-20).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www.

ccpit.org.

- [2]张敏.中外会展业动态评估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3] 陆相林. 京津冀区域城市会展协同发展对策研究[J]. 石家庄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7, 16(4): 22-24.
- [4]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石家庄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Z].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石政办函〔2017〕46号.
- [5] 赵冰, 陆静. 河北县域会展经济发展对策研究[J].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17, 19(4): 97-100.
- [6] 郑建瑜, 傅婕芳. 会展场馆管理[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7.
- [7] 孟祥林.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石家庄城市组团“指状网络”发展模式的区域经济分析[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2): 1-9.
- [8] 潘建军, 任国岩. 2016年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 2.0 [R]. 北京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统计工作委员会, 2017.
- [9] 杭州市人大. 关于公开征求《杭州市会展业促进条例(草案)》意见的公告[EB/OL]. (2017-6-30). 杭州市人大. [www. hzrd. gov. cn/zxxz/wsgg/201706/t20170630_698574. html](http://www.hzrd.gov.cn/zxxz/wsgg/201706/t20170630_698574.html).
- [10] 杨胜利, 董博磊. 京津冀制造业分布与集聚趋势[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11(3): 7-13.

Factor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 Study on the Short Board of Hebei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 Xiaobo¹, Zhang Hecheng²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2. Department of Service and Trade, Hebei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hijiazhuang 050057, China)

Abstract: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Xiong'an New Area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ve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xhibition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is too laggard to follow the pace of China's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thus it needs to "find the gap and the short board" for Hebei province. Starting from the key factors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policy, pavilion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exhibition promotion innovati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shorten the gap with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rough comply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promoting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udying development measures from the patter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figuring out special methods from four aspects.

Key words: the new situation of exhibition; hebei exhibition industry; short board factor analysis; countermeasure study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91-07

教育期望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3—2014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

吴洁, 吴智雄, 郑逸芳, 许佳贤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基于2013—2014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采用OLS模型进行分析,从个人、家庭、学校三个层面考察了我国初中毕业生对自身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的总体水平较高,但东中西部地区学生的教育期望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期望不仅受个体特征的影响,同时也受家庭层面的影响;此外,教育期望还受学校层面影响。因此,基于研究结果,分别从家庭、学校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教育期望;地区差异;影响因素;学校;家庭;个体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14

一、引言

教育不仅是促进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改善公民素质,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必要手段,因此,一直以来教育问题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把教育放在首位,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国。随着时代快速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进而人们的教育期望也开始发生变化,追求高水平教育几乎成了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首选。

我国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和地区的优势,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较好,而中西部地区受到经济、地区、人才等因素阻碍,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远低于东部地区。当前,我国中西部的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仍然在进行中,虽然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策的落实,我国中西部地区的

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教育质量显著提高,教育规模持续扩大,但与东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相比,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仍然相对滞后^[1]。胡咏梅、卢珂认为,一个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会影响到该地区学生的教育期望^[2]。尽管期望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是否成功,但作为一种自我激励的心理暗示,自我期望可以促使青年积极追求学业上的成就^[3]。国外很早就已经开始关注教育期望并对其进行研究,而国内关于教育期望方面的研究还相对缺乏,从国内文献看,教育期望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性别差异、城乡差异等方面,关于地区差异、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开展较少。

因此,本文分析2013—2014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以初中毕业生为对象,从个人、家庭和学校三个层面考察了我国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与现有研究不同,本研究仅针对九年级毕业班学生,在其面临升学的情況下,分析各地区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存在的差异,并有效

收稿日期:2018-08-10

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2017R0011)

作者简介:吴洁(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本文信息:吴洁,吴智雄,郑逸芳,等.教育期望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91-97.

消除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存在的地区差异,有助于引导青少年在其早期成长阶段建立良好的教育目标和教育规划并促进其未来发展。

二、文献综述

《现代汉语词典》将“期望”一词定义为:对未来的事物所持有的希望和期待^[4]。Buck认为期望是个体根据过去经验和当前刺激对未来事的预料或构想,也是导致个体希望某种事件出现的一种态度^[5]。本文所指的教育期望是指个体对自身接受最高的教育水平和教育层次的希望和期许。目前国内外对教育期望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

(一)个体特征对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

诸多美国学者早期的研究发现,与女性相比,男性的教育期望更高。但近年来,Feliciano和Mello等人研究却发现,女性在考试成绩和教育获得等诸多方面都已超越男性,与男性相比,女性通常拥有更高的教育期望^[6-7]。有学者研究发现,教育期望除了存在性别差异外,还存在民族差异,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存在明显差异,且不同民族学生的教育选择也不一致^[8]。王香丽研究发现,家庭背景的城乡差异对初中毕业生的教育期望也有显著影响,原因是城乡学生家庭经济、文化资本存在显著差异^[9]。另外,Smith、Dai等人研究均发现青少年的教育期望会受到其学业成就的影响从而得到提升^[10-11]。

(二)家庭背景对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育期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被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12-13]。有学者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父母更重视子女的学业投资,并且他们有更多的文化资本来参与学校所需的教育实践,这些都有助于提升子女对自身的教育期望^[14]。一些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普遍较高^[15-16],而子女的自身实际表现和自我教育期望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17],由此推断出父母的教育期望是影响自我教育期望值的重要因素,并且这一推断后期被诸多学者研究证实。此外,吕国光研究发现,家庭子女数量会影响父母的教育期望,子女数量少的家庭,其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要高于子女数量多的家庭^[18]。

(三)学校层面对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

个体教育期望受自身智力水平、学业成就、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就读学校的性质等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9-20]。Boyle认为,学校作为一个教学组织,若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来帮助学生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平,这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教育期望;同时,学校作为一个社会化的专业机构,其所形成的校园氛围及同伴文化会对学生的教育期望和人生目标产生重大的影响^[21]。在家庭和学校中,父母、同伴及老师扮演着“重要他人”的角色。Spenner & Featherman的研究证实,作为重要他人之一的老师对青少年教育期望有非常显著的影响^[22]。此外,有学者研究发现,教育结果会受到学校资源条件的影响,其中包括教师的质量和数量^[23]。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2014学年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简称为CEP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该项目以2013—2014学年为基线,以初中一年级(7年级)和初中三年级(9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了28个县级单位(县、区、市)作为调查点,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112所学校、438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基线调查共调查了约2万名学生。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计划在初中阶段逐年进行追踪调查,在学生初中毕业后的第1年、第3年、第4年、第7年、第8年、第17年、第27年进行追踪调查,整个调查周期长达30年,并计划第10年新起一个从7年级开始的同期群。本文重点关注即将毕业的九年级学生的教育期望,因此剔除了七年级的样本。在删除变量的缺失值后,得到有效样本量6273个,其中东部地区为3305个,中部地区为1337个,西部地区为1631个。见表1。

表 1 地区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所属地区	样本量	百分比/%
东部地区	3 305	52.69
中部地区	1 337	21.31
西部地区	1 631	26
总计	6 273	100

资料来源：根据 2013—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本研究从个人、家庭、学校三个层面分析了各地区的初中毕业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将因变量个人教育期望转换成教育年限：“初中毕业 = 9”、“中专/技校/职高 = 11”、“普高 = 12”、“大学专科 = 15”、“大学本科 = 16”、“研究生 = 19”、“博士 = 23”，教育年限可看作连续变量，因此文章将采用 OLS 模型进行分析。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因变量为个人教育期望，我们将其分为“初中毕业”、“中专/技校/职高”、“普高”、“大学

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7 个选项。见表 2。

表 2 因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教育期望	频数	百分比/%
初中毕业	87	1.38
中专/技校/职高	458	7.27
普高	545	8.65
大学专科	993	15.77
大学本科	2 399	38.1
研究生	1 059	16.82
博士	756	12.01

资料来源：根据 2013—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自变量方面，个人层面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籍、学业成绩。家庭层面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独生子女、留守子女、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期望。学校层面包括班主任建议、学校性质、办学质量、学习区位。见表 3。

表 3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教育期望	初中毕业 = 9；中专/技校/职高 = 11；普高 = 12；大学专科 = 15；大学本科 = 16；研究生 = 19；博士 = 23	16.383	3.361
	性别	女 = 0；男 = 1	0.488	0.500
个人层面	年龄	2013 - 出生年 = 年龄	14.579	0.756
	民族	少数民族 = 0；汉族 = 1	0.907	0.290
	户籍	农业户口 = 0；城镇户口 = 1	0.432	0.495
	学业成绩	不好 = 1；一般 = 2；优秀 = 3	2.103	0.840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小学 = 1；中学 = 2；大学 = 3	1.852	0.617
家庭层面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小学 = 1；中学 = 2；大学 = 3	1.982	0.562
	独生子女	“是否是独生子女？”否 = 0；是 = 1	0.412	0.492
	留守子女	“是否是留守儿童？”否 = 0；是 = 1	0.136	0.342
	家庭经济状况	困难 = 1；一般 = 2；富裕 = 3	1.856	0.500
	父母教育期望	初中毕业 = 9；中专/技校/职高 = 11；普高 = 12；大学专科 = 15；大学本科 = 16；研究生 = 19；博士 = 23	15.729	3.061
学校层面	班主任建议	没有建议 = 1；初中毕业 = 2；中专技校高职 = 3；普高 = 4	3.598	0.904
	学校性质	非公办 = 0；公办 = 1	0.917	0.276
	办学质量	差 = 0；好 = 1	0.816	0.388
	学校区位	农村 = 0；城区 = 1	0.492	0.500

资料来源：根据 2013—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四、教育期望的地区差异

(一)初中毕业生的教育期望

从教育期望的地区差异来看(见表 4)，初中毕业生的教育期望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教

育期望在高中以下的数据来看，东中西部学生分别占 9.29%、5.25%和 2.77%，三者差异并不明显。从教育期望在大学(专科和本科)的数据来看，东部学生占 29.4%，而中、西部地区学生分别为 11.28%和 13.18%，东部学生大约是中西部学生的 3 倍，其差异显著。从教育期望在大学及以

上的数据来看,43.4%的东部学生期望接受大学及以上的高等教育,而只有 16.06%的中部学生和 23.24%的西部学生希望接受大学及以上的高等教育,说明学生教育期望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异尤为显著。

表 4 各地区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分布 %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初中毕业	0.67	0.62	0.10
中专/技校/职高	4.43	1.71	1.12
普高	4.19	2.92	1.55
大学专科	7.75	4.03	3.95
大学本科	21.65	7.25	9.23
研究生	8.66	2.60	5.56
博士	5.34	2.18	4.50
总计	52.69	21.31	26.00

资料来源:根据 2013—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二)初中毕业生的父母教育期望

从父母的教育期望来看(见表 5),有较大比例的父母对孩子教育期望偏高,东中西部地区父母教育期望在高中以下的比例分别仅占 12.43%、5.68%和 4.17%,而东中西部地区教育期望在大学(专科和本科)的比例则达到 30.25%、12.36%和 14.97%,东部地区的父母教育期望在大学阶段的比例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从数据来看,40.24%的父母期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学及以上的教育,而只有 15.64%中部地区父母和 21.84%的西部地区父母期望孩子接受大学及以上的教育,说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父母教育期望差异显著。

表 5 各地区家长教育期望分布 %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初中毕业	0.45	0.43	0.08
中专/技校/职高	4.73	2.33	1.36
普高	7.25	2.92	2.73
大学专科	7.17	4.50	3.92
大学本科	23.08	7.86	11.05
研究生	6.74	2.07	4.24
博士	3.25	1.21	2.63
总计	52.69	21.31	26.00

资料来源:根据 2013—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使用 OLS 模型对初中毕业班学生教育选择期望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以东、中、西部地区建立模型 1、2、3,分别从个人、家庭、学校三个层面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的差异。

回归结果显示,个人、家庭、学校三个层面分别对不同地区的初中毕业班学生教育期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且不同因素的影响使各地区学生的教育期望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从个人层面看,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对东部地区学生的教育期望有显著负向的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没有影响,说明教育期望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女生的教育期望比男生的教育期望高,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并且人民思想观念比较超前,他们早已摒弃“女性读书无用论”的思想,转变为“女性撑起半边天”的思想,因而该地区的女生相较于男生而言,期望继续接受教育,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年龄对东中部地区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西部地区无影响,并且年龄对中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的影响比东部地区的影响大,说明教育期望存在地区差异。从回归结果看,民族对西部地区学生的教育期望有负向显著的影响,而对东中部地区没影响,说明民族因素会导致教育期望存在地区差异,且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期望比汉族学生教育期望高。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政策的落实,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此环境下,少数民族学生对现代教育的认同感提升并且主体发展的愿望也变强烈,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期望提高。户籍对东部地区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而对中部地区有负向显著的影响,对西部地区无影响,并且户籍对中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比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说明教育期望存在地区差异。

从家庭层面看,独生子女与中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对东西部并无影响,说明教育期望存在地区差异,中部地区的独生子女学生教育期望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学生。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中部地区的家庭独生子女观念比东西部强,独生子女的家庭重点培养一个孩子,父母集中时间精力培养孩子,其对于孩子的教育大力投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的教育选择以及受

教育意愿。子女的留守情况与中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有负向显著的影响,对东西部地区无影响,说明教育期望存在地区差异,中部地区非留守儿童的学生教育期望比留守儿童的教育期望高。解释该现象的理由可能是,中部地区相对东西部地区留守子女的家庭比较多,而非留守儿童的学生与父母一起生活,父母会重视孩子的学习状况并且一定程度上施与孩子压力,从而对于提升孩子的教育期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母亲受教育程度与东西部学生教育期望均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无影响,并且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西部地区学生的教育期望比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说明教育期望存在地区差异。除此之外,回归结果显示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各地区都没有影响,说明与母亲相比父亲往往在学生学业上帮助更大,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更能影响学生的教育期望,

可以解释为母亲更加关心学生学习和生活,更加注重孩子的教育。

从学校层面看,班主任建议对东部学生教育期望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说明班主任建议会促进学生教育期望的提升,但该变量对中西部地区却没有影响,对此的解释是,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快且好,其学校、师资等方面更具优势,班主任在了解每个学生的基础上,会对每个学生未来的发展潜力有所推测并寄予期望,而学生则会根据老师期望的知觉按老师所期望的方向来塑造自己行为。

总的来看,模型 1、2、3 表明,学业成绩、父母教育期望、学校性质以及学校区位对各地区的学生教育期望均有显著影响,说明学业成绩、父母教育期望、学校性质以及学校区位并不会造成教育期望的地区差异。见表 6。

表 6 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变量类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个人层面	性别	- 0. 139 *	- 0. 118	- 0. 126
	年龄	- 0. 100 *	- 0. 162 *	- 0. 002
	民族	- 0. 103	0. 132	- 0. 381 *
	户籍	0. 262 ***	- 0. 411 **	- 0. 241
	学业成绩	0. 609 ***	0. 911 ***	0. 670 ***
家庭层面	独生子女	- 0. 037	0. 424 **	- 0. 190
	留守子女	- 0. 047	- 0. 290 *	- 0. 047
	家庭经济	0. 018	- 0. 187	- 0. 018
	母亲受教育程度	0. 199 **	0. 059	0. 259 *
	父亲受教育程度	0. 016	0. 046	0. 099
	父母教育期望	0. 659 ***	0. 648 ***	0. 626 ***
学校层面	班主任建议	0. 089 *	- 0. 015	0. 053
	学校性质	0. 308 *	- 0. 778 ***	0. 633 **
	学校质量	0. 050	0. 090	- 0. 013
	学校区位	0. 217 **	0. 441 **	0. 331 *
	常数项	5. 079 ***	6. 644 ***	4. 833 ***
Pseudo R2	N	3 305	1 337	1 631

注：*、** 和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水平。资料来源：根据 2013—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 2013—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以初中毕业生为对象,从个人、家庭、学校三个层面考察了我国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存在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的总体水平较高,但东中西部地区学生的

教育期望存在显著地区差异。结果显示,教育期望受个体特征的影响。性别与东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有负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女生比男生教育期望高。民族对西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有负向显著的影响,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教育期望高。年龄与东中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均有负相关关系,东中部地区年龄越小的学生教育期

望越高。户籍对东部地区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而对中部地区有正负向显著的影响,并且户籍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比东部地区大。另外,教育期望也受家庭层面的影响。教育期望受是否为独生子女与中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有正相关关系,中部地区的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教育期望高。而是否为留守子女与中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有负相关关系,中部地区非留守子女比留守子女教育期望高。母亲受教育程度对东西部学生教育期望有正向促进作用,东西部地区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学生教育期望越高。除此之外,教育期望还受学校层面影响。班主任建议对东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有正向促进作用。

为了提升学生的教育期望和教育获得,以此来消除教育期望的地区差异,我们可以将着力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义务教育过程中,学校应改变管理理念,让优质教育真正进入课堂,同时,家庭应改变教育理念,让孩子得到全面发展。学校和家庭合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受教育观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能够用心学习,真正提高学习效率,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学生的教育期望,以此来消

除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所造成教育期望的地区差异。

第二,在家庭方面,重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并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母亲应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引导孩子学习,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此外,母亲应积极与孩子开展一些学习活动,通过共同学习提升孩子的教育期望,对于消除教育期望的地区差异有显著的作用。

第三,国家、社会对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应给予更多的关注,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的培训和教育,帮助监护人提升教育理念并改进教育方法,使其能够有效地监督和管理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例如,根据孩子学习情况为其制定学习计划,严格按照计划督促孩子完成学习目标,尽可能避免因家庭教育缺失引起的学生教育期望低的结果。

第四,学校应加强对班主任的管理培训,提升班主任的职业素养,使其以身作则,让其真正成为学生的榜样。同时,增强班主任与学生互动的意识,班主任的鼓励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教育期望,以此减少地区间学生教育期望存在的差异。

参考文献:

- [1]魏玲.浅谈东中西部高等教育现状及互补协调发展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9,8(8):261-262.
- [2]胡咏梅,卢珂.教育资源投入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力评价——基于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的研究[J].教育学报,2010,6(6):67-76.
- [3]Domina T, Conley A M, Farkas G. The link between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ffort in the college-for-all era[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1, 84(2): 93-112.
-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
- [5]Buck D. Parental expectations versus child performance: A picture graph method[J]. Elementary School Guidance & Counseling, 1991, 26(2):150-152.
- [6]Feliciano C. Beyond the family: The influence of premigration group status on th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f immigrants' children[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6, 79:281-303.
- [7]Mello Z R, Swanson D P. Gender differences in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personal,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perceptions of neighborhood quality[J]. Journal of Black Psychology, 2007, 33(2):150-168.
- [8]方建华.新疆多民族地区3~6岁幼儿家庭教育期望状况及因素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4(8):26-33+43.
- [9]王香丽.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研究——高中阶段教育的视角[J].高教探索,2011(1):55-59.
- [10]Smith C L, Sapp M, Farrell W C, et al. Psychoeducational correlates of achievement for high school seniors at a private school: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ocus of control, self-esteem,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academic self-esteem[J]. High School Journal, 1998, 81(3):161-166.
- [11]Dai Y. Educational plans after high school: A national survey of high school seniors[J]. Journal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1996, 30: 22-30.
- [12]Marini M M, Greenberger E. Sex differences in occupational aspirations and expectations[J]. Work & Occupations, 1978, 5(2):147-178.
- [13]Duncan G J, Brooks-Gunn J. Consequences of growing up poor[M].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9.

- [14] Entwisle D R, Alexander K L, Olson L S. Children, schools, and inequality[M]. Westview Press, 1997.
- [15] 李庆丰. 中国农村家庭义务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6): 66-73.
- [16] Feliciano C. Beyond the family: The influence of premigration group status on th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f immigrants' children[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6, 79(79):281-303.
- [17] Trusty J. African American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Longitudinal causal models for women and men[J].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2014, 80(3):332-345.
- [18] 吕国光, 刘伟民, 张燕. 父辈社会分层对子代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以藏族小学生及家长为例[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 33(5):73-78.
- [19] 王甫勤, 时怡雯.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社会, 2014, 34(1):175-195.
- [20] 吴愈晓, 黄超. 基础教育中的学校阶层分割与学生教育期望[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4): 111-134 + 207-208.
- [21] Boyle R P. The effect of the high school on students' aspirations[J]. AJ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6, 71(6):628.
- [22] Spenner K I, Featherman D L. Achievement Ambitions. Discussion Papers 449[J]. Academic Achievement, 1977:105.
- [23] Knoeppel R C, Verstegen D A, Rinehart J 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s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A canon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Education Finance, 2007, 33(100):183-202.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and Analysis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Follow-up Survey Data of China Education for the 2013—2014 Academic Year

Wu Jie, Wu Zhixiong, Zheng Yifang, Xu Jiaxian

(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China Education Tracking Survey (CEPS) data for the 2013-2014 academic year, by using the OLS model to analysis, and examin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s' expectations for self-education from three levels of individual, family, and schoo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s' expectations for education is high, but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of the students in the East, Central and West regions. Th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is influenced not only by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by family level. In addition,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re also influenced by school level. Therefore,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article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rom family and school.

Key word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influencing factors; school; family; individual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98-05

媒介融合时代大学生舆论引导研究

孙 远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 要:媒介融合时代的舆论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交往方式。各种媒介传播的信息内容很难辨别真假,表达的观点也缺乏理性,容易使人迷失方向。由此,当代大学生已经沦为“网络孤独者”。匿名评论助长了一些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大数据时代下大学生失去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也对学生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因此对当代大学生进行舆论引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高校树立正面的网络舆论“意见领袖”,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网民,创造更加清朗的网络舆论环境,建立健全媒介融合时代高校舆论引导的预警机制。

关键词:媒介融合;舆论;意见领袖;网络孤独者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18.04.15

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传媒生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媒介融合成为了当代传媒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则是传媒领域正在发生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新媒体如同潮水一般涌入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媒介融合正在悄然地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甚至对整个社会舆论的导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大学生想要获取资讯信息,通常是登陆各大门户网站、校园论坛或在微博进行搜索。媒介融合时代的传播特征是传播内容的碎片化、海量性和时效性的增强,同时也存在虚拟化的传播环境。每当某一事件发生后,大学生会第一时间在网络上进行查阅、发表意见、讨论、甚至引起争论。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对大学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舆论引导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思考和研究。

一、正确引导大学生舆论的重要性

《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于舆论的定义是:“舆论是社会中相对数量的人对于一个特定话题表达的

个人观点、态度和信条的集合体”^[1]。陈力丹教授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2]在校园中,舆论的传播和引导对学生的影响近些年来变得格外频繁,媒介融合时代,舆论在校园中的自发性、多元化的程度也变得更加强烈。总的来讲舆论不是许多人意见的简单集合和叠加,而是经过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传播、相互协调的产物。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学生是一些舆论面前缺乏理性精神,容易被错误的舆论信息所引导。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被一些不法分子加以利用,后果则不堪设想。如近些年来校园信贷的兴起,有些学生本身没有偿还能力,在一些零利息、零风险、多渠道偿还的宣传标语中失去了理智,最后导致被威胁、勒索、敲诈等。类似的案件在当下已经屡见不鲜了。当前高校的舆论环境发展已经改变了旧有的舆论环境,具体表现在:从形式上打破了传统媒

收稿日期:2018-03-23

作者简介:孙远(1993-),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信息:孙远.媒介融合时代大学生舆论引导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98-102.

体的传播垄断,信息的传播不再由某个官方媒体或者大众媒体组织来进行,任意一个网民都可以传播信息,即校园中的每一个人都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新闻记者或编辑,这意味着“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3]的时代已经到来。信息的共享也缩短了与精英群体的距离,也使得大学生增强了主体意识,思想更加开放。这有利于提升当下大学生对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感,形成良好品质。然而大学生的舆论环境安全问题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大量的碎片化信息每天源源不断的出现在校园当中,引人注意的信息舆论多为负面的、非理性的、一些刻意想要激发矛盾的,这是现如今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再加上大学生更习惯于接受第三方和一些自媒体加工后的新闻,对官方媒体发布的资讯并不在意,这也影响到了大学生舆论的走向,使得校园的舆论环境变得乌烟瘴气。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中对舆论定义为“多数人一致性的意见”。她指出:所谓公众舆论,就是“对有争议的问题,在没有孤立危险的前提下可以公开表明意见”或者“为使自己不陷于孤立而必须公开表明意见”。所以在当下媒介融合时代构建健康和谐的校园舆论环境显得尤为重要,使学生能够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则需要正确的舆论引导才能切实解决当前高校舆论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构建和谐的校园舆论环境。

二、传播媒介的进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存在问题

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在高校中传统媒介的舆论传播例如校园广播其影响力变得越来越低。主要原因是传统媒介传播内容的时效性不强,当新闻事件发生时,学生往往通过手机、网站等一些新媒体途径了解具体情况,同时就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是,在传统媒体中,具有专业新闻素养的记者和编辑是信息资讯选取的把关人,因而传播的信息真实可靠,对信息的观点评论也具有理性的。在新媒体传播中,舆论则需要依靠“意见领袖”来进行引导,所谓的“意见领袖”即“在学习、就业、时政、生活、情感、娱乐等方面有独特的见解或者掌握一定信息量,善于以网络作为表达方式且愿意在网上与他人分享,并影响大学生群体的发展方向的人。”^[4]但是在媒介融合时代,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不同的个体有不同

的教育背景,人的综合素质存在高低之分,所以在新时期舆论环境中暴露出来的消极问题明显增多。具体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

(一)舆论环境肆意发展导致学生难辨信息真伪

由于刚刚从竞争激烈的高考中走进了大学校园里,如今的大学生可能和社会现实有所脱离,还没有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当他们卸下高考的重担走进自由的大学校园中,由于缺乏理性思维,面对鱼龙混杂的舆论信息,学生容易变得极度感性、愤世嫉俗,一头雾水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当发生了一些令学生感兴趣的新闻事件时,学生往往不是首先验证事件本身是否属实,而是直接进入讨论环节,伴随着讨论,新闻事件以爆炸的方式迅速传播。但是内容的真假却无处考证,可能只是学生之间的道听途说,也可能是某些人的随意猜测。虽然传播的途径多样、传播速度飞快,但是并没有专业人士或者官方媒体来证实新闻事件内容本身的真假。久而久之导致学生对任何事件都会盲目轻信,校园舆论环境鱼龙混杂,从而导致学生是非辨认能力下降。

(二)网络监管力度的不完善助长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当前我国网络管理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网络发展大国。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为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5]。如此庞大的网民数量对舆论监管带来了不小的考验。近些年来我国逐渐开始实行网络实名制,但还是无法抑制一些企图分裂祖国、诋毁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不法分子。这些人大多数来自海外,打着西方自由言论的幌子,传播一些随意捏造、扭曲事实真相的虚假信息。这些信息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肆无忌惮的传播,其原因就是网络信息的匿名性。除了这些问题,还有一些被大众戏称为键盘侠的一类人,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舆论的导向,进而使当代大学生无法分清社会主流价值观,无法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同时也存在大学生选择相信这些虚假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传播的行为,无意中对各行业的人都造成恶劣影响,使得整个社

会世风日下。

(三)媒介融合时代下大学生已经沦为“网络孤独者”

目前,中国的网络环境中已经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它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互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对当今大学生影响最深的是网络媒体,可这种无政府主义使得网络媒体将自己排除在社会媒体之外,只负责煽风点火而不承担责任。网络实名制也是近些年才开始正式实行推广起来的,但实际效果还是不尽人意。例如QQ、论坛、贴吧等新媒体都有专门的匿名评论、匿名回复等选项。虽然从名义上是保护了用户的隐私,但实际上却为网民不负责任提供了借口,久而久之就会诞生网络暴民,对社会事实、新闻事件、政治事件随意抨击、大放厥词。同时,大量水军、僵尸粉丝的出现使得真正的大学生网民被淹没在其中,对高校舆论环境的发展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当学生网民没有环境去表达思想,发表的意见也不会被别人看到或响应时,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即大学生意识到仿佛自己独身一人处在诺大的虚假网络世界里,慢慢的变成了“网络的孤独者”。

(四)大数据时代下大学生失去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大数据产生于IT领域,它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种方法论和价值观。大数据主要有体量大、类型杂、价值高、快速化等特征。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也让新兴技术在媒介融合时代迎来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我国早在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并要求社会各界充分利用大数据来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并保障大数据切实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积极寻求新的出路,以推动我国各阶层的发展。高校是一个知识密集、思想活跃、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的场所,无论是在科研教学上,还是管理行政上。因此,怎样充分运用大数据,并且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深入的分析,是我们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问题。在大数据时代,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在当前校园和社会中,大数据的应用已经变

得不再陌生,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一些网络媒体软件,例如微信、微博,尤其是一些新闻软件,例如网易新闻、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等,用户都已经在不经意间被大数据进行了舆论引导。大学生日常打开一些软件app,推送在头版头条的新闻几乎全是类似感兴趣的内容,每个人的内容均不雷同,都是经过大数据分析,对每类人群进行的指定推送定制化新闻。如此一来,不是受众自己选择感兴趣的资讯信息,而是由这些具有大数据功能的软件使受众只能接收到某些信息。受众也将无法再接触到自己不是十分感兴趣或者不感兴趣的内容,再加之现如今大学生对政治新闻的敏感度越来越低,所以便需要有一个十分严谨的部门进行干预,而不应是各种媒体媒介独自进行的大数据分析,这样内容的指向性才会更加客观和正确,大数据时代下的舆论引导需要朝向更加健康的方向不断前进。

三、媒介融合时代对大学生进行舆论引导的正确路径

(一)在高校树立正面的网络舆论“意见领袖”

领袖是带有人格魅力的、容易吸引人的关注、并对受众有说服力的人。在媒介融合时代树立领袖十分容易,但是大学生对于人格魅力的追求变得越来越高。这种意见领袖定义为“在大学生网络群体中自发形成,在学习、社会经验以及情感等多方面具有丰富而独特的见地,同时能够将自己的思想有效地传达和影响身边同学和朋辈的大学生(群体),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高校教师。”^[6]所以这种意见领袖式的人物可以是学生中比较有威望的学生干部,也可以是有一定威信的教师。他们对一些新闻事实发表正面有态度的言论往往会事半功倍,也会对当下的舆论引导工作有推进作用,还可以带动相关话题的讨论,但不会激化矛盾。同时也要树立一种浩然正气,古代思想家孟子是这样说的:“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7]所以支持和鼓励校园舆论环境培育更多的意见领袖,支持和鼓励意见领袖发出理性的声音,是创造良好的网络舆论导向环境的重要一步。但是这种支持和鼓励,并非将意见领袖纳入政府管理体制之内,而是要以宽容的心态、协助的方式,帮助意见领袖传递

理性的意见。

(二) 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网民

当下的社会是一个浮躁的社会,高校环境也会受到一些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大学生自身。网络暴民日益增多,网络键盘侠、道德侠比比皆是,一些不理智易盲从的大学生网民数量越来越多。“所谓网络自律可以看作参与者使自己服从网络规范的交往行为,这些规范是理智上一致的产物。”^[8]前面也提到,网络评论的匿名化会使得一些学生变得不负责任,无法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讲道德的大学生。“针对高校对网络教育存在的‘重发展、轻管理、重知识、轻道德’现状,切实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衡量大学生网络行为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9]所以要在校园中推广正确的法制观念和社会主义道德荣辱观念,树立责任意识,坚决抵制网络暴民的形成。大学生要加强自律,传播正确的资讯,不散播虚假谣言,从而形成无论是上网还是私下交流都始终是一名有素质讲道德有责任心的合格大学生。

(三) 创造更加清朗的网络舆论环境

如果纯粹为了控制网络舆论而将网络媒体强行纳入到传统媒体的体制内,这就违背了网络的自由性,在任何国家都无法实行。要使网络媒体真正成为社会媒体,需要的是网络自我责任意识的推动和网络传播的规范性的提升。要利用好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把握好网络舆论的时、度、效,使得当前的网络环境清朗起来,杜绝网络水军的肆意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对网络“黑色”地带的斗争中也强调了“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10]“对大学生网络舆论信息进行有效地收集、汇总、分析

和整理,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学生的意见建议和利益诉求,以更好地应对和干预出现的问题,引导学生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11]最后认同每一位大学生的差异性,相信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为他们营造开放积极的网络舆论环境。

(四) 建立健全媒介融合时代高校舆论引导的预警机制

舆论引导的预警机制是及时准确地把控舆论导向的重要手段,“由于舆论主体的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在许多情况下,公众仅依据自己的信念和经验,尚不能明确自己应当对社会性问题持什么观念和态度,因而在表达观点时有意无意地总是需要参照系。”^[2]俗话说“防范于未然”,出现了一些不法分子企图散播虚假信息或者谣言时,早发现早治理,尽早做好舆论危机发生时的应对方案。在消极舆论传播旺盛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控制,防止其肆无忌惮地扩散,使整个高校舆论环境乃至社会舆论环境都得到了十分重要的净化作用。就传统有效的方法来讲,可以采取“堵、疏、移”的方式。“堵”是及时删除不良消极的舆论信息,不过这种方式极易导致大学生的逆反心理,使舆论以其他形式散布,是3种方法里最不可选的。“疏”是指对舆论进行正面引导,及时纠正错误的信息,这种方式容易被大学生理解和接受,也是当下通用的方法。

在面对一些特殊事件的发生时,如果不能有效地及时进行纠正和正面引导就要用到“移”的方式,“移”是指转移大学生当前的注意力与兴奋点,给舆论的澄清和消散留出解决的缓冲时间。最后,无论什么方法只有拥有了完善的预警机制才能更好地预防,使得整个引导过程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出现问题也可以及时地解决。

参考文献:

- [1]徐惟诚.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 [2]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5-20.
- [3]周烁.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的网络舆论引导[J].教育评论,2012(1):60-62.

- [4]王立芳,王泽群.教育舆情视域下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调查研究——以百度贴吧为例[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1):94-99.
- [5]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8-01-31).http://www.cac.gov.cn/2018-01/31/c_1122347026.htm.

- [6]王嘉,戴艳军,王智宇.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研究——基于人人网[J].中国青年研究,2012(7):79-85.
- [7]洪镇涛.孟子[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55-60.
- [8](英)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15.
- [9]刘立勇,王晓玲.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与引导机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2):107-110.
- [10]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93-94.
- [11]潘清泉,韦慧民.网络舆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抑制和促进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7):76-78.

Research on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Media Integration Era

Sun Yuan

(Institute of Marxism,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0, China)

Abstract: The public opinion in the era of media integration is influencing and changing the way of study, life and commun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the truth or falsehood of the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by various media. The point of view is also lack of rationality, so it is easy to lead people to lose their direction. As a result, the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en reduced to the “Loners in Network”. Anonymous comments contribute to the arrogance of some lawless elements, and in the era of big data, college students have lost the initiative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which also impacts students heavily.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for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is paper,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t'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posi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pinion leader” in colleges, and strive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to build a clear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 the alert mechanism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media integration era.

Key words: media integration; loner i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pinion leader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103-06

创新团队胜任力模型构建及 对培育大学生创新团队的启发

康学梅¹, 张廷君²

(1. 福建农林大学 安溪茶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2.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文化科技的融合需要文化科技类人才,需要高校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文章通过理论回顾与定性访谈,探索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的5个要素。基于福建省进行维度分析,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组织协作能力”、“目标导向”和“创新能力”三个维度的存在。最后文章构建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三维模型,并为培育高校大学生创新团队提供借鉴。

关键词:创新团队胜任力;模型;大学生创新团队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16

培养文化科技复合型人才成为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的总体目标之一,培养造就专业化、复合型的人才队伍与团队则是必要保障措施^[1]。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下,高校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人才尤为重要。

一、理论回顾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团队胜任力的研究逐步升温,其中创新团队胜任力的研究较少。创新团队胜任力是团队胜任力新的研究点,有必要对其进行分类梳理。

(一)创新团队胜任力研究

团队胜任力的研究为创新团队胜任力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团队胜任力维度同样适用于创新团队胜任力。现有创新团队胜任力研究,主要针对

技术创新团队和相关行业的研发团队、项目团队和创业团队进行研究。虽划分标准不一,但创新团队胜任力(包括团队胜任力)维度主要包括目标承诺、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协作、组织能力和成就导向6个维度,见表1。

(二)创新团队胜任力模型及其影响因素

创新团队胜任力模型以团队胜任力和创新团队胜任力为理论基础,因此将确定的6个维度为研究模型,对此进行检验、修正以得出适用于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的模型。有研究表明,创新团队胜任力在不同社会背景属性上存在差异。Jan Brinckamnn, Soeren Salomo 在研究团队经济管理能力和公司成功的影响中,将团队规模和单位年限作为控制变量。^[2]唐小燕亦证明,团队规模

收稿日期:2018-04-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基金(12CGL055)

作者简介:康学梅(1990-),女,助教,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本文信息:康学梅,张廷君. 创新团队胜任力模型构建及培育大学生创新团队的启发[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2(4): 103-108.

对 IT 企业的软件开发项目团队胜任力的影响。^[3] 单位成立时间对团队胜任力的影响。
龚劲锋^[4]研究了团队规模、团队人数、单位类型、

表 1 团队胜任力维度划分一览表

团队胜任力	研究者	年份	维度(胜任能力)
团队层面	Margersion	2001	组织、创新、宣传、提升、开发、生产、激励、维护、连接
	Cinthia	2003	组织、合作、认知、主题专家、容忍、问题解决、沟通、动机、推导
研发制造团队	J. Saldana-Ramos 等	2012	协作、学习、创新等 20 项一般胜任力;学习、语言、知识等 27 项不同岗位的技能胜任力
	Javier 等	2013	沟通、管理、识别、应用
	唐竺夏子	2012	成就导向、团队精神、团队效能、领导能力、团队影响、工作态度、团队心态、业务能力、沟通
	李冰,司鹏岳等	2014	协作、创新、学习、关系、认知分享、技术判断、风险共担
创新创业团队	张振华	2013	组织、协作、创新、学习、承诺、创业导向、机会、机会共享
	刘进,朱佳俊	2013	机会、战略、关系、组织、认知分享、技术判断、风险共担、创新、学习
创新团队胜任力	余绚波	2009	学习、协作、目标承诺、团队思维、专业技术知识、获取信息能力、主动
	曹志勇,刘嘉	2011	目标承诺、顾客导向、创新氛围、团队学习、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
	Elise du Chatenier 等	2010	学习、团队协作、创新、自主学习、边裁、谈判、危机处理、政治素质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二、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特征验证

(一)访谈目的和设计

课题组对福建省 4 家文化科技单位的 4 位高层领导进行了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资料。通过访谈,获得对文化科技复合型单位及其创新团队的认知,亦可检验理论归纳出的胜任力维度在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的适用程度。本研究只节选与本研究相关的访谈问题,即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特征、团队成员胜任素质,并通过专家小组讨论法,对访谈文稿进行归纳分析。

(二)访谈结果和分析

1. 文化科技复合型单位

文化科技融合的企事业单位,集人才和知识于一体,兼具文化单位注重文化创意和科技单位注重技术创新的特点。从访谈中归纳可知,与一般的科技单位、研发单位重结果、重数据不同,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单位的核心是文化,重点是创意,强调持续学习。

不同单位受访者对团队成员应具备的特质认知存在差异,但存在如下几点共性:对团队负责人而言,最重要的沟通协调能力,有 3 位受访者均提到这一点;能与团队成员区分开的是具备敏锐国

际视野,组织管理能力是作为团队负责人的基本素质。对团队成员而言,最重要的是有 3 位受访者都提及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能与其他团队成员区分开的特点是成员鲜明的个性,这反映文化科技复合型企业包容多元文化、注重创意。

2. 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探索

通过对 4 位高层领导的访谈,对访谈文稿的内容分析,共获得组织能力、学习能力、目标共识、团队意识和创新能力等 4 个维度,为进一步明确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提供客观科学的依据。具体维度分析见表 2。

本研究总结出被访者提及的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的 5 个维度:目标共识、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团队意识、组织能力。其中,理论回顾归纳出的目标承诺(即访谈中的目标共识)、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协作(即团队意识)、组织能力在定性访谈中得到了初步验证,而成就导向未获得验证。

3. 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维度确定与解释

综合观之,理论回顾和定性访谈概括出的创新团队胜任力维度包括:目标承诺、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协作、组织能力等 5 个维度。基于相关文献和访谈,对得到初步验证的 5 维度进行一一描述和量表设计,构建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模型。

(1)目标导向(目标承诺)。本研究在借鉴周爱明、曹志勇、刘嘉^[5-6]关于战略目标能力和访谈资料基础上,将其定义为“目标导向”,指文化科技复合型团队以文化为第一位、共同发展目标为导向,相互认同、共同制定并实施战略目标的能力。量表亦依此设计。

(2)学习能力。从访谈资料得出,持续的学习、广泛的学习视野、成员间相互学习是建设优秀团队的必要因素。在借鉴文献基础上将其界定为,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不断进步、学习热情持续、学习心态包容的优势能力。量表依据李冰、司鹏岳等^[7]和访谈资料等设计。

(3)创新能力。针对不同团队类型和行业类别,学者界定和测量角度均有不同,作为文化复合

型创新团队的核心特点,本研究在访谈和相关文献基础上,将其定义为,团队思维上推陈出新,接受并提出新创意,行动上成员受团队鼓励支持和宽容,并据此设计量表。

(4)团队协作。D. P. Baker 认为团队协作指的是一种存在于成员间的能力。^[8]本研究认同此观点。借鉴 Salas 等^[9]观点,本研究将其定义为,团队上下级、平级之间的互动,在彼此信任基础上相互支持合作,量表则借鉴郭丽芳研究。^[10]

(5)组织能力。在借鉴 McClelland^[11]、李冰、司鹏岳等^[7]研究和访谈的基础上定义并设计量表。组织能力为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内,对人力、物力、财力、技术资源等内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实现团队建设。

表 2 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维度分析

受访者	维度	对话原文
A、C	创新能力	①“对我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团队,最核心的肯定是一个,一个就是创新……创意为核心驱动的一种基因……所以创新我觉得非常重要嘛。”(受访者 A)②我觉得算是我们这个团队比较开放,就是鼓励大家把那个想法提出来,一起来做讨论,然后来做这种碰撞,会有一些好的东西出来……大家能够一起去创新,然后把你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提出来。(受访者 C)
D	目标共识	“首先第一点,他们要对这个目标达成一个协议,然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要有很强烈的共识。”
A、B	学习能力	①“第二就是团队的这种学习能力。每一个团队它从诞生的那天起,到最后它成功的时候,它一定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这种积累,跟这种不断的蜕变,不断地去完善的一个过程。”(受访者 A)②“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学习的意识,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必须要不断地学习,团队要学习,每个制作人也都要学习。”(受访者 B)
D	团队意识	“他必须有这样的意识,他们是整个团队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在自己的这种意愿上能够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共识,以团队的这样一种方式。”
B、C	组织能力	①“往往当有问题出现或新项目临时进来,紧要项目出现的时候,团队不需要去考虑太多,比如说像绩效怎么分配啊,然后该怎么赏、怎么罚这种情况,往往就可以直接分发下去操作,我觉得这是体现一个成熟团队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受访者 B) ②“可以有很好的组织能力,因为在做项目的过程中调配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受访者 C)

资料来源:本研究调查。

三、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模型构建

为对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模型及其特征进行初次探索,本研究并未采取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而是通过描述性研究进行展示与探讨。通过文献回顾和定性访谈初步确定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维度,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获得原始数据,运用数据统计软件 SPSS20.0,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信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处理并分析。

(一)数据资料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数据基于课题组调研数据,调研对象涵盖文化科技类企事业单位中创意团队或研发团队中的创意人员、研发人员和技术人员,调查地区立足福建省文化科技企事业单位分布和发展情况,选取有代表性的福州、厦门、泉州、三明四地,共调研 37 家文化科技类企事业单位,发放问卷 491 份,有效回收 437 份,有效回收率为 89%。研究在不同层面上描述了样本特征。见表 3。

表 3 样本基本描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百分比/%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百分比/%
成员层面	性别	(1)男	61.10	成员层面	学历	(1)高中以下	1.80
		(2)女	38.90			(2)高中/大专/技校	37.80
	年龄	(1)20 岁以下	1.00			(3)本科	56.90
		(2)21~30	79.50			(4)硕士及以上	3.40
		(3)31~40 岁	16.90				
		(4)41 及以上	2.60				
团队层面	规模	(1)3 人以下	3.90	团队层面	成立时间	(1)1 年以内	12.80
		(2)4~8 人	30.50			(2)1~5 年	58.90
		(3)9~13 人	26.80			(3)6~10 年	18.40
		(4)14 人及以上	38.80			(4)11 年及以上	9.90
组织层面	单位性质	(1)国有企业	11.70	组织层面	发展阶段	(1)创业期	22.90
		(2)民营企业	74.80			(2)成长期	52.90
		(3)三资企业	10.10			(3)成熟期	18.80
		(4)事业单位	3.40			(4)转型期	5.50

资料来源:本研究调查。

从团队成员层面看,在 437 个数据样本中,男性多于女性,这与所调研单位属性相符;在年龄段上,21~30 岁居多,年龄最小 18 岁,最大 63 岁,年龄极差较大,反映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以年轻群体为主;在学历层次上,本科及以上占比 60.30%,表明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整体素质较高。从团队层面来看,团队规模在 4~13 人的占比 57.30%,符合一般团队的合适规模;团队成立时间 1~5 年占一半以上,说明所调研团队多数处在上升阶段。从组织层面看,民营企业占据绝大地位;发展阶段以成长期为主,这与团队成立时间的占比情况相对应。

(二)研究变量度量

对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的测量,基于相关文献的回顾和专家讨论法,设计了 5 个维度 22 个题项,问卷采用里克特(Likert)五级量表设计,调查团队成员在 5 类胜任力上的表现。以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对该量表进行重新分类和效度检验。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对 22 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通过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处理,以特征值大于或等于 1 为提取原则,参照碎石图提取因子,经多次探索,最终抽得 3 个因子,共计 19 个题项。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4。

表 4 创新团队胜任力的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名	指标内容	因素负荷量	因素解释量/%	信度	特征值
组织协作能力	团队的沟通渠道畅通	0.834	30.881	0.938	5.867
	团队能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0.757			
	团队成员的技能与专长互补,取长补短	0.755			
	团队成员间经常交换意见,共享信息	0.739			
	团队成员能将个人目标与团队目标相统一	0.722			
	团队成员知识面广,知识结构多样化	0.691			
	团队的各项分工活动能环环相扣,相得益彰	0.679			
	团队成员在工作中能彼此支持和协作	0.674			
	团队对资源的配置有利于发挥团队优势	0.563			
目标导向	团队战略定位清晰准确	0.817	23.457	0.910	4.457
	团队设定了长期的战略规划并付诸以行动	0.813			
	团队具有国际视野	0.770			
	团队成员认同团队战略和目标	0.722			
	团队能从自身经验中总结经验教训	0.568			
	团队善于学习借鉴他人经验、教训以提升自己	0.527			
创新能力	团队鼓励成员奇思妙想、创新尝试并宽容失败	0.874	14.436	0.825	2.743
	团队敢于打破常规做事	0.719			
	团队始终在寻找新的机会和创意	0.546			
	团队能提出创新性的研究构想或方案	0.530			

资料来源:本研究调查。

创新团队胜任力 19 个题项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为 0.956,分量表信度分别为 0.938、0.910、0.825,具有很高的信度。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样本的 KMO 值为 0.960,球型检验卡方值为 5 724.298,伴随概率小于 0.001,达到非常显著水平,表明数据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3 个因子的累积解释量达到了 68.774%,各个题项在相应因子上亦均有较大负荷。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探索性因子分析后所得因子结构与研究初探存在差别:目标导向、创新能力维度得到有力验证,这与龚劲锋^[4]等基于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相似;与 Jan Brinckamnn 等^[2]研究不同,学习能力维度未在本研究中得到验证;组织能力维度则完全归属到协作能力中,重新命名为“组织协作能力”。

至此,通过理论回顾、定性访谈和问卷调查,共同确认、验证的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维度包括:组织协作能力、目标导向、创新能力。

四、结论与启示

(一)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三维模型

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本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定性访谈、问卷调查和 spss20.0 相关数据分析方法验证了其由组织协作能力、目标导向、创新能力 3 个维度构成,并且通过信度、效度检验,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模型构建得到验证。

理论回顾整理出的成就导向维度在定性访谈中未能得到验证。根据 Spencer 胜任素质辞典^[12],成就导向是团队成员在共同目标上一致的承诺、共同的坚持和对质量的重视,这与相关文献和定性访谈中的目标承诺(承诺)、团队协作(合作、团队效能)的界定存在一定交叉,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制于访谈样本的局限。本研究成就导向维度的缺失是可以理解的,因而它并不适合本研究。理论回顾与定性访谈共同确定出来的组织能力、学习能力亦未能得到验证。量表 22 个题项,3 题被剔除题项,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出现串题,组织能力题项合并到团队协作中,学习能力部分题项串题到目标导向中。这可能是出于个别题项措辞产生误解的原因。

(二)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模型对培育大学生创新团队的启发

借鉴韩提文、梁林等^[13]的团队胜任力三维模型建构,结合培育大学生创新团队的需要提出,在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等大学生创新团队中,组织协作能力是差异性维度,目标导向是基础性维度,创新能力是卓越性维度,如图 1 所示。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胜任力三维模型在大学生创新团队培育中使用,有助于高校大学生创新人才和团队建设;各维度的明确划分,有助于高校管理者、教育者有章可循,分门别类地进行创新人才的开发和团队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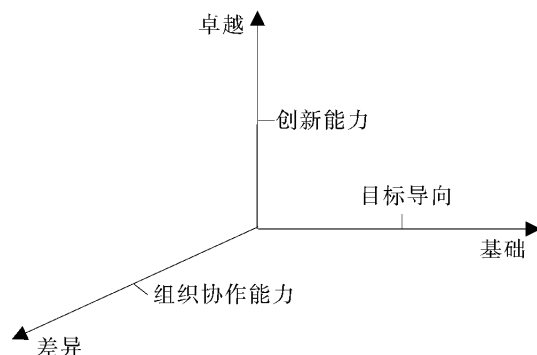


图1 应用在大学生的创新团队培育中的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三维模型

1. 大学生创新团队培育的基础——目标导向

树立创新团队目标导向,指导大学生目标承诺。目标导向是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队的基础性胜任力维度,因此,保持团队目标一致性是大学生创新团队建设的首要任务。新媒体时代下的大学生生活多元,心性易变,创新团队的建设不仅需要个人胜任力的提升,更需要团队成员之间步调一致,保持共同目标追求。以目标导向指导大学生创新团队建设,一是需要做好大学生创新理想信念教育,树立团队共同参与意识;二是需要采取适当目标激励法,建立团队项目任务实施跟踪制度,保证目标落实;三是需要动态进行目标调整,及时根据绩效评估调整方向,把握团队航向。

2. 大学生创新团队培育的关键——组织协作能力

重视大学生组织协作能力培养,把握创新团队关键。组织协作能力是文化科技复合型创新团

队最重要的胜任力要素,是成为保持高绩效的优秀团队,区别于其他团队的一个差异性维度。因此,大学生创新团队建设中,要求团队成员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日常团队活动中对内外部资源做好最佳调配,另一方面自觉树立团队意识,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3. 大学生创新团队培育的核心——创新能力

助力高校创新创业使命,引导大学生增强创新实力。基于国家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亟待提升和文化科技复合型人才缺乏的现实考虑,创新能力成为文化科技复合型企业事业单位中的核心胜任力要素,是创新团队能持续活跃发展的卓越性维度。而创新能力的培养除成员个人因素外,与团队氛围和组织支持和鼓励紧密相关。

参考文献:

- [1]王春华.科技部等六部委印发《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N/OL].(2015-06-09).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394163.
- [2]Jan Brinckamnn, Soeren Salomo, Hans Georg Gemuenden, et al. Financial management competence of founding teams and growth of new technology-based firm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1;217-243.
- [3]唐小燕. IT 企业软件开发项目团队胜任力模型研究[D]. 南宁:广西大学,2013.
- [4]龚劲锋. 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团队胜任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D]. 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09.
- [5]周爱明. 中小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团队胜任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07.
- [6]曹志勇,刘嘉. 企业创新团队胜任力的内涵模型[J]. 科技创业,2011(2):114-116.
- [7]李冰,司鹏岳,关幼秋. 创新创业团队胜任力模型研究[J]. 中国商贸,2014(6):31-32.
- [8]Baker D P, Blaye M, O'Mauey C, et al.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learning[J]. E. Spada & Peiman, Oxford: Elsevier, 2005
- [9]Stout R, Salas E, Carson R. Individual task proficiency and team process behavior: What's important for team functioning? [J]. Military Psychology. 1994, 6 (3):177-192.
- [10]郭丽芳. 矿建工程项目团队胜任力与绩效关系研究[D]. 南京:中国矿业大学,2013.
- [11]McCelland D C. Identifying competencies with 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s[J].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8;331-339.
- [12] Spencer L M, Spencer S M. Competence at work: Models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 [J]. John Wiley & Sons, 1993;99-220.
- [13]韩提文,梁林. 钢铁企业技能人才团队胜任力构成维度的质性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2(6):120-124.

The Model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Team Competence and the Inspiration of Innovation Team of College Students

Kang Xuemei¹, Zhang Tingjun²

(1. Anxi College of Tea Scienc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technology needs to be pushed by culture-technology talents and innovative talents cultivated by colleges. Exploring the innovation team competence is significant. This paper explores five main factors of innovation team competence of culture-technology mode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 Three dimensions (organization ability, goal orientation,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are proved b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based on dimensional analysis of Fujian.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of culture technology innovation team competence, and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team.

Key words: innovation team competence; mode; innovation team of college students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总目次

第 1 期

京津冀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协同度测度 ——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	夏业领 何 刚 李恕洲(1)
金融业 Ohlson 价值相关性修正模型的建构与分析 ——基于 2011—2015 年上市银行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郑智勇(9)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长乐区的调查数据·····	陈婧文(17)
贫困户收入结构、增收陷阱与优化研究 ——基于宁德市 129 户贫困户抽样调查·····	吴奶金 谢晓维 杨雅莉 刘飞翔(24)
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博弈机制分析·····	闫三曼(30)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 ——以石家庄为例·····	赵冰琴(36)
论元丰官制后秘书省职官的优裕心态·····	王艳军(42)
《春蚕》与左翼电影人的意识形态宣传策略·····	史新玉(48)
论《三国演义》中袁绍的人物形象·····	杨 洸(52)
《红楼梦》文本的社会网络结构分析·····	林 峰 赵广平 林 娜 吴亚楠(58)
一部主题复杂而深刻的失败之作 ——评徐则臣长篇新作《王城如海》兼议其近年的一个写作倾向·····	杨希帅(6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性 ——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	徐 蕊(69)
人力资本、社会保障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基于 CHIP2013 的实证分析·····	尤 伟 郑逸芳 许佳贤(74)
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观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马 瑜 胡 媛(81)
中国特色反腐模式的转型及体系反腐模式的构建·····	周朋飞 靳 涛(88)
基层服务政策对在校大学生的激励效果及提升对策·····	可文彬欣 张廷君(94)
论大众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	刘延雪 邢红梅(101)
基于多校区办学的高校本科生学业指导路径·····	周 鑫 徐 建 刘源鑫(106)
《新型轨道交通条件下都市圈旅游发展特征研究》书评·····	吴殿廷(41)

第 2 期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收支动态平衡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胡耀岭(1)
海绵城市建设中“生态政府”管理模式研究 ——以 X 市 W 路海绵改造项目为例·····	严文婷(8)
铁路建设项目全生命环境成本的确定方法研究·····	罗丽娇 李前进 段晓晨 袁淑娟(15)
我国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及其效率评价研究·····	赵清军 周毕芬(20)
铁路运输企业货运服务创新绩效评价研究·····	侯维磊 郭跃显 崔晶娜(28)
新兴城市地铁施工风险评估研究·····	孟 楠 张新宁 段晓晨 毕 岳(3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传统村落旅游转型升级 ——以上杭县院田村为例·····	李丽华(41)
特色小镇培育中创新“柔性引才”机制探析·····	胡卫卫 于 水(47)
我国施工企业资本结构优化探析 ——以中国建筑总公司为例·····	王 钰 冯 雯(5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结构研究综述·····	王 捷(57)
新时期冀中乡村传统民居保护与改造问题研究 ——以石家庄赵县各南村为例·····	马曙晓 史坤立(63)
金代射柳文化考述·····	孙连娣(66)
河北历史名窑优秀传统陶瓷文化研究·····	张文松 张琳琳(74)
河北民俗文化“走出去”的 SWOT 分析·····	周 莹 石玉晶 韩海鹏(78)

关于完善我国铁路乘意险保险制度的思考	刘卫红	尹冰艳	安世瑾(83)
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民主路径探究	靳 涛		(89)
高校校园安全管理的法治路径	李晓华		(96)
基于聚类的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分析	刘能现	姜云飞	(102)
河北省高校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路径探讨	杨继成	杨占山	张军亮
			刘艳霞(107)

第 3 期

京津冀协同发展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系研究	王景春	林佳秀	侯卫红(1)
河北省劳动力资源现状与就业特征研究	杨胜利	王伟荣	李 鑫(7)
技术创新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周燕妃	何 刚	(14)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实现路径研究 ——基于江苏省 1 200 户样本家庭的入户调查	辛境怡		(20)
地方政府大数据治理的挑战及应对路径 ——基于“动机—能力”的视角	余静雯		(27)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 A 股上市国有企业的数据库	戴 宁		(33)
基于 LMDI 模型的福建省税收增长的因素分解分析	刘琼芳		(41)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及发展建议 ——以衡阳市为例	孔 陇	张春雄	(50)
城市广场的人性化设计	罗 沁	武 勇	(57)
电台微信公众号文化外宣推文的英译研究	魏 怡	刘立勇	(63)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先进文化的基本经验	薛亚梅	李 冰	(69)
道儒法墨思想对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的启示	商植桐	张珩铂	刘玲玉
			田雨鑫(74)
思想政治教育中非理性因素作用形成的路径探究	胡晓敬		左童洁(80)
河北省儒家文化遗产现状调查与保护利用研究	郑红彬	彭 鹏	毛琳箐(86)
铁路旅客黑名单制度探究	俞丽英	陈瑞英	刘卫红
			尹冰艳(91)
以封龙山孝道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与路径	段晓亮		玄佳欣(97)
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科技人员心理资本结构研究	靳 娟	赵 然	王 楠(102)

第 4 期

二级挣值法结合 PDCA 循环在地铁施工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胡天明	段晓晨	王永刚(1)
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赵清军	王雅妮	周毕芬(9)
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 ——基于厦门和漳州的调查数据	王丽云	周毕芬	赵清军(15)
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分析 ——基于厦门 307 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车 鑫	周毕芬	赵清军(21)
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张曼玉		(29)
“985 工程”院校科研效率的时空差异与成因分析 ——基于面板数据与 EBM 模型	刘 悦	汪克亮	孟祥瑞(36)
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坚实基础	王有炜		豆艳荣(4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内容及其重大意义	徐长山		(50)
资源禀赋、政策调适与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 ——基于“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个案研究	王 勇		刘佳佳(56)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 2013 年、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孙小宇	郑逸芳	许佳贤(63)
全面二孩政策下高校女教师“产假式缺编”治理 ——以精准治理分析的视角			刘佳佳(73)
古代孝文化传播途径研究	苏喜娥		刘荣贵(79)
在新形势下河北会展产业“短板”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安晓波		张贺成(84)
教育期望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2013—2014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	吴 洁	吴智雄	郑逸芳
			许佳贤(91)
媒介融合时代大学生舆论引导研究	孙 远		(98)
创新团队胜任力模型构建及对培育大学生创新团队的启发	康学梅		张廷君(103)

(本卷终)